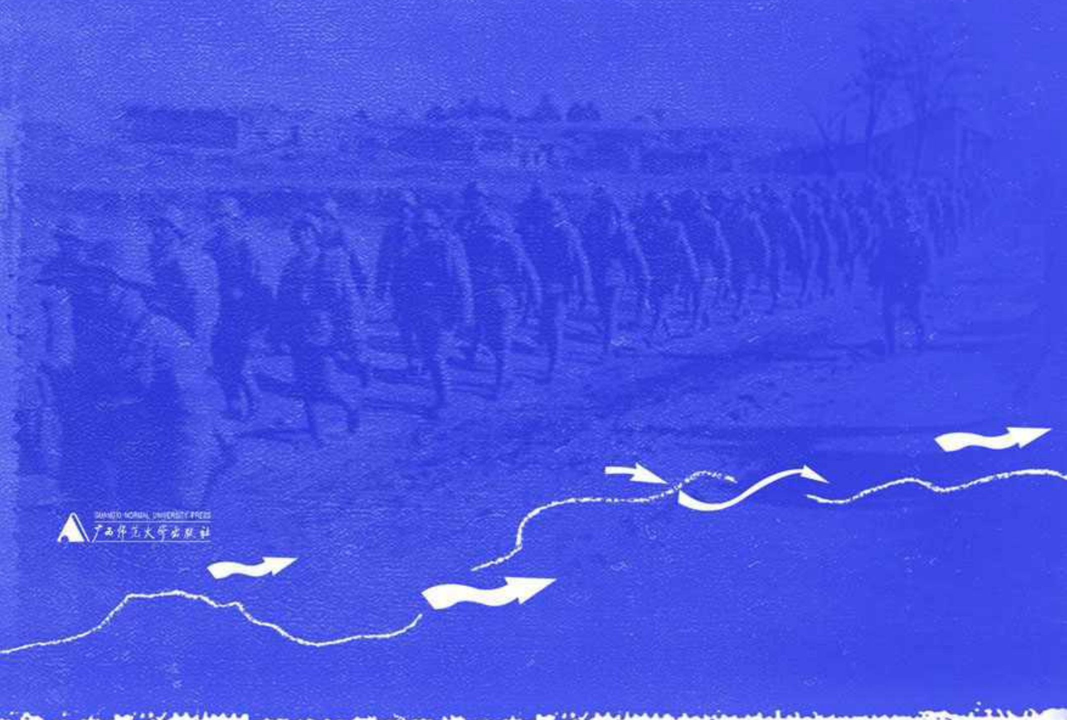
台湾老兵

赵川 著

他们是一群流落宝岛的国民党老兵。乱世飘零，谁知风雨归途？沧海微尘，谁问他们生死？枪林弹雨中，踏血奔命，直至故土渐远、亲情断绝。谁能体味这百万儿郎的旷世悲愁？

口述历史

TAIWAN LAOBING
KOUSHU LISHI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赵川 著

他们是一群流落宝岛的国民党老兵。乱世飘零，谁知风雨归途？沧海微尘，谁问他们生死？枪林弹雨中，踏血奔命，直至故土渐远、亲情断绝。谁能体味这百万儿郎的旷世悲愁？

TAIWAN LAOBING
KOUSHU LISH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川 著

目 录

版权信息
寻找历史的碎片（序）
台湾街头寻觅“凋零群落”（代自序）
“老军统”洪淦棠：我今年104岁，黄埔分校十七期、戴笠门生
“不死老兵”姜思章：坐牢时，一名驾机叛逃死囚教我学会“忍”
“远征军老兵”潘银堂：每人试了3发子弹，即飞赴印缅前线
“中美班特战员”鲍大贤：共军“政战”技巧，国军望尘莫及
“老军需”仲跻玉：军官姐夫改变我一生
“古宁头幸存者”陈书言：金门那湾海水哟，挡了我大辈子的路
“老宪兵”刘志衷：初次远行南京，夜半偷米上竹排
“韩战战俘”李银生：当年若活着回国，定能立功受奖
“山区农民”廖潜生：老婆孩子热炕头时，被国军抓了壮丁
“幸运少将”丁治民：美国军校常见“毛理论”，独不见蒋氏片语
“多面老兵”遗孀：他一生的“底牌”是共军
后 记

版权信息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作　者：赵　川

出版人：何林夏

寻找历史的碎片（序）

杜　平

在中国现代史上，台湾老兵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群体。其实不只在中国，即使在世界历史上，台湾老兵在不同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遭遇也当属独一无二。

以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台湾老兵”显然是特指那些在1949 年前后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但以实际情形看，这个群体也包括那些在金门炮战以及朝鲜战争中被俘的解放军士兵。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少人，我们迄今所知的公开数据只是粗略估计，但高峰期至少有六十万之多。

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大规模人口迁徙，无论是战争还是天灾所致，当事人的命运都因此而发生剧烈变化，有时候甚至连整个民族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上世纪中叶国民党军队溃败而渡海登台，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在规模上可谓浩大。它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而且其残存的影响在今天依然可以感觉到。人类创造了历史，但往往也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台湾老兵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塑造了一个历史的片段，然后却被始料未及的历史进程无情地挟持。

因此，“台湾老兵”是一个十分不幸的群体。所谓不幸，其内涵不只是背负着失败者的身份而背井离乡，或妻离子散，或家破人亡，或终身无所依托，而且更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各种外在的政治因素往往使他们身份变得模糊，角色显得错乱，心无所属，情无所依。历史和现实原因使人们对这批老兵的看法和定义，也就自然地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他们究竟是台湾人，还是大陆人？他们究竟是台湾老兵，还是中国老兵？由于两岸的中国人尚未走出历史的羁绊，诸如此类问题也就无从深究。

但是，若抛开历史恩怨纠葛不谈，我们还是可以对台湾老兵的身份和角色，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

其一，如今台海两岸的良性互动关系，应该追溯到1987年春天，这

批老兵为争取回乡探亲权利而进行请愿抗争，最终促使台湾当局决定为民间接触予以政策松绑。此后几十年，台海两岸逐步调整各自的政策，两岸从民间接触发展到政治接触，都肇始于当年老

兵回乡探亲之举。

其二，在台湾内部政治生活中，这批老兵是坚定支持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的力量。虽然年老体衰，人数在凋零，并且身处政治舞台的边缘，但在历次政治选举中，他们都挺身而出，喊出正义的声音，发挥剩余的能量。这些老兵也许依然背负着历史恩怨的包袱，但同样也始终肩负着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

对于台湾老兵的故事，大陆民众一直非常关注，关注之甚明显超过台湾本身。因此之故，大陆媒体若有相关报道，每每都会吸引众多眼球，可惜只是偶尔散见于各种媒体，且大多是重复转载，有些资料也没有经过第一手核实。而赵川兄的这本著作很不相同，它详细而完整地记录了总共十一名老兵的人生故事，全部内容都经与老兵本人或其家属面对面采访所得，既真实准确，又生动亲切，不仅对一般读者来说极具可读性，而且对历史、政治和人文的学术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台湾老兵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如同历史的活化石，其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载体。但是，这个群体正在快速地萎缩，人数将越来越少，这难免令人感到无奈，随之也会产生紧迫感。正是受到紧迫感的驱使，赵川兄在担任大陆媒体驻台记者短短三个月时间里，一边完成了繁重的日常采访报道任务，一边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隙时间，艰难地寻访到散居于台湾各地的年迈老兵，就如同考古学家们在深山老林里寻觅历史的碎片，其艰难过程可想而知。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作者在历史的废墟上“抢救”到的碎片， 不可多得，不可复制。

是为序。

（注：序作者为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曾任新加坡《联合早报》主笔）

台湾街头寻觅“凋零群落”（代自序）

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当年，难以计数的国民党残余部队由大陆至台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他们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经历？来台后，他们又怎样度过了这漫长的一个甲子？当有幸成为首批派赴台湾“驻点采访”的记者时，我很想零距离接触这些风烛残年、“日渐凋零”的国民党老兵，亲耳听听他们的讲述。

一

寻访国民党老兵，是来台湾之前就有的一个“非分之想”，也是来台后的一个重要计划。在台北驻点满月，基本站稳了脚跟，我便开始寻找采访对象。始料未及的是，好不容易获得的线索被一一扯断，连番挫折令人灰心丧气。徘徊在台北街头，数次欲放弃自寻烦恼般的采访计划，可又心有不甘。幸运的是最终能柳暗花明赢得转机，经验和坚持令我自己也有一点小感动。

仿佛每一个台湾人都同大陆有着天然的牵连。乍一问，找到老兵一点不难，周围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实际上，短期内找到一个有“故事”、耳聪目明，且愿意接受大陆记者采访的国民党老兵，非常困难！

有台湾朋友出主意说，到荣民总医院啊，那里老兵满营；也有的说，直接到眷村去找，那里原本就是“老兵之家”；还有朋友告知，“退辅会”是台湾行政机关下设的专门负责退役官兵事务的官方机构，所有老兵的花名册由他们掌管。

首期驻点时限是3个月，我的时间极其宝贵，时间要以分秒计算，只能走弓弦直线，否则这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台北的夜晚，窗外流光溢彩……躺在床上，心里盘算：到荣民医院？电话联系过，悉知程序烦琐，况且老兵多已80余高龄，那里必是老弱病残者，采访他们并不现实。到眷村作田野调查？尝试了一下，很难行得通，这不是在大陆，可以找街道办居委会之类。那是私人宅院，贸然前往恐怕连门都难

进，况且眷村已所剩无几，原住客更是寥若晨星。

最终决定还是从“官方”下手。于是，经电话预约后，在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来到位于台北忠孝东路的“退辅会”，寻求帮助，希望有所突破。

实践证明，此举算是牵住了牛鼻子。

二

负责接待的公务员丁先生很热情，提供了他们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并作了说明。因为是“政府机构”，按规定不能轻易提供他人信息。不过，丁先生指点说，大陆各省、市、县在台湾基本都有同乡会。他还从网上下载了几份同乡会名单给我。

丁先生寥寥数语，真令我受益匪浅。他说，在台北西门町一带曾有许多“红包场”——送歌手红包点唱歌曲的老式歌厅。那里历来是老兵聚会、娱乐的场所，不过，只是听人说，自己也没去过， 而且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还在世的老兵越来越少了，红包场还有没有，不好说。拜访丁先生虽没有具体收获，但提供了线索和思路，非常受用。

回到住处，翻看丁先生提供的资料，其中有两广（广东、广西）和安徽等地的同乡会名录。很显然，下载的资料早已过时，并且没几个人留下有效联系方式。试了几个，均告失败，仅打通了广东台湾乡友会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一位先生满腹狐疑，要求发传真等等。再试安徽同乡会的电话，好几个都无人接听，因为这是很久前的资料，他们是否还健在都是个问号。

我决定先来一次夜探红包场。

三

红包场这种娱乐形式，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是应台湾老兵军官及眷属所需，模仿上海歌厅形式而设立。早期红包场演唱的曲目多为二十至五十年代上海的流行歌曲，例如《天涯歌女》、《苏州夜曲》、《秋水伊人》等，从歌名就知道，是一些抒发缠绵悱恻小情调的曲子。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听众兴趣的转变，曲目也从旧上海时期的老歌转

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港台流行歌曲，歌手的舞台肢体动作也较以往活泼生动。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经一路打听，顺着街巷内的霓虹灯指引， 最终找到台北西门町附近一家位于老旧楼房内的名叫“金世代”的红包场。

迈出老旧电梯，即可看到一纸海报。随着乐曲声的引领，向右一拐，推开一扇门，就进入了场内。透过昏暗的光线，可见舞台上有一位打扮妖冶的中年女子在扭动肢体演唱老歌。细一看，她手里果真大咧咧地捏着一个红包。

舞台前，是几圈老式沙发。沙发内有人在窃窃私语，沙发前的茶几上还摆放着茶点和啤酒之类。在后排，隔了一个过道，是一排半月形的雅间，大抵是为讲究的客人准备的，但也没满座。看来，这里生意十分清淡。

我靠近收银台，与一位中年服务员攀谈。他说，现在老兵已经很少光顾了，白天偶尔有，晚上基本见不到。因为他们都上了年纪，夜间出门不方便。

在红包场内走动的侍者，也都是涂脂抹粉的半老徐娘。她们说，送红包只是个形式，里面一般也就100元新台币（相当于20来元人民币），当然你也可以多给。红包让服务员直接递到台上，由点歌者报出歌名即可。从伴奏到歌手，从灯光到装潢，都属于不上档次的那一类。显然，“红包场”只是一个大众消费、熟客为主、拾遗补缺性质的老式娱乐场所。同现代卡拉OK厅不在一个层次上，与大陆沿海城市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更不在一个档次。

探访红包场，没有发现老兵的踪迹，但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台湾老兵群体的好奇心，也坚定了寻访下去的决心。

四

其实，在此前后，我还尝试了至少七八条途径，结果大部分均以失败告终。但恰恰因有那少部分的偶然成功，遂成全了本书。

原本在台湾有两位远亲（均是老兵），现已过世了一位，还剩下一位。当我专赴台中市登门寻找时，先是发现地址有误，白跑了冤枉路，

后辗转联系上了，依然未能如愿见面。由此，我知道台湾老兵后代同上一辈差别很大，也体验了台湾“寻人”之不易。

委托台湾朋友，希望提供寻找老兵的线索。开始都说“不难不难”，可最后都没了下文，最多说声“抱歉，老人家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说话了”等等。我知道，台湾老兵群体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他们是告别历史舞台的一辈，被称为“凋零的群落”。

我手里其实还有一份大陆某地政府部门提供的当地籍台湾老兵地址。按图索骥，直接登门拜访。接连找了四五个，牺牲宝贵休息时间，东颠西跑，汗流浃背，沿途打听，结果发现大部分地址都已不存在了。曾勉强找到位于台北市北投区民族街一个僻处的门牌号，结果却空无人在。眼见邻居满脸狐疑相向，只能败兴而归。还有那个“台北市敦化北路223号”，绕来绕去，几进几出，从东街到西街，发现前后号码都有，恰好就是断了这个门牌号，问谁谁都说不清，迄今不得其解……不过，大海捞针也有一点收获——找到了一位宪兵出身的刘志衷，竟是按照错误的地址，歪打正着得来（详见有关章节）。

刘志衷，遂成为我寻访到的第一位台湾老兵。

五

去“外省台湾人协会（外台会）”，是退辅会一名官员支的招，他还帮忙牵了线。因为是公益组织，此处书籍资料不能买卖，只能通过“捐款”形式，变相获得了一些材料。借助外台会，又有了两位老兵的线索，一位是姜思章，一位是陈书言。

外台会有人建议，你直接去各地眷村作田野调查吧，一定有新的收获。可我哪有那个时间呢，你以为我生活在台湾吗？

直接到街头寻访！急迫中灵机一动。还真的大有收获。在台北中华路的荣民福利站内的荣民配镜点，就随机找到了老兵鲍大贤。

谁说道听途说没价值？在我从业新闻工作的20年里，许多新闻线索都是从朋友聚会或同陌生人闲聊中得来，特别是在一些没有“线”的部门，这一招更管用。这是记者的生存之道，也是可授后学的一个“绝招”。在台湾，这一招依旧派上了用场。在经常光顾的台北市万华区贵阳路“开开看江浙菜馆”，通过与店老板潘先生闲聊，不仅知道他的媳妇是

一位“大陆新娘”，还发现他父亲潘银堂是一名抗战远征军老兵。老人爱写日记，厚厚一大本“传家

宝”，将自己的身世讲得淋漓尽致。

当然，还曾到不同的餐馆询问，甚至到马路边的下棋摊打听，虽收获寥寥，但总能得到一鳞半爪的有用信息。

能成此书，最终还是要感谢“退辅会”的间接相助。依靠他们提供的“同乡会思路”，借助网络力量，先后又找到了仲跻玉、李银生、廖潜生和洪淦棠四位各具姿采的老兵。

当然了，出门靠朋友，这是古训也是真言。在驻点期间，台湾朋友帮了很多忙，“幸运少将”丁治民先生就是台湾朋友熊先生直接介绍认识的。本书共口述实录了11位各具情态的国民党老兵的人生故事，其中，9位均为亲口讲述，1位由女儿代述，唯一已不在人

世，而借助遗孀及后人口述的，是“多面老兵”于西聚。那也是一次朋友聚会，无意中听得的一个“奇闻”。

六

在人海烟尘中找到一位老兵，就多一份欣喜。或有人问，短短三个月，怎么找到了这么多个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老兵呢？细节难以详述，这些老兵对我来说，都是随机觅得，因为不是由人刻意推荐，更使其具有天然的“标本”意义。

那段时间，我仿佛随老人们的讲述走进了历史，时常被老兵们的人生遭际所震撼和激荡。譬如老兵姜思章冒死为老兵权益奋争，其艰辛的“回家”之路，让我潸然泪下，以至夜不成寐……从这些经历九死一生，顽强存活至今的老兵身上，我能触摸到人性最坚韧及最脆弱的部分。不得不承认，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采访交流，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对国人所谓“民族性”和“国民性”的认识，也填补了人文视域中的一个盲区。

台湾老兵多能领取“退辅会”下发的“终身俸”，因此，他们出言谨慎，交谈时颇多顾忌，老人们担心“政府部门”借故刁难。加上几十年的思想禁锢，他们对大陆记者依然戒心重重，采访时，曾多有误会。近20年的专业历练，帮助自己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迅

速判明方向，找到了克服困难的“抓手”和“钥匙”。

七

总体说，台湾老兵们内心渴望表达，他们时刻心系大陆，关心两岸发展，衷心希望台海永久和平。在我看来，老兵群体，他们根在大陆，是台湾社会坚定反对“台独”、秉持一个中国理念的最忠实力量之一。实际上，也正是他们奠下两岸融冰交流的第一块础石。退一万步说，即便在国共兵戎相见的年代，冲杀一线的底层老兵，他们也仅是一介“武夫”而已。或被“拉壮丁”而入伍，或为“填饱肚子”而从戎，或受他人蛊惑而卖命，或迫于最基本的生物本能而苟活——他们绝大多数是寒门子弟、草根阶层。

因此，需要提请读者注意，这11位老兵都是普通人，或许同你的某位台湾老亲戚一样，他们曾经被视为“离经叛道”，乃至“很不光彩”。请从人性的角度予以关照，请将他们都看成是战争的幸存者吧！是时代赋予他们武夫的角色，其实，他们只是大时代的浩渺烟波里随风飘散的一粒粒微尘……

八

在台湾“驻点”的时间极其有限，所幸，经过一番努力，这些宝贵的材料已经收集完毕，接下来，便是回到大陆后再下工夫整理了。实际上，写作的过程并不比当初采访来得容易。除逐一核对手头电子资料（录音、视频、照片）外，还要将采访记录以及拷贝的日记、原始材料、手稿、图册等等加以归纳整理。每写一个人，都要借助相应的史料对照参考，包括人名、地名、时间、背景等等都需要详加核对。

感恩这个风平浪静的时代，感恩供职的单位。需要感谢的人很多，没有那些陌生却纯真、良善的人们，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断难行走自如。他们的身影时常在我眼前浮动，回忆那些紧迫却自在的日子，温馨和感动充盈我心……

必须指出，由于老兵们年事已高，加上时间久远，他们的记忆难免有误，或基于多种考虑，表达未必精准，甚至有些观点和表述也值得推敲。我的工作，就是在历史洪荒的戈壁滩上捡拾那些即将消失的残片遗存，并尽量保留其原生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在做一件抢救性的工作，若能得到读者诸君的认同，我心足矣。

限于本人的文史水平，加之时间紧迫，肯定有不准、不妥、不周之处，留下瑕疵在所难免，敬请当事人见谅并请方家指正！

作 者
2011年7月初稿，2012年4月修改，2013年4月改定
（E-mail：zhao83519987@126.com）

“老军统”洪淦棠：我今年104岁，黄埔分校十七期、戴笠门生



“高雄市有个104岁的老先生，是由大陆来台的国民党老兵，至今头脑清醒，精神好得很，这样的老人全台湾都已很难找到了。他还是广东深圳人，您要是过来采访，一定会不虚此行。”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魏国伟先生在电话里多次这样“动员”我。

2010年10月下旬的一天，终于抽空专程到高雄走了一趟。乘坐台湾高铁，从台北车站直达高雄左营，恰是台湾高铁的起点至终点，全程321公里，直达车不足两个小时就顺利抵达。

当天下午，魏先生带我来到洪淦棠老先生的寓所。洪老先生的小儿子洪金龙也特地放下公司的事务，赶了过来。洪老先生正是魏理事长所称的104岁老人，　　据老人自己介绍，他出生于民国元年之前3年，因此，104岁应指虚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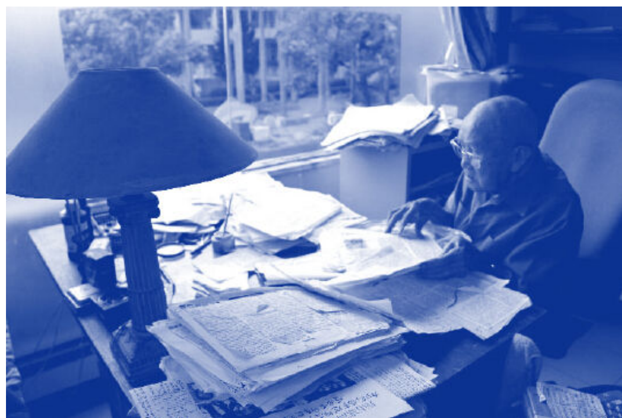
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又讲乡音很重的广东白话，我未必能听得懂，细心的魏先生特地请来一名从事广东话研究的粤籍“翻译”，让他协助我们之间的沟通。

抗战初年，他任随军服务团副团长

洪老先生的寓所在一栋临街建筑的二楼。

走进客厅，正面是一幅孙中山先生的肖像。进入老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内， 有一张书桌，一张简易床，这就是老人工作兼休息的地方。案头一盏台灯下，堆满了各种剪报资料。“老先生喜欢舞文弄墨，算是你的同行——他是台湾杂志协会的会员，还是《工商劳务画刊》的发行人兼社长，因此，他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魏先生介绍说。

“我是广东省宝安县洪桥头村人，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人，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虽然年逾百岁，可老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超好，健康状况之佳，完全超乎我的预料。得知记者来自深圳，他首先自我介绍一番。为了让我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老先生手握一支毛笔，遇到拗口的人名地名，他就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在纸上。自知听力不佳，老人说，你有什么问题也请写出来，我来回答。



“老军统”洪淦棠先生在自己的卧室兼办公室整理材料。

由于有“翻译”在一旁解释，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老先生所讲的年代都是民国纪年，因此，涉及年代时，必须加上11年，将其转换成公元纪年。

“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以下均按公元纪年），七七事变后，我开始参加抗战。不过，我参加的不是正规军队，而是‘战地随军服务团’，我任副团长，服务于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上将的部队。”

所谓随军服务团，是抗战开始后，由东南亚等地的一批年轻华侨自发组成的爱国救亡团体，他们多半是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各地华侨富商的子女。这支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的特殊抗日救亡队伍，成分较为复

杂。他们以原宝安县、东莞县，加上来自香港、广州青年会的年轻人为骨干，还有从越南、菲律宾、泰国、美国等回国的华侨青年共同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抗日。随军服务团团长是侨领邓锦辉，洪淦棠为副团长。这支特殊的队伍，通过广东同乡会、教会等民间组织联系形成。

根据相关资料，并据当事人的回忆录记载，洪淦棠先生所称的随军团，全名为“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最初是由广州男青年会及香港男青年会联合组成。青年会属于教会组织，在抗日随军服务期间，他们并不从事宗教活动，而是完全服务于抗日。随军服务团，成为一个鲜为人知，并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历史名词。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笔者曾查找相关资料。史料表明，随军服务团于1937年底成立，至1940年解散。随军服务团主要由粤港澳热血青年学生组成，他们很多人是爱国华侨。大陆方面曾有人撰文回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何家葵先生，在一篇题为《爱我中华》的回忆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岁月流逝，人生易老，往事多已模糊，能忆及的学生、青年计100人，他们来自各方，为了保卫中华把青春献给祖国，他们走在一起……激流过后，海河平静，愿这济济之众，尚存者自强，先逝者安息！”

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何先生在文中提及有名有姓的即有100人，其中，就有洪淦棠的名字。他就是“尚存者”之一，想必，时至今日，这样的“尚存者” 活在世上的已极难寻觅了。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洪淦棠先生所讲述的那段历史属实。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征募寒衣并发行公债（摄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部陈列室）。

洪淦棠老先生说，1937年，他们先是在广州协助抗战，广州失守后，他们随同吴奇伟（广东人）将军的队伍转战江西南昌、九江一线。

洪淦棠亲历了1937、1938年，日军两次对广州和南昌的狂轰滥炸。“1938年5月，我们在广州待了1个月，亲眼所见，有3000多人殉国。作为随军救护队，目力所及，到处是残壁断垣，满目疮痍，好惨啊！”老人颤声说，这次日军轰炸中，自己10岁的女儿也被活活炸死了。后来，广州沦陷，随军服务团随国民党部队北上，转战南昌一带。

“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曾有共70多架日军飞机轰炸南昌，真是惨绝人寰！”洪淦棠他们这批来自广东的随军团，此时共有200多人，被分成4个小分队，一部分服务于由商震将军率领的第二十集团军，另一部分服务于吴奇伟将军率领的第九集团军。

老人说，当时，自己所服务的部队有一位广东籍的将军名叫梁华盛（广东茂名人，黄埔一期，后为蒋介石所倚重——笔者注），两人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就是这位梁将军将洪淦棠引上从军救亡的征途。

减龄**6**年，考入黄埔军校

1939年，随军服务团同部队转战潮汕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洪老先生说，次年5月，经梁华盛将军介绍，自己报考黄埔军校，并一举考中，成为黄埔（燕塘军校）第十七期学员。参加随军团之前，洪淦棠曾经做了几年的私塾先生，文字表达功底尚好，在那个时代应属于文化青年了。

报考军校那年，洪淦棠实龄已32岁，年龄偏大。

为了顺利报考入学，他灵机一动，将年龄虚报为26岁，一下减去6年。“那时没有身份证之类，年龄随自己报。”老人说，当时，自己所上的燕塘军校，属于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长是蒋中正，分校主任是来自广东海南的韩汉英。洪淦棠老先生说，当时军校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多次转移，从广东德庆到广西宜山，最后在贵州独山落脚。三年艰苦求学后，洪淦棠顺利毕业。

老人迄今清楚记得临毕业前发生的一幕——

那天，韩汉英主任亲自来找洪淦棠。他远远就喊：“你是洪大哥吧？”

“报告长官，我不叫洪大哥，我叫洪淦棠！”

“我问你，你留校当教官好不好？”

“报告长官，我才疏学浅，怕难以胜任教职。”

“想当官？”

“不，我只想当军人。”

“那很好啊，你想到哪个部队去呢？”

“我军校毕业，立志报国，希望到一线部队去抗日杀敌。”

“很好！作为军校毕业生，理应到前线杀敌。”

就这样，洪淦棠没有留下来任教。但是，命运却因为另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发生了重大转折。

“戴先生”一眼相中，破格录取深造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党国正值用人之际”。戴笠（戴雨农）这个“特务总头子”应运而生，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其命运跌宕起伏，其人生之多姿多彩，迄今仍为学界和民间所津津乐道。

洪淦棠同戴笠这个名字联系上纯属偶然。

戴笠到学校，是要“伯乐相马”。他要为“党国”物色一批可造之材，用以培植个人势力，为抗战所需，更为蒋家王朝所用。

当年，戴笠被公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掌管军统局，名声极响，提起他的名字人人都敬畏三分。他来军校物色人才，希望相中一批精英分子进行“深造”， 组成高级参谋团，为战局服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情报收集工作，直接服务于战场，以维护国民党的江山社稷。为了网

罗“党国精英”，戴笠特设了一个高门槛，要求必须是上校以上官衔者才有资格入围。

许多学员慑于戴笠的淫威，又害怕到前线卖命，因此畏缩不敢报名。当时，洪淦棠仅是中尉军衔，不符合“深造”条件，就因拒绝留在后方当教官，而愿意上前线杀敌，被认为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牺牲精神，受到军校长官的好评。这一点恰好合乎戴笠的需要，于是，他一眼相中体格出众、血气方刚的广东仔洪淦棠，极力拉他入伙。就这样，本想到前线领军抗日的洪淦棠，阴差阳错成为戴笠一手培植的“军委会参谋班”特七期学员；未能如愿到前线杀敌为女儿报仇雪恨，却被送到陪都重庆受训。他的个人命运，也因此同戴笠发生了牵连。



在台北国民党党部，陈列着中统局特工郑频如在上海沦陷区锄奸的事迹，以及中统局机密刊物《情报》。据称郑即 张爱玲小说《色·戒》的原型，该小说已被拍成同名电影。

“戴雨农少将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军统局掌门人，我们都习惯性称他为戴先生。”在当时，因其行事极其诡诈神秘，又深得蒋介石的宠信，被视为一代奇人，为军情人员所仰视。在洪淦棠心目中，“戴先生”永远是一个偶像级人物。

经过严格训练，洪淦棠顺利结业，随后，继续被选送到陆军大学战教班（一期）深造。集训1年后，洪淦棠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高级特工，正式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干将。他被分派到“军委会国际科”工作，专门搜集国际情报。基于战事需要，此阶段专门收集日本军情。与此同

时，洪淦棠还兼任参谋班的教官。迄今，他只记得一个曾与自己一起共事的同僚，他是山东籍科长王汝桐。

“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最先为军统局截获”

尽管年代较远了，可洪老先生提起戴笠，依然眼睛发亮，声音也立刻大起来：“戴先生真是一代奇人，提起他许多人都会敬畏，能在他手下工作，之前想都不敢想。”他回忆说，其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风云变幻，胜负之间谁也无法逆料，战局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情报工作尤为重要，一个关键的情报甚至会扭转整个战局。

洪淦棠说，戴笠一生搜集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当年，戴笠的情报网络遍布全球，可谓无孔不入。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因为这宗重大的情报未被采信——因美国人疏失，日本成功偷袭了珍珠港。

当时，戴笠手下的谍报人员已经收集到了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信息， 拿到这份绝密情报后，戴笠立即上报给蒋中正，蒋中正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可是，美国人根本看不起老蒋的情报能力，压根儿没有予以重视。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得逞。

不过，美国人由此对戴笠刮目相看。这件事之后，蒋中正和戴笠也更加看重情报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洪淦棠加入军统时，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可“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经典教案，戴先生在情报人员中经常提及”。

洪老先生说，自己所在的国际科工作人员有100多人，属于戴笠庞大情报网络中的一个局部。戴先生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当时在情报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使在日本皇宫内也有他的人。“每天，我们国际科的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最新信息上报给戴先生，他整理后再报告给蒋中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程序。”洪老先生双眼直视着我道，“我的这些经历，从来没有开口对外讲过，包括我的儿子他都不知道。今天，我是第一次告诉家乡来的记者朋友。”

他说，有些情报到后来才逐渐被披露出来，有些还被人争执不休，而作为一名军统情报人员，自己当年早就了然于胸，只是因为保密纪律，才咽到了肚子里……

“共军定时炸弹半夜响起，我捡了条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政局发生了剧变。

抗战胜利后，很多军人回到原籍，一些战时建制也被取消。洪淦棠身份改变，他被留在重庆训练青年军。不久，孙立人将军所率的入缅甸及印度的远征军也胜利返回国内。戴笠随即将洪淦棠调往孙立人所率的新一军。洪淦棠因此随新一军回到广州，从日本占领军手里接收战略物资和军需品。

经过8年抗战，洪淦棠再次回到祖籍地广东宝安县（现深圳市宝安区）。他说，抗战期间，自己一心一意为了抗日救亡，并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战事紧迫，长期不能回家探亲。“我太太在家里守了8年活寡啊！”忆述当年，洪老先生无限感慨，“那时她还很年轻，嫁给我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我的好太太，虽过世多年，我现在还一直在怀念她！”说到这里，洪淦棠老人眼里盈满了泪花。



降書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
統帥無條件投降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
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
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
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

国民党党史馆陈列的日本投降书。

部队奉命在广州休整，洪淦棠这才有机会将太太和68岁的老父亲一并接到了广州。“我本来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可她被日本人炸死了，想起这些往事我就会流泪。日本人！最可恨的就是日本人！”时至今日，说起这段历史，老人依然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恨意。

洪淦棠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刚刚安置好家人，部队发来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归队。原来，曾远征缅、印，屡立战功的远

征军，又要开始新的“远征”。只不过这回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同胞——共产党林彪所率领的部队。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洪淦棠受命随同孙立人所率新一军远赴东北，目的有两个：其一，接收日军的战略物资；其二，排挤共产党在东北的势力。

洪老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北上路径：“先是在香港待了两周，然后乘船北上，在海上颠簸了8天8夜才到达营口。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

“刚抵达时极不适应，秦皇岛的气温是零下20多度。”洪淦棠的新职务是新一军新三十师二科上尉参谋，依然是主管军事情报。

老人说，当时东北战事混乱，很多现象简直是匪夷所思：那里有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的军队，还有日本残军，都混杂在一起。“苏联军队当然是偏向共军的，并‘别有用心’。他们将从日军手中接收的军械物资等慢慢地一点一点交给国军，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共军到来，他们是希望将武器物资交到共产党手里，壮大其力量，并由此怂恿国共开战……”

洪淦棠所属部队为新一军下属新三十师，在锦州一带同林彪部队周旋。开始时，国军进展顺利，可谓“势如破竹”，连克锦州、四平等地，直捣长春，陈兵松花江畔，目标直指共军势力占据的东北大都会哈尔滨。洪淦棠说，战局开始时，国民党部队确实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共军完全处于劣势。老蒋盘算，将共军逐出东北只是时间问题。

未曾料到，战局随时间推移开始发生变化。在昌图、铁岭一带的夜战中，洪淦棠身负重伤。而在此前的抗战时期，洪淦棠已经负过一次伤。这次受伤，给洪淦棠留下了终身印记。他捋起裤管，脚腕处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老人终身不忘。当时，作为先遣队队长的洪淦棠率领300人急行军穿插，“林彪的部队十分狡猾，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洪淦棠率部顺利从共军手里夺占了一个据点，晚上，他们就在据点里的一座红楼内休息。睡到半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楼塌屋倒，硝烟弥漫……洪淦棠所率部队死伤惨重。住在三楼的洪淦棠，被抛到数十米之外，虽幸免于难，但是腿部受了重伤。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元气。

“林彪部队好笨啊，竟让我蒙混逃脱”

在东北期间，洪淦棠参加了著名的“四平街大战”，而记忆最深刻的当属“城子街之战”。他所讲述的这段历史，有史料如此记载：“……新一军在一下江南中被林彪围点打援吃掉了近两个团，二下江南中第一仗在城子街被吃掉一个团，但第二仗在德惠就打了一个翻身仗，守点部队没被吃掉，援兵也没被吃掉，三下江南也没有吃亏。”城子街成为国共拉锯战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双方拼死争夺。洪淦棠记忆中的“城子街保卫战”，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林彪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兵力大增，以3个纵队围攻城子街。双方激战两昼夜，3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洪老先生神情黯淡地说，就在这次战役中，自己成了林彪部队的俘虏。

洪淦棠失魂落魄地随国民党残兵败将被押往哈尔滨。经过甄别、教育两个星期之后，他竟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回家！

这是何故？

“林彪的部队好笨啊，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据最新资料，其应为新一军三十师89团谍报队队长），我谎称自己是上士文书，他们果真相信了！”回忆这段往事，洪老先生笑道：“我讲广东话，共军基本都是北方人，没人能听得懂，加上要审讯的人太多，工作人员马虎潦草，我就这样蒙混过关了。”他补充说：“也许，是得益于多年的特工训练；也许，是他们看我个头不高、年龄也偏大了，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放了我一马。”

作为戴笠手下的老牌军统特务，洪淦棠幸运逃过一劫。

回忆那段日子，老人迄今心有余悸。他先是从东北一路南下跑到上海，再转道前往南京，最后回到了广州，回到了国共内战爆发前自己的出发地，同家人再次团聚。

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这段时间是洪淦棠从军以来最安逸的一段日子。

史料真实记载了当时的战况。“孙立人因与国民党内其他将领如杜聿明等不睦，1947年8月，蒋介石将孙调离东北。”据称，得知孙立人调离东北这一消息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长长舒了一口气。果然，一年之

后，孙立人曾指挥的新一军，在长春围困战中被消灭殆尽。

离开东北之后，孙立人就任陆军副总司令，洪淦棠遂继续追随他，再次回到孙立人所统领的部队服务。1949年5月，洪淦棠离开广州，并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金门，供职于炮兵部队，家眷则被安顿到高雄。

“本不想离开大陆，可是，在时代大潮面前，个人力量十分渺小，犹如一粒微尘，飘扬何处早已身不由己了。”回首往昔，洪老先生无限感慨。

告别金门“前线”，已是两鬓斑白

在金门的炮兵部队服役多年后，洪淦棠才有机会“轮调”回到台湾本岛。追忆往昔，老人满含深情地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形：“1961年春，老蒋开始轮调金门防卫司令部和炮兵指挥部的高级指挥官。直到1963年冬，我才有了轮调回台湾的机会。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对我慰勉甚多，临别之际赠送金门特产高粱酒多瓶，并嘱多多联系。”金门防卫司令部指挥官亲自设宴，“把酒凌空，互道珍重”。

在洪淦棠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11月1日，中午餐会后，车送我乘机离开金门。是日，晴空无云，空中俯视海岛，只见战垒连环，海岸四周的军舰、渔舟点点，扬帆逐浪。碧海无波，风晴浪静，万不像炮火连天的战场……”这是一位久经沙场即将告别前线的国民党军官的永恒记忆：“下午1时，航机安抵台北，归心似箭的我，搭上南下高雄的客车，深夜到家，80岁的老父和妻儿皆大欢喜——征战多年，饱尝硝烟与战火，回家之际已是年近花甲……我很感谢能够治家、侍奉父亲并教育子女成人的患难贤妻，还有宝玲、海龙、莉馨、金龙四个孩子，他们因我而尝尽别离之苦……”

从金门轮调回台湾后，洪淦棠并没有立即脱离军界，而是任职第二军团司令部炮兵组组长，寄身廖志远将军麾下，廖是他的老长官。“同仁也多尽职工作，生活极为安适。”洪淦棠用这句话形容这段时期的生存状态。可是，安适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他本想在军部多工作几年，可事与愿违，由于台海紧张局势趋缓，军队不会再养闲人了，国民党部队开始限制军人年龄。到了1966年，洪淦棠因“超龄”才不得不告别军旅生涯。

从1940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起，至1966年退伍，洪淦棠的军龄长达26年。按出生年龄实算，此时，他已经57岁了。“语谓解甲归田，可我

已无田可归，只有从事社会服务，安度余生。”洪淦棠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真实心境。

退伍时，他的军阶为中校炮兵作战官。

凭洪淦棠的学历和资历，本不应该止于这个官阶。对此，洪淦棠唯一在台湾出生的小儿子洪金龙先生有自己的看法：“由于家父在东北曾经当过共军的俘虏，尽管又回到了军中，其实已被列入另册，只是当局认为此人尚可利用，没有多加追究，可他再也没有进一步提升军阶的机会了。”

“自己人打自己人，我真的很心疼”

洪淦棠老先生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国民党军队，余生也都在为国民党服务。”迄今，和众多台湾老兵一样，洪淦棠享受着每月3万多元新台币的“终身俸”——蒋介石对早年败退台湾的退伍军人，一律给予“荣民”身份，并颁发“荣民证”，按照军龄和军阶享受不同金额的终身养老金，称为终身俸。荣民故去后，其配偶依然可享受一半养老金，直至亡故。



尽管已是高龄，老人还获聘担任多项社会职务，委任状有一大摞。

在漫长的岁月里，洪淦棠老先生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并经历了国共两党之间由合作到兵戎相见。“当年，我们是怀抱着抗日救亡的想法参加随军团，后来又去报考军校，从此成为一名军人。8年抗战之后，却身不由己地沦为内战的牺牲品。回忆过去，除了抗日以外，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想想这些历史，我心里真的很疼很疼……”

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本来，洪淦棠不想再离乡背井远赴他乡，可是，一是老长官孙立人的力邀，同时，也是身不由己——“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其实十分渺小，可以说微不足道。你是被推着走，容不得思考和选择。”

洪老先生退伍后，一直热衷公共事业。近些年来，他更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威信，积极为国民党籍人士竞选高雄市长、“议员”而奔走呼号。他说：“助选的目的就是要为两岸和平着想，坚决反对‘台独’。”

洪淦棠退役时，正值蒋介石当选“第四任总统”之际。他被负责退伍军人事务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高雄荣民服务处”聘为监委会委员。洪淦棠为国民党籍人士参选省、市“议员”而积极助选，由此创办了《工商劳务杂志》，并参与筹组台湾杂志事业协会高雄分会。自1966年至1986年的20年间，洪淦棠借助刊物平台，以“牺牲、负责、奋斗、人和”的精神，以“肯吃亏、肯为人服务”的态度，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并为多位国民党籍参选人当选立下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洪淦棠还创办“退伍老兵合创清洁服务公会”，历任常务监事；随后，又创办礼仪用品商业公会，公会由初创时的7家会员，到9年后的第三届时，会员单位已达到了150余家，洪淦棠也连续担任9年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油漆涂料商业公会监事。

除了从事公益事业外，他还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两届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现在依然是高雄广东同乡会的荣誉理事长；担任世界广东同乡总会第二届常务理事，高雄市老人康宁协会理事长，模范老人协会常务理事，并担任中华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老人育有两儿两女，大女儿宝玲现年已65岁，二女儿莉馨59岁，大儿子海龙61岁，最小的儿子金龙在台湾出生，也有57岁了。

洪老先生说，在大陆深圳，还有自己的两个侄子，以及侄孙等多人。他们有的进入工商界，有的担任共产党的地方干部，生活得幸福如意。

老人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深圳亲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心里对大陆深圳的亲友十分牵挂。”他告诉笔者，自己祖孙四代嫡亲现有20余人，至亲外戚在海峡两岸共有近200人。

洪门多习武，素有忠勇传统

老人的小儿子洪金龙先生，为我提供了不少父亲的回忆资料。从中可知，洪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大家族，久有习武报国的渊源，且族人中长寿者众。

洪淦棠的父亲洪连桂，曾是岭南一带颇有名望的洪派国术拳师。在民国初年，广东宝安县境内土匪为祸乡里，一时人心惶惶，洪连桂被推选为乡勇团长。他将乡里的年轻人编成乡勇队，规定无论男女，16岁以上者均入队。一时间，“家家有枪，户户结盟，遇匪来犯，立即鸣炮示警，并互相支援，匪惧不敢来犯，地方遂得以安宁”。洪连桂因此受到乡邻拥戴。

借助习武之便，洪连桂师徒组成麒麟鼓乐队和威风雄狮队。“每逢年头岁尾，春节喜庆之日，则分赴各村贺岁，乡邻皆放鞭炮相迎。”洪连桂为师多年， 培育了不少著名的国术教练，名传海外，港澳人士纷纷邀请其前往设馆。抗战初期，在香港新界、元朗，洪连桂均设分馆授徒。新加坡、泰国、越南的侨胞子弟纷纷回国拜师，因此，洪公门徒遍及海内外。

1951年冬，在长子洪淦棠邀请下，由次子洪庆伟（也是有名的国术拳师）陪同，洪公来台湾安度晚年。在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李盛华等乡亲盛情邀请下，老人组成南台湾最大的一支雄狮队，每年春节期间都在锣鼓鞭炮齐鸣中，为高雄市民贺岁。并在每年的台湾“双十节”期间，应邀参加“迎侨”活动，为广东同乡增添无限光彩。

笔者在台湾驻点采访期间，目睹了一场台湾“双十节”庆典的洪门汇演彩排。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的广场上，只见成千上万的洪门子弟，身穿统一服装，在龙狮助威下，威风凛凛地表演传统武术。宋楚瑜、郁慕明等泛蓝政治领袖纷纷前来观摩并致辞。由此可见，在台湾现行政治生态下，“洪门子弟”已经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

洪连桂老人年逾80，才将舞狮队交给下一代子弟。得益于习武，老人身体健壮，直到后代子孙及同乡为其举办90大寿时，他仍能现场打拳献艺，留下一段佳话。洪连桂老人活到93岁才告别人世。

据载，由洪连桂再上溯一代，即洪淦棠的爷爷洪九渭，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洪九渭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不幸在战斗中阵亡。据了

解，岭南国术源自少林，分为洪、刘、蔡、李、莫等流派，尤以洪派为首，素不与清廷合流，并暗藏反清复明之意。由此可见，岭南洪氏家族，历来有尚武传统，且多刚猛勇武之士。

“盼国共再合作，尽快实现中华一统”

脱下戎装，成为一介平民，洪淦棠倾心于办报。多年来，他担任《工商劳务画刊》及《华夏春秋杂志》发行人兼社长。1990年，洪淦棠首次回乡正是以台湾杂志协会参访团名义成行。

采访结束，告别老人之际，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请一定代我向大陆深圳的亲人问好！”最后，他一笔一画在纸上写道：“请代为问候各乡亲，并请常来访，请到桥头村代为问候我侄孙。”

离开高雄市，我返回台北市寓所。几天后，收到一封挂号信，这是洪淦棠老先生的小儿子洪金龙邮寄来的函件。打开一看，其中有老人手书的《淦棠家世简记》，有老人手书《回忆录》部分片段，他所编辑的《工商劳务画刊》若干影印件，以及老人以前所写的部分文章等。

尽管年事已高，洪淦棠老先生依然关心政治，一直在为国民党籍的高雄市长候选人选举进行助选催票活动。其中一篇《各省市旅高（雄）同乡会支持吴敦义后援会工作总结报告》表明，这是国民党籍候选人吴敦义高票当选为高雄市市长之后的总结报告。从中可知，在老人的倡导下，广东、湖北、山东、河南、河北、贵州、福建等地在高雄市的同乡会，纷纷成立助选后援会，进而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选举力量。

“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成为洪淦棠助选的响亮口号。2010年台湾首次举行“五都”选举，洪淦棠在自己的报刊上发表《致大高雄市民一封信》，公开呼吁：“坚决反对台独，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黄昭顺当选！”

这里，谨摘录洪淦棠老先生尚未完稿的“自传”序言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老军统”洪淦棠在寓所内，正在劳神苦思——撰写回忆录。

当前，海峡两岸正从漫漫长夜中展现出无限的曙光，期望台湾中国国民党吴伯雄、马英九、连战、郝伯村、许历农、吴敦义，以及大陆中国共产党胡锦涛、温家宝等先生，以及海内外热爱中华民族的中国人，都以五百年必有之王者与大时代的胸怀，抱着“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大智慧与大决心，也以毛泽东先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大气魄，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团结各党各派与全民，以最短时间，完成中华民族统一和解的千秋大业，进而世界大同，这是我深深的期望。

附记：“阵亡”参谋洪淦棠日记透露惊天秘密

2013年6月18日，本书稿完成二校，正待寄往出版社定样付梓，喘息之余，我上网随意百度了一下“洪淦棠”这三个字，竟跳出“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处参谋洪淦棠的日记”条目！而在一两年前，大陆网站根本百度不出“洪淦棠”的任何确切信息。于是，我好奇地点开阅读起来。

这是一家专业网站选载的“民国老日记”丛书片段，该网站去年6月才上线。选摘的是东北民主联军缴获的“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处参谋洪淦棠”的六篇日记。日记中披露的惊人信息，仿佛复活了一段历史。

通过时间、地点比对，完全可以肯定，该日记正是洪淦棠被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俘获后所得。这段史料佐证了本篇的相关内容。只是恐怕出版“民国老日记”的编者做梦也没想到，66年前被盖棺定论已“阵亡”了的日记主人洪淦棠，迄今依然好好地活在世上。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洪淦棠与笔者交流时的那句笑言“林彪的军队

好笨啊，竟让我蒙混逃脱”，并非自吹自擂。身为戴笠的得意门生，洪淦棠果真没有辱没师名。现在看来，洪淦棠被俘后一定是隐姓埋名，装聋作哑，玩了个金蝉脱壳。这个正牌军统老特务太狡猾了！他简直是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若不是笔者有幸在台湾亲见洪老先生，钩沉起那段历史，恐怕谁也不会记起上世纪40年代那种混乱不堪的局面，谁也不会意识到，当年威名赫赫的“林彪部队”竟被这个“老军统”蒙蔽至今——诚然，这也是两岸分隔的现实使然。

放眼当下，同代人已所剩寥寥，而这个隐居数十年的“老军统”，依然悠游自在，年逾百岁的他，在宝岛颐养天年……

乌龙：日记主人已在战斗中“阵亡”

《日记》编者在开篇即言之凿凿：“1947年2月23日，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的城子街之战后，东北民主联军缴获了国民党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处参谋洪淦棠的日记，日记的主人在这场战斗中阵亡。洪淦棠系广东宝安人，据此战被俘新一军三十师八十九团团长曾祺说，洪淦棠战前已经升任该团谍报队队长。”

《日记》编者介绍了国军参谋洪淦棠所在部队的相关背景：新一军是一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郑洞国、孙立人先后担任这支军队的长官。该军主要由知识青年组成，他们带着保家卫国的豪情加入新一军。新一军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是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由于在缅甸战场战功卓著，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受到国人的极高崇敬，甚至新一军的普通官兵都成为众多少女的梦中情人……

城子街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的一场战斗。1947　年2月21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向吉（林）长（春）以北分散守备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急令位于九台城子街守军第三十师第八十九团（附师属山炮营）回撤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即以第六纵队主力和第一纵队第二师奔袭城子街。22日，第一纵队第二师出其不意地插到城子街以南，将已南撤之第八十九团先头堵截，该团缩回城子街。23日10时，第六纵队两个师，在炮火支援下，对城子街展开攻击，激战至19时，将守军全歼。

沉沦：日记主人曾有堕落行为

《日记》编者指出，洪淦棠的日记从1946年1月1日新一军驻防广州“衣锦还乡”之时记至1947年1月30日于吉林为止，然而，目前仅能找到1946年4—9月的日记六篇。这六篇日记反映出新一军进入东北战场后腐化、堕落、军纪败坏的情形。一方面日记主人对新一军上层的贪污、腐化行为深恶痛绝，谴责他们使得“新一军的荣誉因此消失”；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下级军官，他也未能幸免。在内战的旋涡中，他的思想同样变得萎靡、困顿，甚至动下寻找“日本姨太太”的念头和做出嫖妓的行为。曾经军纪严明、朝气蓬勃的新一军内战前后的变化令人深思。

《日记》编者认为日记主人身世成谜。因此，在编者按语中，只能以模棱两可的语句结尾：“关于洪淦棠的身世，我们不得而知。查阅历史资料，发现1938年广州沦陷前，广州青年会战时救伤队曾有一位名叫洪淦棠的青年参加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由于新一军的洪淦棠为广东宝安人，且时间上也大致符合，不知此热血青年是否与新一军洪淦棠为同一人。”

真相：热血青年痛惜新一军堕落

洪淦棠六篇日记摘录如下——

四月五日(1946年，下同)

师部不发饷，士兵生活殊多影响，负责经济部门者，究竟拿这些钱做些什么？他们大概又拿到银行生息去了。唉！腐化的行为，使人慨叹！读袁崇焕致明崇祯皇帝奏折：“朝廷不发饷，军心离散，不堪则哗变……”语痛心创！……本师要继续不加整顿，长此以往，余不觉为之慨叹！

四月二十一日

××××（编者按：此为日本女子名）来到此地，服侍确实周到，日本人确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讨个日本人做姨太太，也显得舒服。近来同僚，也常有这个动念……准不准由他，好自为之，枯燥的军人生活，转变了一妻主义的观念。

七月十日

晚饭余清荃与耀邦兄做东，送邓返里。饮后偕至亚洲饭店，邓要找

女郎渡（度）夜，余也相陪。余乃第一次接近神女，陪余之女为范丽娟，长沙桃花江产，高大而美，室中愁说，受新一军少校军需（官）艾思伦之骗，遗弃并殴伤，因生活所迫而出卖灵魂……

八月六日

白参谋连日为同事作婚姻媒介，十分努力……若新一军多驻些时间，海城女人将去过半，人去楼空，海城父老有知，能不引为忧虑！

八月二十一日

今午赴剧场看戏，前排坐着一群雍容贵妇，几个贪婪的地方官，大谈大笑，旁若无人，丑态使人刺激。近来环境之恶浊空气，营私偷卖公物，互相为利的恶劣行为，使人愤慨。一个人事科，竟吃空额二百名。士兵可以数月不发饷，六月饷八月才发，七月饷遥遥无期，你叫那些守纪律不敢偷闲的弟兄们怎样活啊！军需处不负责，听说是透支过多，手续不清，人事科可以虚报二百空名，这些无人招领的薪金，自然是落在强有力人的手里，怎不令人痛心？又难怪共产党对我们的抨击，事实如此！

九月二日

最激人愤怒的是当前环境，这次同车来几位部队长，走运私盐，他们都肥肠脑满，腰缠数十万，大可面团团做富家翁，却不知新一军的荣誉却因此消逝矣。如此军队，如此人！

附：《新一军军歌》

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罔，矢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 不怕刀和枪，誓把敌人降， 亲上死长，效命疆场，才算好儿郎。

第一体要壮，筋骨锻如百炼钢，暑雨无怨伤，寒冬不畏冰雪霜。劳苦是寻常，饥咽秕与糠，卧薪何妨，胆亦能尝，齐学勾践王。

道德要提倡，礼义廉耻四维张，谁给我们饷，百姓脂膏公家粮。步步自提防，骄纵与贪赃，长官榜样，军国规章，时刻不可忘。

大任一身当，当仁于师亦不让，七尺何昂昂，常将天职记心上。爱国国必强，爱民民自康， 为民保障，为国栋梁，即为本军光。

感谢互联网时代，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真相只有一个……不管怎样，谜底已被揭开。如何解读，那是读者的事。

（相关资料转引自“人物传记音视网”——作者注）

“不死老兵”姜思章：坐牢时，一名驾机叛逃死囚教我学会“忍”



老兵姜思章14岁还差4个月、正读初一时，在由学校回家的半途中被抓入伍，旋即被押上运兵船驶往台湾。青年时“因想家入罪”判刑三年；中老年时参与策动老兵返乡探亲、两岸直航等街头运动，曾“先他人一步”冒险返回大陆省亲；晚年时，时常穿梭两岸，是和平使者。

多次约访，前后面谈三次。

台北之夜，第一次看完姜思章的材料，令我心潮难平。写此文时，已离开宝岛返回深圳，夜阑人静时，再次研读采访资料、放听录音，当年国民党老兵冒死返乡探亲的真切描述，令我一次次泪眼朦胧。

饱经沧桑、一身反骨的姜思章，其数十年间所演绎的“老兵不死”传奇，折射出中华儿女孝道为先、忍辱前行的优秀品质。

姜思章曾“大闹天宫”，令台湾当局头痛不已。如今，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捷运（地铁）站口，走到哪里都喜欢戴一顶鸭舌帽的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人。

初见姜思章先生，即被他直刺背脊的目光所“震慑”。在他约定见面的台北女书店内，第一次握住他的手，他劈头就问：“你怎么找到了我的电话？”我说，从退辅会和外台会。他答，退辅会是官方机构不会给你电话，外台会有可能……

未满14岁被掠，惨绝人寰不堪回首

姜思章的故乡位于舟山群岛的岱山岛。

时光进入1950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已在北京宣告成立，可东部沿海众多岛屿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下。这一年的5月13日晚至16日，对10余万驻守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一个风雨飘摇、前程未卜的悄然大逃亡时段，而对群岛的黎民百姓来说，则注定是一个撕心裂肺的时刻。

那年，无忧无虑的姜思章，是县城岱山中学的一名初一寄宿生。14岁还差4个月的他，完全是一名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15日这天，国民党部队秘密撤离已近尾声。发疯般的国民党军，依然在四处抓人。学校的男老师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而初中高年级男生也已躲藏得不见踪影。

身材矮小，还未发育的姜思章及另两位同村男生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年龄太小、身材又矮，站直了还不及步枪高，被抓壮丁的厄运似乎离自己还很遥远，心里也就没当回事。学校已经停课，几个小伙伴相约背起简单的行李，顺着新修的军用公路步行回家。

祖母十分溺爱这个长孙，父母亲也特别疼爱听话的长子。每逢过生日，母亲都要按照乡风习惯煮两个鸡蛋，用布兜装上，挂在他的脖子上。少年姜思章边走边憧憬祖母和姆妈为自己过14岁生日。作为舟山群岛的第二大岛，岱山岛上的鱼盐资源丰富，岛民生活丰衣足食。可10万国民党军队的到来，彻底打破了岛上居民的平静生活。

走着走着，他们不知道危险正步步逼近。就在离家仅一华里左右时，一队正愁着无人可抓的国民党部队迎面走来。不由分说，这三名同学成了聊资充数的“壮丁”。

随后，几名学生被押往一处临时住处。姜思章特别注意到，这支部队的军服上有“贵州部队”标识。经过半天的行走，粒米未进的他们，渐渐感受到了死亡般的绝望。“求求你们放了我们吧，我们还小，我要回家……”看着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听到他们肝肠欲断的哭泣，带队的连长动了恻隐之心。这位青年军官不耐烦地下令：“留下你们也是累赘，你们滚回家算了！”

看到这几个惊魂不定的娃娃，这名军官还扔给他们几张烙饼，并嘱

咐："可别乱跑噢，你们几个先藏在附近尼姑庵里，等我们都走后再离开，要不然还会被别的部队抓走。"

他们对这位军官千恩万谢，可这几个少年没有听信这位军官的话，因担心对方反悔，他们趁人不备，从尼姑庵里跑了出来。果然刚走不出多久，就被另一支部队给抓住了。后来才知道，这回抓他们的是十九军十八师机枪连。

几个小孩用沙哑的童声苦苦哀求，可这回再也没有好运气了。见他们号啕大哭，看守的战士抡起枪托就打，小小年纪的姜思章被打得腰都直不起来。同行的学生中一位同学患有疝气，他以此为由上前声明此病按规定不能当兵。见没人理会，以为是得到了默许，便快步疾走准备离开。可刚走出几步，即被士兵从背后举枪命中，当即倒地身亡。经此杀鸡儆猴后，姜思章和同伴再也不哭不闹了，只得乖乖地跟在大兵屁股后面行走。

经过连夜步行，直至第二天清晨，才来到码头边，在厉声呵斥和枪托催打中爬上最后一艘撤往台湾的巨舰。

缓缓离开之际，岸上警戒随之解除。大批前来寻找亲人的妇女立刻围拢上来，哭喊、祈祷、诅咒之声一片。多年以后，姜思章才知道，哭喊的人群中，就有自己的母亲。船越行越远，家乡岱山岛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在视野中。年少的姜思章哪曾想到，从此一别，与父母再相逢时已是数十年之后。

在国民党军史上，这次秘密军事行动，就是著名的"舟山大撤退"。史载，短短4天内，约14.8万人秘密撤往台湾，其中被抓民众1.3万多人。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53岁。姜思章就属于其中的最小者之列。

不过姜思章说，一般的历史文献中都是这么写的，他也以为自己就是最小的那位，其实不是，还有一位比自己还小，也是舟山人。"他叫桑品载，比我还小两岁呢，他是阴差阳错上了船。"

姜思章在讲述自己的命运遭际时，先插叙了有关桑品载的一段"奇闻"。

原来，借住在桑家的一位国民党萧姓连长看上了房东的漂亮女儿，

也就是桑品载的姐姐。接到上峰命令要立即撤离，萧连长临走时希望带她去台湾，向女房东提出请求。她妈妈一时糊涂，竟允诺了。但转而觉得女儿还小，不放心，希望这位军官连同她的弟弟一同带走。但临登船时，因运力达极限，上峰命令清理“无眷属证明，私自上船的女子”，但男丁可留。结果无眷属证明的姐姐被赶下船，弟弟桑品载却阴差阳错留在了船上。

当然，这是姜思章来台多年后才知道的另一悲惨故事。饱经离乱之苦的桑品载后来成了一名作家，迄今仍健在。笔者曾辗转联络，未果。

臭气熏天的底舱，饱受煎熬的两天三夜

采访姜思章，是在断续中完成的。

在姜思章老人家里，他请我看一张老照片。这是他刚刚被抓来台湾时的黑白照。这是一张充满怒容的脸庞，少年的面部没有一丝快乐的迹象。如果你也是一位家长，试想一下，一名不足14岁的孩子一夜之间被迫离开了父母，做父母的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名少年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局面？还是顺着老人的讲述听下去吧。

与姜思章一同被抓的另一位同学叫王岳清。两个可怜的孩子被押到码头时，已经被要求换上了军队制服。“土黄色的军服，罩在身上，显得极不合体。”这标志着，从此他成了一名军人。

虽然船舰很大，可塞满了人和辎重，实际上已严重超载。它喘着粗气，笨重不堪地缓慢移动。一些不堪被抓的青壮年，在船只开动之际纷纷跳海，伴随“哒哒哒”一阵机枪扫射，海面血水泛起，尸体死鱼般浮在海面。后面的人再也不敢冒险跳海了。这样的情形，只看得少年姜思章胆战心惊，一个弱小的生命从此刻开始，要独自品尝人生的悲苦离愁了。



愤怒的少年：刚被抓来台湾时，姜思章留下的唯一照片。

轮船离开海岛，向茫茫大海深处航行。家乡渐行渐远，熬过撕心裂肺般的剧痛之后，躯体变得疲累，船上的人也开始安静下来。姜思章被挤在最下层的货舱内，仅有一个可以容身下坐的空隙。航行了两天三夜，每天，每人可分配到一碗米饭两份大饼。饥饿还可以忍受，可没水喝更令人难熬。

料定插翅也难逃了，那些被抓的人，才被允许自由活动。印象最深的还是接水喝：甲板上仅有一个水龙头，可用碗接水的人群拥挤不堪，少年姜思章挤了半天才弄到半碗水止渴。维持秩序的警卫手拿棍棒，动辄横扫过来。姜思章个矮， 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每次棍棒打过来，他灵活地往下一蹲，就避过了击打。

厕所也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混乱不堪之际，为了活命，谁也不能指望别人，一切都要靠自己想办法了。夜已深了，一阵困倦袭来，他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到了5月19日上午，船上忽然发出一阵骚动。只听有人说：“到了，到了，台湾的基隆港到了！”此时，从前边传过话来：“每个人都要打起精神！”并要求脱掉夹衣厚裤，换上单衣。并且每人发放一条长形米袋，要求统一斜挂在胸前背后。这里的气候果然同岱山有别，仿佛一下从春天进入了夏天。

船缓缓靠岸，只听岸上高音喇叭战歌高奏，随即有人大声嚷：“蒋夫人率反共抗俄妇联会干部来欢迎舟山胜利归来的将士了！”虽然声震如雷，可少年姜思章充耳不闻，他只顾咬破胸前米袋，一口一口地啃食生米——海上惊魂不定的日子过后，第一次脚踏实地，他忽然感到饿坏了。走在身后的王岳清提醒他：“快看，那边!”他顺指一看，在一个高台上，一群女人围着一个浑身白色的女子，她穿白色旗袍、戴白帽子、挥动白色手帕，这就是“伟大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了。在一片欢声雷动中，少年姜思章毫无所动。“她就像个守丧的妇女！”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姜思章如是说。

在一片“蒋夫人好！蒋总统万岁！”的口号声中，衣冠不整的军队通过夹道欢迎的人群。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在齐声高呼：“欢迎！欢迎！欢迎忠勇的将士!”当看到年龄比自己还小的姜思章时，有女生不住地发出赞叹：“这么小就从军报国了，真的好伟大呀！”听得姜思章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学生们特别将双倍的香蕉、桔子、馒头之类的慰问品塞到姜思章手里。

部队稍停，他就请老兵代劳，将刚发的五块钱新台币慰问金，买了一把糖果，平生第一次将台湾糖果吃了个足饱！

不堪陆军折磨，改名易装投奔空军

姜思章所在的陆军十八师入驻台北第二女中。学生已经放假，部队起居都在学校的体育馆内。按部队的规矩，战士必须操练，每天清晨出操，要绕着校园的围墙跑步。

少年姜思章因绑腿不时松脱而落在队伍后面，因此，经常遭到老兵

班长的踢骂。部队每天只吃两顿饭，这种生活对一名少年来说，自然非常不习惯。

没有任何人同情你，也没有任何人教你怎么做。忙忙碌碌倒还好，可一有空就会想家，想家又无处倾诉。好在有王岳清陪伴，两人经常相依而哭，哭完了再互相安慰：“不会太久，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直到有一天他们遇到一个人，这才改变了既有的一切。

那天，照例是晚饭后的短暂自由活动时间，两人在操场上边走边说话。忽然，两人同时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竟是同学朱彪！朱同学其实比姜、王两人高两届，也曾在岱山中学就读。朱彪有初中学历，加上他是主动投军入伍，因此，被安排到师部无线电班，行动稍有自由。

得知朱彪有这样好的待遇，两人恳求朱彪介绍他们也到无线电班去。朱彪还真守信用，他果真向长官报告了两位学弟的想法。可还未等两位学弟去见新长官，就被嗅出味道的连长臭骂一顿，朱彪还因此挨了几个耳光。

避过风头之后，三人又聚到一起。这回是朱彪的主意，他问，你俩有没有胆量逃跑？原来，朱彪认识一位在台北松山机场空军工兵部队的浙江老乡黄连长，他们合计跑到那边去。在事先得到黄连长的首肯后，在一个傍晚，两个小鬼混在到营区外小河边洗澡的队伍中，轻易骗过了警卫。出了大门，两人飞步跑往松山空军基地。

温州籍连长黄云波念及同乡情分，加上部队急需要人手，便收留了他们。看到两人身着不合体的陆军服，他立刻命令换成空军地面部队的制服。为了防止原先的部队来缉查，黄连长要求两人立即改名。情急之下，姜思章脱口而出：“姜思章！”原来，在岱山中学，他有一位心仪的章姓女同学。王岳清顺着姜思章的改名思路，也立即改名“王思国”。他原本想叫王思家，觉得思家不大气，遂改名思国。

姜思章本名叫姜文标。由改名这件事可见，尽管小小年纪，姜思章要比同龄人来得早熟。

瞒天过海，国民党空军工兵部队从此多了两个娃娃兵。

每闻“思母曲”，异乡泪如雨

当年，国民党部队号称百万大军“转进”台湾，各部队、各兵种之间极其混乱，相互间逃来逃去，人员进进出出，甚至抓来抓去都是常有的事。这就有了姜

思章和同学换个“马甲”，加入另一支部队的机会。

半年之后，部队转移到台湾南部的冈山空军官校机场。回忆当年的时光，姜思章说，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一同被抓来的同学经常在营房一角抱头痛哭外，就是倾听驻地附近家属区高音喇叭播放的思乡歌曲了。

每当日暮时分，播报新闻之后就开始播放当年上海滩的流行歌曲。如《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等，这些歌曲对远离大陆的年轻人来说，是疗治思乡心病的一剂良药。

其中，最令姜思章动容的是《母亲你在何方》这首歌。这是1931年播映的由影星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恋爱与义务》的插曲。每当薄暮时分，听到这样的歌曲，他就会泪流满面。以至到了1987年，姜思章等人策动老兵返乡运动时，在当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老兵聚会上，他还带着数万老兵在台北一所中学的操场上集体演唱这首歌曲。“一时天地为之震动，万众为之唏嘘！”全场老兵们齐声演唱，泪雨纷飞。闻讯后，主政的蒋经国再也坐不住了。在去世前夕，蒋经国终于同意开放老兵返乡探亲。

时至今日，老兵姜思章提起这首歌依然思绪澎湃、情难自已——

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

经过那万里可曾看仔细？

雁儿呀，我想问你：

我的母亲可有消息？

……

儿时的情景仍梦般依稀，

母亲的温暖永远难忘记，

母亲呀，我真想你！

恨不能够时光倒移。

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防范“共党分子”渗透，残酷进行内部清洗。随着海峡形势的紧张，开始实施戒严，人为切断了两岸之间的一切人员和通讯往来。即便是通过香港等第三地的邮件也被严格限制。普通百姓甚至连置办收音机都要申请牌照。当局堵塞大陆信息渠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老蒋对两岸之间的信息渠道是慢慢收紧的，刚开始的一两年还可以通过香港等地转寄邮件。说起来，姜思章在不幸中尚有万幸，他在来台湾半年后，曾一度同家人取得了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的取得极具偶然性。

一则寻人启事，一个难以解释的“偶然”

人世间，亲情之间是否真有心电感应？这应是一个唯心的命题，可老兵姜思章的亲身经历，似乎佐证了“感应”的存在。

1950年11月的最后一天，部队操练结束，姜思章照例坐下来休息，正感到百无聊赖之际，发现身边有一张报纸，这是当年部队最常见也是唯一的一份“党报”。本来不怎么看报的他，竟鬼使神差般拿起报纸随便翻了起来。前面的版面照例是诸如“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一类的政治宣传。他正准备随手扔下，不知何故，暗中有一股磁力似的，他竟将报纸又翻看了一遍， 连报尾的分类广告栏也逐条仔细看完。

忽然间，位于第八版“副刊”左下角的一则寻人启事将他的目光牢牢“粘”在了上面：“寻姜文标（姜阿杏之子）,浙江定海岱山人……”几个黑体铅字，像被锤子击打心扉，姜思章心里一阵怦怦乱跳。在台湾，只有“姜思章”，已经没有“姜文标”这个人。仔细看清之后，颇有心计的少年姜思章悄悄记下了寻人启事上留下的联络地址。

按照地址，他找到了位于台北市西宁南路145号的联系人王先生。这才知道，原来是父亲托请在上海的亲戚，上海亲戚又托请香港亲戚，香港亲戚再托请台北的亲戚，登报寻找失散半年多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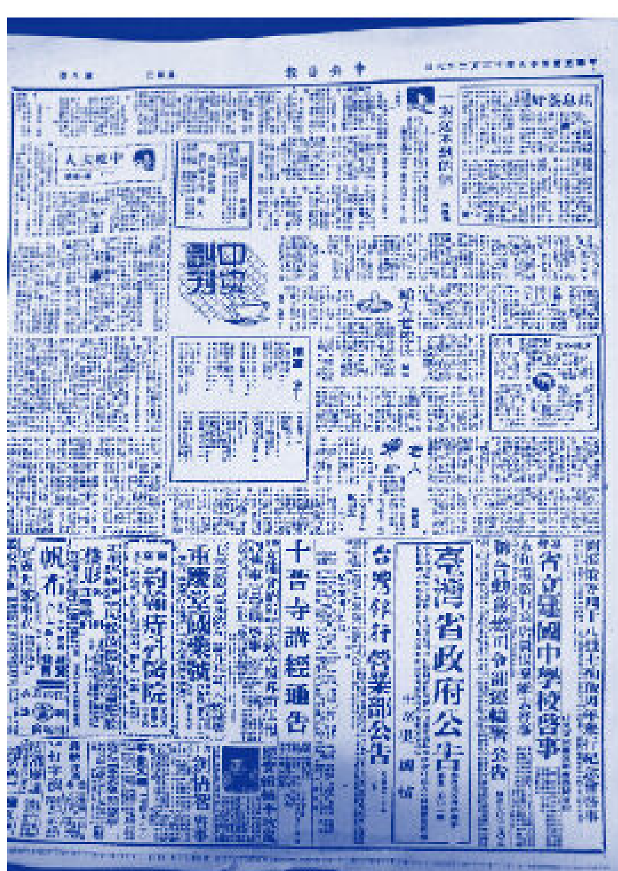
尋姜文標（姜阿杏之子）

定海岱山人，十九歲，五月間由岱山來臺，現住何處？來信臺北市西寧南路一四五號王文[illegible]收轉，如親友中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代為轉告並禱

遺失營業執照啟事

本公司登記執照設字第八三九號因[illegible]

当年刊登在报纸上，父亲托人几经辗转而刊登的“寻人启事”。



臺灣省政府公告

十普寺講經通告

当年刊登“寻人启事”的就是这张报纸，几十年后， 姜思章大海捞针般从图书馆找到了。“寻姜文标”启 事，就在此版左下角很不起眼处。

未曾想，这种犹如大海里捞针的策略，竟然让困居军营已更名换装的儿子看到了。“如果不是那天恰好看报，如果不是看得仔细，谁知道台湾军队中有姜文标这个人？！”60多年之后，姜思章依然庆幸上苍眷顾：“这大概是冥冥之中，上天做的安排！”其实，那张1950年11月28日的日报尽管是副刊版，分类广告内容还真的很丰富，有一则悬赏通缉令，还有警告声明之类的小广告，用今天的话说，颇能吸引眼球。这也许是让姜思章看得格外仔细的一个理由吧。

经过一番磨难，小小年纪的姜思章心理已有了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他牢牢记住了王先生的叮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没有向旁人透露这个秘密；同时，在托转的回信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是假称在台湾读书，目前一切安好，等于是向家人报了一个讯息：儿子还活着！

不久，收到了王先生转回的父亲的亲笔信。

通过第一封家书，姜思章才晓得，自己被连夜押解上船后，半年之内老家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当轮船缓缓离岸时，在码头上哭天抢地的人群中，就有自己身怀六甲的母亲。眼望自己未成年的儿子，随国民党军队消失在茫茫大海，去到遥远的、前程莫测的地方，她除了放声号啕，只能双手合十跪倒在地，向观音菩萨祷告，保佑儿子平安归来。祖母得知最疼爱的长孙被抓走，被这个不幸的消息击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

几个月后，又收到父亲的第二封来信。父亲告知，祖母忧伤成疾，卧床数月后告别人世，她临终前还叨念着长孙的名字；而母亲，则平安生下了一个妹妹。在天远海隔的台湾，14岁的少年姜思章无处倾诉，只能向隅哭泣。他随即面朝北方伏地磕了几个响头，默默地遥祭祖母。可回信依然是："我一切很好，仍在安心读书……"

尽管现实残酷，可有了家书往来至少可以感受到亲情的存在。有空时，偷偷看一眼父亲的来信，成了少年姜思章唯一的精神安慰。

好景不长。随着台海局势发展，国民党为了保住这最后一块地盘，开始在台湾实施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任何同大陆的交往都有"通匪"嫌疑，随时有杀头的危险。台北的王先生开始面露难色，姜思章遂主动停止了家书往来。从此之后，他同家人音讯断绝30多年。

蹉跎岁月的"风花雪月事"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1954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姜思章学会了驾驶军车。从此，他成了一名当时在部队和地方都很吃香的技术兵。

这一年，姜思章18岁。

回忆这段经历，姜老先生直言不讳地承认，年少无知加上部队风纪涣散，年轻气盛的他也渐渐染上了生活散漫、约束不严的习性。

那年，正值大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第七舰队被派到台湾海峡游弋，美军也开始协防台湾本岛。为了适应美式F-86军刀式喷射（喷气式）战机起降，台湾的桃园、新竹、嘉义等军用机场不得不加长跑道。

此时，姜思章已经不用从事挖泥土、清沟塘、填跑道一类的体力劳

动。他的工作是开军车往来运送水泥、石料等；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业余生活：闲来可以自由到周边的街道逛商店、看电影、玩撞球（台球）等。

虽年仅18岁，姜思章已是有着4年军龄的老兵。我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歪戴帽子、油腔滑调的“兵油子”等基本特征，他都具备。

闲暇之际，他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喜欢拽上好友到茶馆喝茶，目的不是休闲，而是逗弄那里年轻漂亮的“茶花女”。这种“光看不练”过嘴瘾的做法， 在当时成为姜思章的一种家常乐趣。不过，同学王岳清已先行了一步。他不仅练习嘴上功夫，还有了实战经验。这在姜思章看来，也是一堂难得的恋爱见习课。他不仅陪王岳清到茶馆喝茶、玩扑克牌，当夜深人静时，王岳清与女友在附近草丛深处幽会，他则在远距离望风。等王岳清拍拍裤腿上的泥土回营时，女友还要交给姜思章，让他护送其回家。

明知道是为人做“灯泡”，并常因耽误回营时间而受到责罚，可毫无同异性单独相处经验的姜思章依然乐此不疲。

“想家”竟获罪，被判三年刑

“浪漫时光”很短暂。

转眼到了1955年，军队又一轮改编开始。走马换将，部队来了位没有领导过技术兵的长官。于是，按照中国官场规矩，他要通过“整人”才能在一群自视甚高的技术兵中站稳脚跟。

时常流露出对被抓入伍的不满，又被人猜测曾经与大陆家人通信，姜思章已被部队列为“思想不稳分子”。早在从陆军“投奔”空军后不久，先前那位收留自己的老乡黄连长就被调走了，姜思章和同学的处境都很不妙。至此时，姜思章已经被列为部队的重点监视对象。

就这样，倒霉的姜思章这回又不幸成为新任长官“立威”的典型。他先是被调离驾驶岗位，后被安排到另一后勤补给单位工作。到新单位报到后，他立即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其时，为了控制军队，由蒋经国亲手培植的政工人员，已开始进驻部队。姜思章开始感到明显的不自由了。给朋友的信件经常收不到，连空余时间上街，也有人在暗中监视……

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抗美援朝战争后，国民党在台湾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

为了稳固“党国”的最后地盘，残存于台湾的国民党势力绷紧了每一根神经，进一步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为了整顿军纪肃清异己分子，同时，为了解决军队中日益聚集的矛盾，军队开始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先后开展“以军作家”及“自愿留营”等运动，目的是稳定军心，让从大陆来台老兵放弃人生权益，为人心尽失的国民党政权无期限地安心卖命。

明眼人都知道，这些运动，表面是打着“自愿”的旗号，可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强制。本就满心怨言，加上生性倔强，姜思章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在“以军作家”及“自愿留营”等活动中签名。从此，部队政工指导员记恨在心，经常借故找茬。一次，部队就餐时米饭不够，于是，有老兵用饭勺边敲木桶边喊道：“没饭了!没饭了！”姜思章也有样学样地敲了两下，喊了两声，结果因此惹祸。他人无事，唯独姜思章被关了两周的禁闭。政工指导员罗织的罪名是“扰乱军心”。

如此压抑的环境，迫使姜思章心生“反”意，他开始策划第二次逃跑。姜思章说，这次逃跑一方面是为了发泄愤懑，表达对长官的不满，同时，还有借此让长官受到牵连处罚的幼稚想法。他自作聪明地将自己对长官的不满和逃亡计划故意透露给了邻床的一位“政治战士”，为的是留下人证，好让上司为自己的行为担责。结果，他只“逃”到距离营区200米的汽车站，即被第一时间赶到的政工指导员抓获，随即被移送到军法处。

军法处法官提审姜思章——

“籍贯哪里？何时参军的？”

“浙江岱山人，被抓来的！”

“胡说！谁抓你了？”

“那怎么说？”

“自愿从军！”

“何故逃跑？”

“不满长官故意刁难。”

“大胆！”

“事实就是如此。”

“你还敢狡辩？”

结果，姜思章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在那个非常时期，想家也是罪名。”在位于台北木栅的家里，姜思章老人愤然说，“当然了，军法上没这一罪，判决的罪名是‘盗卖枪弹以外之军用品’。”

获此罪名的依据：被捕后从姜思章身上搜出了汽车轮胎气门芯及火花塞。姜思章说，这两件东西是当时部队汽车驾驶员要求随身携带的必备品。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就被拖入监狱。这样一来，姜思章指望以自己的坐牢，“连带”长官受罚的企图肥皂泡般破灭。因为罪名不是“逃亡”，所以长官无须承担连带的管理失职之责。如意算盘落空，年轻的姜思章只能吞食自酿的苦果。

死囚狱友一语“点醒”懵懂之人

“我在监狱坐牢以及其后，都有好多故事。”由于姜思章入狱时年仅19岁，又不是重罪，所以开始半年投入的所谓监狱，其实是位于台北市和平东路的空军看守所。

监狱设有8个监房，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编号。每一个监房有30多人，总共有300多人。姜思章坐的是“忠”字号监房。刚开始时，只能睡在门边紧挨马桶的铺位，半年后就“升”到了里侧最好的位置，还被推选为房长。

这所空军监狱里，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死刑待毙，也有仅判三两年的轻度犯。各种情况的都有：贪污的、开小差的、妨碍他人家庭的、作奸犯科的……狭小的监狱内，到处都是人，塞得满满当当。到了晚上，经常有“闹号”情况发生，寻死觅活的犯人发出杀猪般的嚎叫声。

姜思章记得，这里的所有犯人中，“逃犯”人数最多。他们都是不愿继续当兵，希望逃出军营被人告密或被抓获的年轻人。逃往大陆不太现实，但逃出军营混迹社会还是有可能。

这半年，是姜思章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命运的又一次转机也从此期开始。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个人，一名等待“复判”的死刑犯人。

他姓任，原是一名空军战斗机驾驶员。

这位广东籍飞行员，说一口标准的广东“国语”。他的铺位正好同姜思章相邻。在极度绝望、迷惘、耻辱、饥饿的人生困厄中，这位年轻、英俊、富有学识和修养的飞行员教会姜思章很多。

他的罪名也是逃亡罪，不过他“玩”得很大。他在桃园机场偷了一架飞机，并成功滑行到跑道上，就在准备加速拉起一飞冲天时，也许是太过紧张操作不当，也许是天意弄人，飞机竟突然死火！最终惊险停在了跑道尽头。

驾机叛逃，死罪难免。姜思章说，这位姓任的飞行员没有进一步透露细节，包括他计划要飞往哪里等等，都讳莫如深。如果他“叛逃”成功，或许大陆又增加了一名驾机起义的英雄；当然，也可能被途中击落，这些都是难以假设的事情。他终究成了被滚滚历史烟尘所淹没的无名之辈。从姜思章的讲述来看，他至少是一位心怀远大抱负的进步青年，是否为中共地下党则无从核实考证。

这位姓任的死囚犯教会了姜思章跳舞，还教他学英文，并普及其他知识。他同姜思章谈论当年在台湾最畅销的文艺杂志《野风》，分析广东人与江浙人的性格差别，探讨广东菜的特色、舟山的海产，谈鸦片战争中广东与舟山的关联等等。

《野风》杂志是上世纪50年代风靡台湾文坛，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刊物，在当时台湾文坛充斥“战斗文艺”及以“反共抗俄”为主旋律的时期，独树一帜提出“反映现实”、“创造新文艺，发掘新大家”的口号，余光中、郑愁予、於梨华等一批人就是那时成长起来的文艺大家。

姜思章说，自己初中都没念完，听到这些高深的言论及丰富的知识，一下被深深吸引了。任先生对年轻无知的姜思章提出了自己的忠告。他说：“首先，你要充实自己，让自己成为有知识有思想的人；其次，不要做鲁莽无谓的抗争和牺牲，要学会智取。现在是国民党威权统治，腐而不朽，死而未僵，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撼动它。”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国民党威权统治就像一座高楼，可楼再高，也是一块块砖从下往上砌起来的，你要耐得住性子！你今天一块、明天一块地抽掉它的

墙砖，总有一天它会轰然倒塌……

“这些话我是完全听进去了。”姜思章说，“出狱后我发奋努力，几经挫折终于考上了军校，不断用知识充实自己，一举改变了个人命运。”30多年后，姜思章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老兵争取权益运动、公教人员权益运动，这些运动尽管压力重重，风险极高，可他始终记住了这位死囚飞行员的教诲，善用智慧，顺势而为，最终，每一项运动都获得了成功。

姜思章与这位飞行员相处了三个月。

一天清晨，监房的人还在熟睡中，只听“哗啦”一声响，牢房铁门被打开， 看守一声喊：“任××，立即起床开庭！”话音未落，涌进一大批宪兵，未等他穿衣就绪，即被架了出去。

不容发出任何反抗之声，只有颤抖着发出“保——重”两字，目光呆滞中竟不知道对谁而发。巨大的恐惧压向姜思章及同监房的狱友，有的人已是瑟瑟发抖。姜思章只有无语含泪，在心里默默为他送行：“老兄啊，你一路走好!”

“戴罪”期遭遇一段心酸的“浪漫”

说起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以及世态炎凉，姜思章迄今心有余悸。

那位被枪决的飞行员被关在牢房等待“复判”之际，其实心里十分清楚，只是个等待死亡的走过场而已。因此，他并不惧怕死亡。可是，“有比死亡更可怕

的东西。”

这位死囚飞行员曾经是家庭的骄傲，也有良善的心灵与不舍的亲情。其实，他自己的兄嫂就在台湾。等待就死的日子里，他非常期待同胞兄长来见最后一面，可是兄嫂从未现身探视。于是，他给兄嫂写了好几封信，表达临终乞求。开始时，他还满怀期待地询问监狱的看守：“我的家书寄出了吗？”看守不耐烦地说：“寄了，早就寄了！”许久过去了，他又问看守：“有我的家书吗？”得到的始终是冷漠的摇头。

他很可能有话要同兄嫂诉说，或许指望交代后事。可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明哲保身、避免牵累已经压倒了亲情人伦。直到临死也没有兄

长的任何回音，更别奢望见最后一面了。

“驾机叛逃，死而无憾，那位飞行员明知必死无疑，内心也并不哀伤，但亲情的沦丧，才是他最大的心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77岁的姜思章，迄今记得这位死囚悲绝的神情。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无论身处何地。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姜思章同异性之间依然擦出一丝人性的火花。

按照规定，三年刑期是这样分配：入监半年，此后可以交保到监外服劳役，但要有人作保。姜思章找到了一位以前认识的万姓校长，请求他保自己出狱，到他任职的桃园空军子弟小学做校工。

所谓校工，就是不支付任何薪水从事劳动改造。日常工作是为中低年级打扫教室，清理学校的污水沟等体力活。学校教职员对这位年轻的校工尚能接受，但毕竟是戴罪做工，自然低人一等。姜思章虽然尽力工作，希望忘记一切，但心中的屈辱和委屈依然挥之不去。

姜思章从小喜欢音乐，早在岱山中学时就学会了拉手风琴，此时，派上了用场，他时常为学生歌唱表演担任伴奏。同时，他还喜欢写作并向报刊投稿。此举，虽然得到了年轻老师的好感，可是一批由大陆来台的顽固老教师将这样一位校工，依然视之为异类并心生反感。

时间到了1956年，学校新进了一批刚从高中、高职毕业的女老师。这批年轻老师对年龄相差不大的校工姜思章没有成见，大家相处融洽。其中，有一位名叫刘美良的老师，她的气质与形象皆吻合姜思章的审美趣味，她也与姜思章最为要好。

刘老师毕业于虎尾女中。两人之间，有一件小说中才会出现的“巧事”。

有一天，两位年轻人在一起闲聊。谈到各自的过去，姜思章提到一件记忆深刻的事。当年自己当兵时，有一天曾经汗流浃背、衣衫脏旧不堪地从虎尾街路过，途经虎尾中学路段，与一位漂亮女生擦肩而过。年轻的姜思章下意识地多看了这位女生一眼，正巧“碰到”了女学生眼角的余光。只见她竟自掏出一方手帕捂住了鼻子，加快脚步急速走过。

当年，台湾民众对穷大兵普遍很不感冒，压根儿就瞧不起，漂亮女

生用这种方式表达蔑视倒也合乎常情。遇到别人可能就过去了，可年轻气盛的姜思章偏不。

于是，虎尾中学门前发生了罕见的一幕：阿兵哥返身冲到这位女生面前，大声斥责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总有一天我到你学校当老师教你学做人！"若干年之后，面对这位毕业自虎尾女中的漂亮女老师，姜思章再度提起这段往事。未曾想，刘美良老师一下涨红了脸，径自脱口而出："哎呀！那女生就是我呀，怎么会是你！"她解释说，其实那天自己并非故意，是觉得被人"偷看"而感到不好意思，遂用手帕掩饰自己。因为受到阿兵哥的斥责感到心里委屈，所以迄今印象深刻。谈及此事，两人不禁双眼对视，一齐哈哈大笑，觉得世界真是太小了。

因为这个渊源，两位年轻人从此走得更近了。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唱歌、看歌仔戏，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可身份地位的悬殊，很快招致老教师们的非议。

一次，女教师宿舍只有刘老师一人，她主动约姜思章去聊天，顺带请他帮忙到室外压水（用日式手动压水泵抽取地下水）清洗衣物。未曾想，此举被隔壁一位多事的女教师看见，很快，校工与女教师谈恋爱的新闻传遍校园。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意味着戴罪之身的姜思章并不安心改造，他将被送回监狱继续坐牢。校长已经找他谈过话了，希望他有心理准备。数天过去，不知何故，校长最终改变主意，并未将事情做绝，而是将他转介到冈山二高空军子弟学校，继续从事劳动改造。

这件事，让姜思章对校长感恩戴德，也觉得其中必有蹊跷。可是，不得其解的事还在后头哩。

两年后，姜思章假释期满，要回到桃园空军小学等候"复补"军役。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兵员严重不足，当年的台湾军队规定，只有判刑7年以上者，无需返回部队服役。否则，即便服完刑期还是要继续回部队当兵，这就叫"复补"。

就在等候"复补"期间，他听到了一个惊人的传闻，说是刘美良老师与校长关系"不寻常"。传闻，很快变成了"目睹"。那天，姜思章应师母庞女士之邀到校长家吃饭，说是为他饯行。就在席间，未料刘老师闻讯也赶来为姜思章送行。未顾及情面，庞师母竟当面大声斥责刘老师，并

列举她与校长的种种“不齿”，这让做客的姜思章尴尬万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也因此仿佛明白了什么……

饯行宴不欢而散，姜思章礼貌地送刘老师回宿舍。临分别之际，刘老师面色凝重，厉声告诫他：“姜先生，你我都还年轻，应各自发奋努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若有缘，那时我们再相聚！”她立誓说，自己将辞去教职，全力准备考大学继续深造。

姜思章仿佛明白了一切，又仿佛还在懵懵懂懂。他点点头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并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大学，不辜负刘老师的期待。

“复补”回到部队后，姜思章被安排在空军高炮部队。经过多番磨难成熟起来的姜思章开始不惜一切代价读书。借助路灯、营房厕所的光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当时，部队允许战士报考大学，但有诸多限制。首先，要具备高中文凭，且只能报考理工科。按规定，无毕业证的军人可以参加学业（高中毕业）鉴定考试，通过后再参加高考。毕业鉴定考试不难，可参加高考难度极大，而且，录取时要依照兵籍所在的省份，按照一定的比例录取，这对姜思章来说有如登天之难。第二条路是参加部队每年举办一次的军政大考，可以根据此成绩晋升为军官。他连续两年参加军政大考，虽然考试成绩很好，可就是得不到提拔。后来，

他想明白了，因为自己有过坐牢的“不良记录”，所以，升军官彻底无望。

万般无奈之际，还剩下最后一条路可走——考军校！前提是要有高中文凭。自己初中都未毕业，怎么办？这时有好心人提醒他：你可以伪造啊！别傻了，现在台湾什么文凭都有，那都是假的。于是，在高人指点下，姜思章自己写了一份文凭证明书，并用肥皂刻了一枚假公章。证明书内容是：“姜思章为上海市思源学校高中学生，因为战乱，无法完成最后学业，特同意其提前毕业。”上海确实有这么一所学校，遭遇战乱也是事实，但内容是假的，可谁能到大陆去调查呢？　　于是，姜思章凭此“证明”顺利报考军校！

第一次参加军校考试，成绩OK，但录取在政治系。姜思章从心底讨厌政治，他一心想就读音乐系。于是再考，结果还是一样，只能上政治系。这时，又有高人提醒他，直接报考艺术系很难，高中毕业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而你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样下去只怕一辈子也考不上音乐系，不如先去政工干部学校报到，然后再找机会转系。姜思章一听有理，这样，在1959年时姜思章入读政工干校。进校后，他每天都到琴房苦练，最终通过了严格的转系考试，如愿以偿转入音乐系就读。

那一年，姜思章23岁，可刘美良老师才19岁。与此同时，姜思章打听到刘老师的信息，她从学校辞职后参加了台北的建国补习班，随后考取了台湾师大数学系。他满心喜悦，心里默默为刘老师祝福。

四年大学生涯很快结束。姜思章在正式就任新职之前，按规定必须到凤山步校接受初级班训练。此时，姜思章打听到刘老师也已毕业，分配在高雄鼓山国民中学任教。结训之前，姜思章终于鼓起勇气前往刘老师任教的学校探望。

在鼓山中学教师办公室，相隔几年之后，姜思章的突然出现，似乎并没有令刘老师感到太大的意外。她只是在批改作业的短暂间隙抬头淡淡一句：“噢，你来了？”随即埋头继续批改作业，直到放学铃声响起。眼见刘老师如此淡定，姜思章十分不解。趁人少时，他急切表达分别后自己的求学经历，未曾想，刘老师头也不抬地说：“这一切我都知道。”

等放学铃响过，学生散尽，作业批改完毕，刘老师起身说：“一齐走吧！”姜思章问：“去哪里？”回答是三个字：“去我家。”

于是，刘老师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对爱情尚属一片空白的姜思章在后面跟，他不明白，为何刘老师同几年前判若两人？很快，就到了教工宿舍、她的家。刚刚停好自行车步入客厅，就有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子迎了出来。刘老师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先生，他在海军工作。”随后，她转身道：“这位就是姜思章，今天到学校来看我。”

姜思章顿时感到十分局促，仿佛做错了什么似的，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寒暄之外，他不知道自己同她及她丈夫都讲了些什么。当那位帅气的男主人客气地挽留客人吃晚饭时，姜思章坚决告辞……

从此一别，数十年再无消息。

时间到了1997年。因参与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老兵权利运动等，姜思章在岛内已有了不小的名气。为了达成两岸和解、推动相互交流，姜

思章同一批老兵继续奔走，他依然是一名活跃分子。走过数十年岁月，遭遇人生的潮起潮落，早已成家立业并做了爷爷的他，已将陈年旧事忘得一干二净。

这天，已养成看报习惯的他从1997年1月30日出版的台湾《联合报》第五版上，突然看到一则高雄地方新闻："鼓山中学女教师刘美良老师罹患癌症届退，将300万新台币积蓄捐出，作为学生的奖学金。"报道说，刘老师对智障学生及成绩落后生一视同仁，付出了最大爱心，不料数年前查出罹患癌症，近日癌细胞蔓延胸部及语言中枢，说话困难，故提前办理退休，她将退休金及积蓄全部捐出……

看完这篇报道，姜思章心潮起伏。往事悠悠，情难自已，他旋即致电鼓山中学。回答是，刘老师已经办理退休，不再上班，无从联络。姜思章随即寄去自己的一本著作并附上一封长信，希望由学校转交。可一等再等，信件如石沉大海般没有任何回音。

两年后，即1999年，故乡浙江岱山县要出版一本《岱山人在台湾》，姜思章应邀撰写一篇回忆文章。他在家中闭门书写，借此将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总结，忆及当年遭受牢狱之灾的那段经历，触及灵魂深处的伤痛，禁不住再次忆起艰难岁月时与刘老师的一段交情，心中的愧疚与感激矛盾地纠结在一起……他决定去探望刘老师，以表达三十多年来自己心中难以割断的一份牵念。

临行之前，姜思章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拨通了高雄鼓山中学的电话。听完自我介绍后，对方停顿良久才告诉他，您要找的刘老师去年就已经过世了。放下电话，姜思章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一种无法表达，也无处表达的情愫。他迄今也无法明白，那位刘美良老师当年曾为自己做了些什么，更无法知道在她的人生中，自己究竟是什么地位。

冲破封锁，极力打探亲人消息

与刘老师之间的那段"心酸的浪漫"，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老兵姜思章灵魂深处的最大伤痛还是故土亲情的撕裂和分离。

姜思章说，考军校的目的，除了改变身份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动力，那就是"再用10年换回后半生的自由"。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取得官阶之后，再继续服役10年才可退役。如果是普通士兵，最高可以升到士官长，要到48岁才可退役。姜思章的盘算是，上4年大学，再当10年

军官，这样就可以光荣退役，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教职。

现实是，军校毕业后，再过10年，姜思章仅以上尉军衔退役，原因还是“背景不好”。不过，离开部队后他如愿成为一所中学的音乐教师，终于脱离了梦魇般的军旅生涯。

光阴荏苒，几十年时间说长也短，仿佛就在转眼之间，年轮已到了20世纪70　年代末。父亲于1950年底寄来的两封信，曾被姜思章视为珍宝，放在随身的小皮箱内加以收藏。可一夜之间获罪入狱，这两封信连带唯一的财产——一口小皮箱一同无影无踪。

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寻找同家人的联系方式，成为姜思章的头等大事。

听说国民党党部设有“唐光华信箱”，专门为国民党党员转寄投往大陆的邮件，他立即前往登记，并试探性写了几封信让其代转，最终全部石沉大海。他还带领全家接受美国传教士洗礼，指望那个美国人回国时能代向大陆寄信，可愿望依然落空。

1978年，姜思章偶尔获悉一位老同学家来了一位香港亲戚，遂请求帮忙，对方答应可为他捎信到香港寄发。他写了封信，还是30年前的老地址“浙江岱山东沙镇二保二甲”，因不知父亲是否还健在，所以收件人写的是大弟弟的名字。

一个月后的一天，这位同学悄然告诉姜思章：“接到香港亲戚的电话，说收到你家人的信了，已转寄台北你家！”闻此讯，姜思章泪水夺眶而出，止不住心脏一阵狂跳。

他一路飞奔回家。“老家来信了!老家来信了!”还未进家门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妻子一把将他拉进内室，关上门，提示不要声张。当夜，夫妻俩彻夜不眠，反复猜测信中的内容及家人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

转眼又一个月过去了，竟毫无音讯。终于通过一位情治单位朋友疏通关系，打听到那封转自香港的家书下落。处理结果是“家书没收，准许影印”。毕竟，收到了一份影印的家书，这是与家人断绝音讯近30年后，收到的第一封家书。是大弟所写，落款是“1978年11月24日”，用语非常谨慎，告知父母均健在，并提供了新的通讯地址。一来二往，连续通信若干次后，同学在香港的亲戚表示不愿再转，理由是他们在台湾的

生意受到了影响。他知道，这一定又是台湾情治单位在从中作梗。

姜思章继续寻找结识香港人的新途径。

据说，台北济南路一家舞厅常有香港客人光顾。姜思章以舞客身份前往，几次往来，他结识了一名舞女。可还未等姜思章开口提出自己的想法，即被这位见多识广的舞女看破心思：“姜先生，你不是来跳舞的！”

他只得如实相告。“原来就这点事哦，我答应你了！”这位舞女十分仗义，她爽快答应为其物色港客代为转信。不过，舞女的客人很不固定，“邮递员”也因此经常变换。

与此同时，大陆这边的亲人也在做同样的努力。大妹家住在舟山沈家门，临近著名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是香客的必经之地。头脑灵活的大妹，借机认识了一位香港进香的陈女士，两人很快以姐妹相称。陈女士用照相机拍下了彩色照片，随同妹妹的回信，一齐从香港邮寄台北。

与大陆的邮路打通之后，姜思章曾托人在香港购买治疗肝病的特效药寄给二弟，又购买高丽参给小妹。只是香港转来的邮件经常收不到，后经过同台北邮局多方交涉才保证了邮件送达。

随着世界冷战格局变化，日本、美国先后与大陆建交。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大陆率先向台湾同胞敞开胸怀。不久，姜思章开始从媒体上看到台湾有关人士经香港转赴大陆观光、探亲的消息。

姜思章隐约感到，坚冰开始融化，时代正悄然发生巨变。

秘密返乡，海天一路游子泪

不久，大妹结识的香港陈女士到台湾进香。姜思章热情邀请她到家中小住，陪同她到处进香并做环岛游。在陪同陈女士的过程中，姜思章表达了希望经由香港返回大陆探亲的想法，好心的陈女士表示乐意帮忙。

按规定，获邀赴港，必须在三等亲之内。

虽然陈女士满口答应，可是现实问题来了，她姓陈，与姜思章夫妇

无论如何扯不上亲属关系。看来，这条路还是难以走通。陈女士为姜思章的诚意所感动，她回到香港后立即同先生商量解决办法。不久，她找到一个与姜思章母亲同姓的人认作“舅舅”，并发来了邀请函，姜思章据此可“合法”申请赴香港探亲。

条件虽具备，可办理起来并不顺利。一番周折后，经过一位台湾朋友担保之后，姜思章才拿到了赴港探亲的批文。

1982年8月11日，昼思夜想的时刻终于来临。

真是好事多磨！启程的前一晚，正好有一场台风掠过台湾。夫妇俩彻夜未眠，非常担心通往机场的道路被暴雨冲毁，因而耽误航班；同时，也在揣度此番冒险，返台后会受到何种惩罚。姜思章当时的身份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公教人员“私通共匪”将会罪加一等，后果实在难以预料。

幸好，第二天台风过后，道路抢修成功。从桃园机场直飞香港启德机场的航班准时起飞。

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当天，姜思章即入住陈女士家，晚上，陈女士陪同姜思章到街上购买礼物。次日，则由陈女士丈夫陪同从尖沙咀码头坐轮渡到港岛办理返程签证，最后，才来到位于中环的中国旅行社，办理进入大陆探亲的旅行签证。

经向工作人员打听，从香港到广州，若从澳门经拱北口岸出发，乘汽车当天可抵达广州，而从深圳罗湖口岸到广州，要等到第二天才有车。归心似箭的他自然选择最快捷的路线。

办妥一切手续之后，姜思章给台北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今晚我要去太平山顶了！”这是一句约好的暗语，意思是一切顺利，当晚就会启程赴大陆探亲。

午夜12点，姜思章搭乘从港岛至澳门的海渡，天刚亮时抵达澳门。

上午9点多，搭上由澳门去广州的巴士。车行至珠海拱北海关时，乘客被要求下车接受检查。姜思章被引导至一个“台胞接待室”，工作人员将一张单面是不干胶的“台湾同胞旅行证”粘到证件的背面，并轻声提醒：“返回香港后，可以撕掉，这样回台湾时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了。”这一句善意的提醒，让姜思章心生温暖，也感受到大陆同台湾对待老兵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一切办妥，通关顺利，巴士终于进入大陆境内，直驶广州。按捺不住心底的激动，姜思章喃喃自语：“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的古怪举止引来同车乘客异样的目光，此时，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第二天，老兵姜思章终于搭上从广州飞上海的航班。抵达上海后，他四处打听去舟山的交通工具，最后，他坐上了当天最后一班开往宁波的火车。

下了火车，姜思章先入住华侨旅社，通过旅社联络，好不容易才打通了舟山沈家门邮局的电话，让工作人员通知在那里的大妹一小时后来听电话。未曾想，半小时后，大妹先回拨了过来——

“哥，真的是你吗？！”大妹半信半疑地边哭边问。

“我是哥！我回来了！”同样也是带着哭腔。

“哥，你别乱走动啊，我这就搭船过来接你！”

等姜思章拖着行李来到码头时，闻讯从金华赶来的二弟全家已提前抵达，正在码头张望等候。30多年骨肉分离，亲兄弟相见，双方凝视良久，拼命寻找记忆中熟悉的印记，兄弟俩终于紧紧拥抱在一起。不久，大妹也乘轮渡赶到，兄妹三人紧紧依偎，在码头上，不顾众目睽睽，兄妹三人放声大哭……

两小时后，船抵舟山群岛上的沈家门港。船正在靠岸，二妹指着码头的入口处说：“哥，你看，阿姆！阿姆！”面容依稀，姜思章一眼就认出了母亲。真是母子连心，原来，母亲当天身体不适，专门从岱山乘船到沈家门看病，此前毫无约定，未曾想恰好遇到几十年未见的儿子从台湾回来。此时，母亲正同姜思章的姐姐手握铁栅栏，紧张地朝这边观望。

船未停稳，姜思章就疾步跳下来，连跑带爬地跪到母亲面前，止不住放声大哭：“阿姆，我回来了！阿姆，我回来了！”母亲拥抱着儿子喃喃道：“儿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随后，四姐弟和母亲围抱在一起，大家哭成一团……众人纷纷驻足围观，不少人揉眼拭泪感叹：“又有

国民党老兵从台湾回来了，生死离别几十年，这些人可真不容易啊！”

次日，母亲即带着儿子到普陀山烧香还愿。从前山到后山，见佛即拜。姜思章在沈家门妹妹家住了三天，母子及手足间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三天后，尚在岱山家中的父亲发急了。他一次次电话催促，直至责骂大妹留客太久，大家这才乘船前往岱山——这里，才是姜思章真正的故乡，也是他的伤心地。

船靠码头，姜思章远远发现父亲已经站在码头最近处等候。未等来船停稳，父亲即向前奔迎。为安全起见，工作人员一把将他拉住。

姜思章跳下船，三步并成两步跪倒在父亲面前。他紧紧抱住父亲大声叫喊：“阿爹!儿子回来了，真的回来了！”老泪纵横的父亲拉起儿子的手，仔细端详起来，他在仔细找寻30多年前熟悉的面孔和每一个细小的局部。随即，父子抱头痛哭。

五兄弟三姐妹相聚岱山，加上父辈和晚辈，每顿都是满满三大桌人，大家举杯畅饮，诉说几十年的别离之苦，谈论割舍不断的亲情人伦，大家又哭又笑。

稍定，姜思章要求去祭拜祖母。当年，祖母因深深疼爱的长孙被抓走而一病不起。未曾想，父亲支吾半天，最后才将儿子带到一处高坡上，指着山脚下的一处水库说，故乡因兴修水利祖坟所在地已被水淹了，祖母墓迁葬后现已不知去向。姜思章闻讯不禁悲从中来，他扑倒在地，止不住地号啕大哭……

有人从台湾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当年国民党10万大军悄然“撤退”去台湾，顺手掠走了舟山群岛万余名青壮年男丁。周边村庄的老兵家人纷纷来到姜家，打听亲人的音讯……返台之后，姜思章带回众多寻亲信息，也带回来沉甸甸的嘱托，这成为他后来策动老兵返乡运动、走上街头公开抗争的原动力之一。

策动老兵返乡，发出如雷吼声

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及不得人心的闭关自锁政策，激起台湾社会的巨大反弹声浪。结束白色恐怖，推动两岸交流，民间早已风起云

涌。其中，老兵返乡运动最具典型意义，因策略对头，终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由于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姜思章早年就同一些“党外人士”过从甚密。1987年，“党外”发起“自由返乡运动”，希望历年来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而被放逐岛外的人士，能够自由返回台湾，但收效甚微。

姜思章分析认为，诉求分散反受其乱。建议集中诉求焦点，先以推动大陆来台人士，尤以退伍老兵及退休公教人员返乡探亲为主题，更能突显“返乡探亲”的合理性与迫切性。于是，一个新的组织“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宣告成立，随即，一场轰轰烈烈的“老兵返乡运动”在岛内展开。姜思章亲手起草了四份传单，其人性化诉求、充满诗意的表达，立刻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虽多年过去，迄今仍为人所称道——



姜思章（前排右一）参加台湾老兵行动联盟举办的街头宣讲活动。

第一份传单：《我们已经沉默了四十年》。开篇即如此发问：“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回去献上一炷香。”这份传单在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当日散发，前后共印制了30万份。在国民党铁幕统治数十年的台湾，无疑拉响了一枚震撼弹！

第二份传单：《想回家，怎么办？》。传单呼吁：尽快打开海峡两岸探亲的管道！“请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力量；我们没有怨尤，只求一个公道！”这些朴素而诚挚的诉求，深深感染了每一个人。



想家 百萬老兵 撞破戒嚴大門

我們想了你四十年

想家

台湾媒体以“百万老兵撞破戒严大 门”为题，报道老兵返乡运动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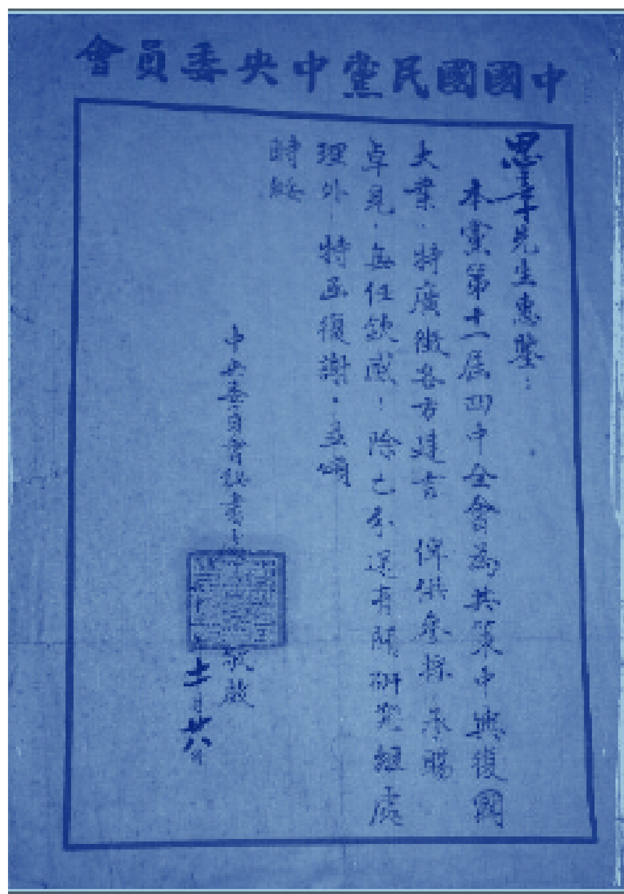
1987年6月28日老兵“想家合唱团”登台合唱《母亲你在何方》，台下5万老兵应和齐唱，表 达强烈的思乡探亲愿望，一时震动台湾社会，直接推动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



1988年5月4日，姜思章率老兵要求“授田证”兑现， 到国民党党部前请愿，被警察强行抬走。



1991年，姜思章等老兵再次到“立法院”为两岸直航请愿。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思章先生惠鑒：
本黨第十三屆四中全會為共策中興復國大業，特廣徵各方建言，俾供參採。承賜卓見，無任欽感！除已分送有關研究組處理外，特函復謝，並頌
時綏
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敬啟
[illegible]月廿六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姜思章发送的“征求建 言”公函。

1987年6月28日，近5万老兵挤满台北市金华中学大礼堂内外，广为散发的2万份传单，如泣如诉，传递了在百万老兵心头压抑数十年的怨愤。

台上，是振聋发聩的演讲，台下是饱含热泪的老兵们。最后，由老兵组成的“想家合唱团”登台，引领数万人齐唱老歌《母亲你在何方》，一时将集会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此次集会，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回响，执政当局也表示“听到了”老兵的呼声。

第三份传单：《条条大路通故乡——回家之路怎么走？》。时间是1987年9月20日，在台北市龙安小学群众大会中集中散发2万份。其时，台湾当局已经宣布从当年的12月起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因此，本次集会意在引导老兵如何返回大陆。

与一批台湾老兵一道成功策动老兵返乡运动，是姜思章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散发传单时，曾被人大骂为“共匪”、“台独”和“阴谋分子”，甚至被人殴打。为了保全家庭及财产，他甚至准备同妻子离婚。心想，万一被拉去枪毙或者判以重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若离婚，尚可留下一定的家产供妻小生活下去。

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那天，在中山纪念馆前，10多位老兵手持“母亲呀，我们真想您！”“捉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等木牌和布条，发动有组织的街头运动。一时引起无数人围观，老兵们与前来阻止的警察和顽固人士发生激烈争吵，一时引起轰动。

回忆这次街头运动，姜思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批著名学者和教授纷纷声援，从而扩大了返乡运动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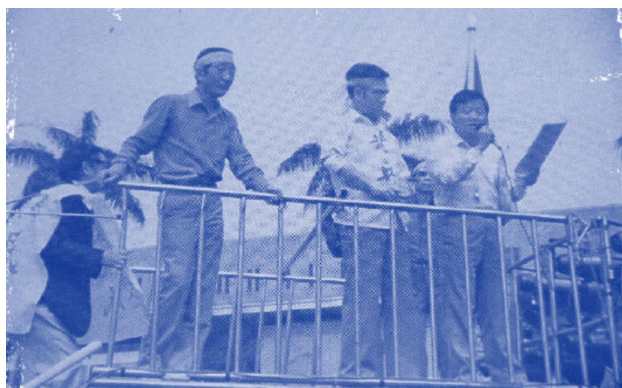
6月28日，台北金华女中大礼堂的那场大型集会，更令民情沸腾。迫于舆论的压力，同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考虑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同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当局通过“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宣布自1987年12月1日起，一般民众可申请赴大陆探亲。

从11月起，台北市新生南路红十字会挤满了登记返乡探亲的人潮。姜老先生语带怒气地告诉笔者：当初开展街头运动时，责骂得最激烈的一位老顽固，此时跑得比谁都快，他几乎是第一个跑去登记去了。“我记得他留了一撮白胡须，所以印象深刻。”

姜思章说，自从1987年3月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以来，老兵们团结一致，同当局斗智斗勇，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前，老兵返乡探亲的诉求得以实现。时间之短、效率之高，出乎姜思章的想象。



姜思章在寓所内向笔者介绍当年参加老兵返乡运动时的情形。



参加“街头运动”时，姜思章（右二）与其他老兵在演讲台上慷慨陈词。

对于老兵们的诉求，国民党方面出人意料地有了善意的回应。1987年10月起，开放大陆探亲正式成案，据称，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先生主导了这一政策的制订。随后，台湾行政机构修改两岸关系条例，规定老兵返乡探亲每年一次，每次不超过三个月。随着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两岸之间开启了新的纪元。

根据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姜思章和最初的发起者们共同决定，既然返乡探亲的目的已经达到，必须见好即收，立即停止活动。1988年2

月，“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正式发布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解散。姜思章说，如此速战速决，就是因为看出了某些苗头，他们担心聚集的人气有可能会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利用。

事实证明，此举甚为明智。其后，民进党势力开始鼓噪，他们力邀姜思章等有影响力的老兵加盟，并许以官位，姜思章等老兵不为所动，坚决予以拒绝。

此后，姜思章和其他老兵一道，还参与了多项为老兵争取权益的街头运动。包括“老兵权利运动”、“中国统一运动”、“教师权利运动”等等。

能在父母的有生之年尽一份孝道，让老兵姜思章感到无限宽慰。他已为父母尽过孝道，并将他们送老归山。在舟山群岛还有不少亲人，现如今，往来两地成了姜思章的常课。现在的交通十分便利，从台湾启程当天就能抵达岱山。问他总共去过大陆多少次，他说起码也有数十趟，记不清了。时至今日，最让老人惦记的还是两岸和平及祖国统一大业。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已经入籍美国的女儿力邀父母赴美定居。在台湾成家立业的儿子也希望老父亲少操心，不要四处奔波。可姜思章说，台湾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一生已经离不开这里了。同时，他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希望为国民党候选人留住两张选票，从而为抑制“台独”势力尽微薄之力。

他极力“怂恿”美国女婿将公司的业务从亚洲其他地方挪到大陆来，为的是能为大陆经济发展作贡献。老人说，平生最痛恨日本人，他曾赴日本开会，其间没有自主消费一分钱。返程时遭遇飞机晚点，他宁愿挨饿半天也不去当地饭馆就餐。“我就是不想让日本人赚到我一分钱！”老人执拗地说。

如今，姜思章的足迹已遍布大陆各地，他多次赴北京参加“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并投书报刊，为两岸关系发展和国家统一献计献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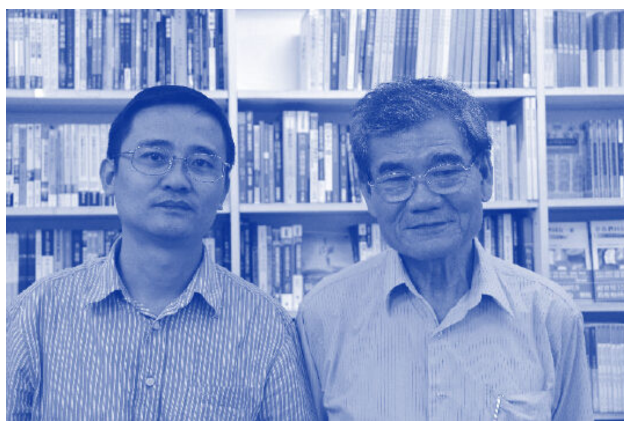
老人说：“爱国，不一定都要喊口号。我的爱国，就是要推动两岸同胞共同携手，缔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辉煌前程。”他同许多老兵相约：“一定要多活一些年头，亲眼看到祖国统一这一天的到来。”

在姜先生的书房里，笔者看到了繁体版的毛泽东及周恩来选集。他

说，这是当年读政工干校时，为了“批判”的需要而收藏的。他坦言，很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领导才能，并曾经到井冈山、延安等革命老区参观旅游。即便在台北，出门时，他总喜欢携带一个印有毛体红字“为人民服务”的挎包。



1989年7月7日，姜思章率台湾老师参访团在卢沟桥上合唱抗日歌曲。



2010年10月2日，作者首见姜思章（右）时与其留影。

“我再也不会做想家的梦了。”姜思章说，曾经在台湾做了几十年的回家梦，一次次在夜深人静时被老伴推醒。直到一次在岱山老家时旧梦重温，被老伴一把推醒，醒来时发现自己正睡在老家的床上。“从此以后，想家的梦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远征军老兵”潘银堂：每人试了3发子弹，即飞赴印缅前线



2010年10月2日，作者首见姜思章（右）时与其留影。

前言——

台北市万华区贵阳街口有家“开开看江浙菜馆”，和我们入住的酒店相距不足三百米远，应该是入驻此地的大陆驻台记者光顾最多的一家小餐馆了。因为栖身临街的骑楼下，逢雨天，可不用雨具，转个弯就到了。图方便省事，我们时常光顾。

从那位老板娘身上，我很快发现了“新闻价值”。她性格开朗，只要是我们小酌，她都会过来碰杯，但只会抿一口，表明意思到了。经过聊天，发现她竟是一位“大陆新娘”。姓陈，来自福州。

老板潘先生性格内向，言语不多，滴酒不沾。从他身上，我又发现了第二个“新闻价值”。

一次，老潘无意中透露，他老爸是四川人，老兵出身。“他老是写什么东西，写了很多年，也不知道讲些什么。”再问，原来，其父竟是一名当年赴印度、缅甸作战的远征军老战士。

我多次提出见面聊聊，均未果。要么是“老爸同老友到南部进香去了”，要么是“不在家，可能走亲戚去了”。有一次，老潘终于说，父亲答

应了。等第二天电话催问，老潘来了淡淡一句，对不起，老爷子不愿意哦。凭经验，我觉得应不是老爷子的问题，重点还是要打消潘先生自己的顾虑。

那天晚上，向供职的报社发完当日稿件后，我又到“开开看”吃饭，不巧，餐馆已打烊了，店内只剩下老潘夫妇和几位伙计围着圆桌就餐。我也应邀参加进来。大家都很熟悉了，我又提到老爷子的事。这回，潘先生说：“这样吧，你下周二上午来。”“说定了？”“说定了!”

怕忘记，我特意写了一张便条压在电脑前。周二上午近十点，没消息，我特意过去看了一眼，发现店门刚开，老潘不在，老板娘正在忙碌。我心里又没底了。

中午十二点刚过，手机响起。一看，正是老潘。“老爸到店里了！”我立即挎上相机，赶了过去。

临窗座位上有一位老人，他正是我要找的人。此时，饭馆的人很多，环境十分嘈杂，简单寒暄几句，见老人心情不错，我问他能否到我房间去聊会儿，那里方便些。老人点头允诺。

在儿子潘先生扶持下，老人来到我的房间。刚落坐，老潘忽然想起什么，“哦，老爸的一大本自传忘在饭馆了，我等会帮你送来。”说完，他告辞出去。正是上客高峰期，他要帮助妻子照顾客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等儿子潘先生忙完后回到房间，我们刚好结束。他果然带来一大叠老人的“手稿”。

千真万确，老人正是赴缅甸远征军。这位老兵的人生故事，可用“人生如戏多巧合”一语蔽之。

潘银堂本名潘银唐，因与部队一位连长同名，遂改一字。

老人梦幻般的人生似乎应从16岁那年算起，因为从那一年开始，他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回忆停留在这样的“原点”：他被反剪双手，五花大绑送去“保家卫国”。纵令母亲呼天抢地，谁能奈何以国家意志进行的绑架行为呢？

不同于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完全是人为的生离死别。这在当时，倒并没什么可奇怪——一切以抗日的名义，以保家卫国的理由进行。

在以后的漫漫人生长河中，一颗受伤的心灵一直向着自己的亲娘来泣诉——无论是在16岁开始充军时精疲力竭的行军途中，还是在88岁黄昏暮年时的台湾家中。

16岁，全村280名壮丁入伍，3年后仅35人全身而归

记忆，永久定格在16岁那一刻。

这一天，部队来村里抓壮丁。犹如农村“抓猪仔”：一窝猪仔，成长到一定的时候，总是要被饲养户抓走的，呼叫虽然惨烈，结局却是一定。时间能疗治一切，命运各自跌宕。

潘银堂同其他壮丁先是到了贵州。乘坐的是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生火熄火，走走停停，终于到达目的地。随后，这群川娃子转赴昆明。到了这里，潘银堂才得知，他们是要被派往缅甸作战。

这是一支后来被描绘成出生入死、英勇无畏的抗战队伍，且成就了孙立人、戴安澜等抗日名将的一世英名。可在远征军老兵潘银堂的记忆中，这支被抓来的队伍，完全是仓促成军，根本未经训练。“每人发了一条枪，给了三发子弹，试了试枪，就算是合格了，可以上战场。”枪声未落，即从昆明登上飞机，飞赴境外作战。

当时的战局背景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的海上补给线全被截断，　唯一一条通往境外的通道就是那条著名的滇缅公路。该公路于1938年1月动工兴建，经过20万人的努力，同年8月底，建成通车。它被形容为抗战时期“中国的输血管”，战略地位不言而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锋指缅甸，意图截断中国西南后方的唯一外援通道。

从1942年至1944年，为了保卫这条“中国的输血管”，国民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人的部队，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在付出了10余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后，保卫了生命线，有力地支援了盟军，予日寇以致命打击，直至凯旋。

潘银堂所属的部队就是孙立人将军所率的新一军。

在热带丛林里，一日三餐哪能吃饱，饿得头晕眼花的年轻人，常到驻地附近，偷地里的青豆、黄瓜、南瓜生吃。“味道好苦啊，真是难以下

咽，但没有办法，太饿了，肚子要充饥啊。”部队没薪水，填不饱肚子，还每日三操两讲，兵无半日闲，日子过得苦若黄连。

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吃苦受气的时候，多么需要母亲哪怕是一个鼓励的眼神，可是这都是梦想啊，夜深人静时只得强忍住泪水，抑制住思乡、思母之苦。条件极其艰苦，连吃水都要用桶背，想洗上热水澡，简直是异想天开。只有等到天晴了，才被允许到河里去洗浴。“每个兵士只有一套制服，很快身上都长了虱子。”

潘银堂记得，自己所在的部队（经整编）为赴缅远征军新一军新一师下属野战团1营2连。先入缅甸，再赴印度，在境外待了1年零4个月。最后，经过一番苦战，取得了抗击日军的胜利，并于日本投降后回到国内。

热带丛林里的战斗生活比影视作品描写的更为残酷。参加了多少场战斗，经历了多少次的生死考验，这位远征军老兵已经无法完整地回忆。翻阅老人的所有回忆材料，笔者发现，即便在退休后，他零零散散写的个人日记及回忆片段中， 也没有一场关于战争的完整描述。至多不过是，“炸弹在身边炸响、子弹擦耳嗖嗖地飞过”之类的笼统句子。“战场上的人，没有灵魂，随时会死去，不会记事。”老人如此表述。

不过潘银堂牢牢记住了这一组数字：全村被抓去当兵的共有280多人，3年后仅有35人四肢完好无缺地回家见爹娘。另有伤残者六七十人，总共有100多人活了下来。“战争太残酷了，其余的人都战死了或者因负重伤，被丢弃在了印、缅丛林里了……出国作战，语言不通，后勤保障短缺，路途迢迢，他们绝大部分成了孤魂野鬼……”

19岁，南京街头“撞上”叔伯，开小差混进兵工厂

从缅甸回国，飞抵上海，再由上海转赴南京。在部队休整的数月内，潘银堂曾匆匆回到老家，同母亲及家人见了一面，又得返回部队，因新的战争即将揭幕。

1945年12月的一天，发生在南京新街口路边的一次邂逅，竟让潘银堂的人生从此拐了个大弯。老人清楚回忆起当时的情形——

那是一个天寒地冻的下雪天。来南京几个月了，担任通信兵的潘银堂还从未单独上过一次街。这天上午，他特地向排长请了半天假，准备

中午外出，下午到新街口闹市看看街景，晚上再返回军营。

当时，劫后余生的金陵古都，交通条件十分落后，马车竟是南京城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每辆马车可坐4人，大约行驶了40分钟后，马车抵达新街口。新街口是南京市的繁华地段，是逛街赏景的好去处，也是城市的交通中枢。

雪后初霁，地上湿滑无比。下车处恰好是一处斜坡，潘银堂没走几步就脚底打滑，与迎面走来的路人差点撞了个满怀。站定后，上士潘银堂发现，对方原来也是两名军人，差点被撞翻的那位，肩扛一颗“梅花”，显示他是少校军衔。见对方不悦，潘银堂立即习惯性直立敬礼：“长官，对不起！”

未曾想，对方将眼前的这位陆军上士上下打量一番后，神色瞬间缓了下来，道：“什么长官长官的，我可认得你！”“啊？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你叫潘银唐（堂）!”

对方说的竟是四川家乡话。原来，这位少校是同村的一位叔伯，比潘银堂年长十五六岁。当年，侄子辈的潘银堂还没被抓壮丁时，这位叔叔就认得他，现在反倒是年轻的晚辈忘记了身穿制服的叔辈。

这位同村叔伯名叫潘开品。

异乡的大街上遇见同村的叔伯，仿佛见到了亲人，潘银堂很是兴奋。经过一番家乡话交流，叔伯知道潘银堂死里逃生从缅甸回国的经历，他也知道了这位叔伯现在南京的兵工厂任职。

“部队很快就又要开赴江北前线了，迟早要同共产党开战，我早就不想在野战部队干了，能不能投奔你那里？”潘银堂央求叔伯收留自己。

兵工厂不用像野战部队那样成天操练且毫无自由，原本就是被抓来的，潘银堂早已厌倦了东奔西跑的野战生活，只是苦于没有机会逃走。

听完侄子辈的一番诉苦，这位少校叔伯点点头。随即手写了一个地址给他：“南京兵工生产署，高乐门10号。”潘银堂将纸条拿到手里反复端详后，正准备放进口袋，却被叔伯一把抢了回去，并三两下将纸条撕烂扔掉。

“千万不能留下字据，要记在心里！”叔伯毕竟闯荡江湖已久，深知

部队的纪律和保密条例，他担心一旦事情败露，必将牵连到自己，不仅丢了饭碗，一切也都完了。

潘银堂对这次街头奇遇印象极深。“从新街口邂逅叔伯潘开品那天算起，再有15天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了。”而此前，部队已经下达动员令，即将开赴江北投入前线。潘银堂决定择机离开部队，投奔叔伯。在当年兵荒马乱、社会失序的背景下，部队“走失”个把人倒也并不稀奇。

当天下午，他在街上花5元钱买了一套便服，一件单层的裤子及夹层的上装。当晚，他按时归队。

过了几天，部队接到了开拔命令。傍晚，司务长因人手不够让他到厨房帮忙收拾一下，这正好给了潘银堂一个良机。等忙碌一阵之后，他悄悄离开营房，找了个僻静处，迅速换上便服，脱下的军服则随手丢掉。身份的变化，就是一层“皮”，转眼间，他就成了一介平民。

晚上10点，随着一声号角，部队在夜幕中启程渡江北上。而此时，潘银堂已行走在前往叔伯所在兵工厂的路上。没有交通工具，即便有也不敢乘坐，他尽量选择僻静的小路行走。借助黑夜的掩护，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远远听到有警笛鸣叫，心里是既紧张又兴奋。眼看目的地越来越近了，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顿时袭向心头。“部队将开往何处，这帮兄弟的命运终究如何，这一切的一切从此再也与自己无关了！”

在冬夜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几小时，直到第二天天刚亮时，才来到叔伯所在的兵工厂门口。他编了一个理由，很快见到了叔伯。随后，被顺利安排进了兵工厂，成为一名制造弹药的学徒工。

这一年，潘银堂19岁。

在兵工厂，有了业余时间，学习的机会随之多了起来。经过一番勤学苦练，他先是学会了组装收音机，借此，可在业余时间挣点外快。最多时，一天可赚100多元，而当时部队上校的津贴每月才300元。后来，他又学会了电器维修，包括扩大器（扩音机）、冷气机（空调）等。在上世纪40年代，这些家用电器的拥有者非富即贵，而维修这些高档用品的人也属凤毛麟角。

在兵工厂期间，有一件事，令潘银堂感触良深，也从此坚定了他的职业选择。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在维修方面已小有名气的他，经人介绍

接了一单私活——为立法委员孙科家修理冷气机。活儿是孙科家的内务总管吩咐去做的，为让维修人员方便前往，总管特意留下“国父路30号”孙科的家庭住址，以及孙科的一张名片。

孙科是孙中山之子，地位显赫。潘银堂如约来到孙科家，却被门卫挡在了外面，待反复核实身份后才被允许入内，这让潘银堂心生几分敬畏。大头兵出身的潘银堂第一次有机会踏入上流人家，一窥上层人士的家庭陈设和生活起居。

“主人孙科没在家，但孙太太和孩子都在。”经过紧张检修，忙出一身臭汗后，冷气机又开始制冷了，孙家老小投来感激的目光。孙太太气质不凡，为人却十分友善，她坚持要支付工钱。潘银堂说，算了吧，就当自己免费服务一回。可孙夫人坚决不同意，说不收钱就不准走人。见她态度如此坚决，他只得收了孙家80元国币的维修费。

这件小事发生在60多年前，可潘银堂迄今牢记在心。看得出，他是将这件事看成人生的一件杰作，也由此体会到，工作不分贵贱，只要干得出色，一样受人尊重。

在台北寓所，老人向我说完这个故事后，似乎意犹未尽。他缓缓从上衣口袋里向外掏一件东西，抖抖簌簌地递到我面前。我定睛一看，竟是一张发黄的名片，外面还套上了一个透明塑料封皮。上书：“立法院立法委员 孙科 324。”

这就是当年到孙科家修空调时，管家给他的那张名片，从大陆到台湾，从服役到退伍，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人竟将它保留至今。老人在日常杂记中曾提到，因一场大水，房子被淹，所珍藏的唯一一张母亲的黑白照片也弄丢了。可是，这张孙科的名片他竟保留至今。

这从一个侧面可知，当年国民党最高立法机关的立法委员（相当于国会议员）孙科的家规甚严，堪称廉政楷模。孙科及其家人能有如此境界，真不愧为伟人之后。

草根潘银堂，在兵工厂待了近两年，学会了后半辈子赖以谋生的电器维修技术。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49年初。潘银堂虽然避过了内战的炮火硝

烟，可难逃命运安排。蒋介石为了保存最后的家底，精心布局同共产党周旋的棋子，决定将兵工厂率先迁往台湾，即早在1948年底就已开始搬迁。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前夕，潘银堂不得不随兵工厂从南京登船，经上海一路颠簸抵达台湾基隆港。



孙科的这张名片，潘银堂 保存了60多年。

因为叔伯的关系才进了兵工厂，可不知何故，叔伯却没有随船来台湾。史料表明，当时，南京兵工厂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曾经掀起“反迁台”运动，作为兵工厂的一名负责人，应该连同家属提前迁往台湾才是。叔伯为何留在了大陆，是个谜，潘银堂迄今不得其解。潘老先生迄今常在心里叨念：叔伯若还在世，应是百余岁高龄，想必早已不在人世了……

叔伯家，潘银堂从来没有去过，但知道叔叔那时已有老婆孩子，家眷都在南京。

23岁赴台，8年后，同18岁嘉义姑娘结为连理

从大陆来到台湾，潘银堂感受到完全不同的自然气候。

总有下不完的雨，驱不走的湿气；到处树木葱茏，山上云遮雾绕。气候与大陆大不相同，只能慢慢适应。兵工厂属保密单位，初来乍到，规定不许写家信，抓到了要关禁闭。从此，家里人不知道他的死活，他也不知道父母及家乡有了何种变化。

在潘银堂多年来的挥笔漫记中，有两个女人他着笔最多，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妻子。这两个人现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老人用洋洋洒洒数

以十万计的工整文字，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以及对人生的感悟。

后来，潘银堂离开兵工厂，转到部队的后勤岗位。

还在兵工厂上班时，他就注意到工厂附近有家远东纺纱厂，那里的女工很多。这样的布局，仿佛是有人故意为之，许多兵工厂的单身汉，都从女工中物色自己的意中人。不久，潘银堂也有了自己的“艳遇”。

一次下班途中，天忽降大雨，潘银堂恰好带了把雨伞。待他撑开雨伞行走在路上时，猛然发现前面有位女工没带雨伞，一阵小跑来到路边的房檐下避雨。雨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襟，让她显得有几分狼狈，却将她修长的身材、姣好的面容衬托得楚楚动人。这让从未体验过男女之情的潘银堂心头为之怦然一动。平时连同女性说话都胆怯的他，不知哪来一股勇气，主动走上前，将伞递给她：“给你用吧，我快到家了。”见她满眼疑惑，他又补充了一句：“送给你的，不用还！”

孰料，女孩冷冷地道：“我又不认识你，陌生人的伞我不能要。”

虽然好心遇到了冷脸，可潘银堂没有抱怨，他记住了她的样貌。其后，他又多次在上下班路上遇到过这位女孩。但是，这女孩不长记性，毕竟她才十几岁，对这位悄然关注自己的年轻男子一点都不上心。

又过不多久，有一天，潘银堂下班后到附近的一座孔庙去闲逛。庙内，香火鼎盛，前面有一个莲花池，一池清水上除了漂浮着硕大的荷叶外，还有放生的乌龟和鱼虾之类。

忽然，伴随一阵呼喝，一位年轻的女孩挤过人群跑了过来，后面紧跟着一位手拿棍棒的妇女，她边追打边厉声责骂。眼见身后的人追得近了，女孩纵身一跃，跳进了庙前的莲花池里。围观的好心人立即跑过去，众人七手八脚将女孩拉了起来。潘银堂走近一看：“咦！这不正是那天避雨的那位女孩吗?”

这时，围观的人纷纷谴责起那位中年妇女来。透过围观者的议论，潘银堂得知，原来，这跳水的女孩叫阿萌，是一个养女，平常很懂事，可养母对她很苛刻，稍不如意，就会责骂甚至追打她。今天在后面追打她的，正是她的养母。眼见众人围观，阿萌更感到羞辱难当，她哭诉说：“别人家的女儿死了，父母会哭；可我是养女，死了都没人哭，让我

死了算了……”

“原来，她也是个苦命人啊。”潘银堂从人群中悄然退出，从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接近她，并娶她为妻，疼爱她一辈子。

后来，经过打听，潘银堂得知，她的舅舅竟也在兵工厂上班。阿荫的舅舅通过介绍人了解到潘银堂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有维修技术，迄今未娶，也有意撮合。他带潘银堂到妹妹家去玩，一来二去，双方都熟悉了。阿荫对年长自己一大截的外省老兵慢慢心生好感，她最终羞涩地点头答应嫁给他。

女大当嫁，养父母并未作梗，顺水推舟答应了这门婚事，但开口索要彩礼。好在潘银堂有一门技术，平时积攒了一点钱，下聘礼要5000元新台币，结婚还要再送5000元彩礼。“1万元，这在当时是好大的一笔钱啊，为了将阿荫娶回家，　只能咬咬牙挺过去。”潘银堂迄今还觉得养父母实在是狮子大开口。

阿荫虽然饱受养父母的虐待，可是，结婚后，她依然对养母很好，对亲生父母反倒没什么感情。她对生母心怀怨恨：“送个有钱人家倒也罢了，却给了一个比自己家更穷的人家！”养父母原本没有生育女孩，可养女进门后，却又生了女儿，因此阿荫不被重视。

阿荫的老家在台湾西南部的嘉义，父母将她送给北部的一户人家做养女，本想让女儿改换门庭，结果事与愿违。18岁的阿荫嫁给了外省老兵潘银堂，丈夫比她大了整整15岁。阿荫原名黄阿荫，结婚后随夫姓潘。

这一年是1957年。他们的新房位于台北县保安街一户人家的屋旁，是租来的一间3坪半（每坪3.3平方米）四方形旧屋。在有钱人家看来，这不过是一处堆放杂物的破旧工具房而已，可对新婚的潘银堂夫妇来说，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甜蜜安乐窝。

为了布置新房，潘银堂从工厂找到了许多木板，再找来几位朋友帮忙。房子的四壁用木板钉牢，屋顶也用木板堵漏。晴天还好，一旦天下大雨，就很麻烦。小房子里到处漏水，为了保证有一块可以安睡的地方，夫妇俩用一块大油布将最像样的家具——一张床，覆盖得严严实实。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住了一年多，并开始孕育小生命。

阿荫喜欢花草，常年与花为伴。即便居住的空间狭小，她都要在窗台上摆满鲜花，就连门口墙边的一条缝隙，她也要填上土，种上不知名的花草。因此，房子周围一年到头都被鲜花包围。潘银堂本不太喜欢鲜花，可时间一久，也习惯了生活在“花花世界”里。

潘银堂在老年时手书的杂忆中这样记录新婚心情：“尽管条件异常艰苦，可想到大陆的亲人，就感到好日子很快就要到来，心中依然充满了希望，总觉得暂时苦点没什么，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

每天早晨，听着乐队演奏歌曲，看着太阳徐徐升起，心里便满怀希望。每当下班了，回到自己的安乐窝，夫妇俩便将床铺当沙发，两人有说有笑，苦中作乐。当有朋友来访时，小窝里坐不下，就向邻居家借来几把竹椅，放在门前的巷子里，大家喝茶抽烟，一起谈天说地，十分有趣。

为了纪念这段日子，潘银堂还无师自通地赋诗一首：“一床一灶便成家，度得战时算不差；柴米油盐常累我，烹调洗涤总是她。”

一年后，夫妇俩搬到了位于台北县板桥的富联二村（眷村）居住，在这里， 他们一共住了五年，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降生。由于这里地势低洼，经常遭受水灾。1964年在宋美龄的“亲切关怀”下，军方开始为老兵眷属兴建档次较高的眷村。潘银堂一家得以入住位于台北县中和市南势角的飞驼一村（眷村）。

在眷村居住的日子里，虽然依旧是平房，条件依然艰苦，可是邻里关系非常之好，大家彼此照应，相处得十分融洽。

眷村忆昔，参悟“远亲不如近邻”真谛

眷村生活，潘银堂迄今依然十分怀念。

“好多邻居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经常是天南地北地聊，有时，从中午一直聊到天黑，这才各自回家。清晨起床后，可到邻近的华夏工专后山腰的小公园里，练太极拳和气功，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遇到哪家办红白喜事，大伙就到眷村自治会（相当于大陆社区居委会）门口集中，一齐搭乘交通车前往。在眷村里，买日用品有福利站，看病可找医务室， 几乎所有的生活资源都可在眷村内解决。这种又便利

又充满人情味的眷村生活， 使许多住惯了的人，特别是中老年人再也不愿搬走。

最让潘银堂难忘的是，一家遇到什么事情，总能有人出面帮忙，让你深切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的真谛。

一天晚上，忙碌了一整天的潘银堂忽然感到腰部一阵剧痛，随之而来的是头晕眼花，感觉整个身体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惊惧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阿荫要照顾几个孩子，不能离家半步，半夜三更的，这可怎么办？闻讯后，眷村内一位热心的蒋太太二话没说，将潘银堂送到了三军总医院。拍完片子一看，被确诊是脊椎旁长了一根骨刺，必须立即住院手术治疗。随后几天，蒋太太忙前忙后，直到大夫开刀取出骨刺来，她才离开医院。

住在眷村的大都是从大陆来台的军人及其家属，尽管来自不同的省市，但有相同的背景。因此，天南海北的口音交杂，各种文化及习惯在这里交汇，大家亲如一家人。

后来，眷村开始改造，平房改成了公寓楼，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可是，邻里之间交流少了，人与人之间从此变得隔膜起来。

谈起眷村生活，潘银堂总有说不完的话。

结婚第二年，老大友华出生，第三年老二琳华出生，第四年丫头丽华出生。

为了补贴家用，阿荫在带孩子的同时，还在眷村内开了一间日用品小店。进货付款，卖货收账，里外都靠阿荫一人操持。虽然她没有念过书，但阿荫生来鬼精鬼精，算起账目来脑瓜灵得很。

每天，丈夫潘银堂蹬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去工作。阿荫则既要照顾小孩，还要兼顾小卖部的生意。

上世纪50年代，台湾仍然贫穷落后。一般的家庭很少有机会吃到鸡鸭鱼肉，酱油拌饭，若能再加点猪油，那就是当时普通人家最好的美食了。平时，小孩都是穿布鞋上学，夏天里，许多小学生都是赤脚上学堂。

每天早晨，潘银堂都要早早起床，生炉子烧开水，然后到市场买来

两根油条、两大块烧饼，回家后分成三份，让三个孩子吃饱了好上学。他自己则吃点前一晚的剩饭剩菜，随后骑上自行车去上班。因为战乱和经济条件限制，潘银堂夫妇没有念书，他们把希望放在三个孩子身上，指望下一代好好读书，将来有所出息，超过爹娘。

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十分安稳。可好日子并不太平，在富联二村居住那会儿，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忽然遭遇洪水漫滩，地势低洼的村子被洪水吞没。眼睁睁看着房子和家当浸泡在水里，潘银堂欲哭无泪。房子是木板拼搭起来的，经洪水一泡，早已东倒西歪，所有家具都被洪水冲走了，整个富联二村变成了一片泽国。

虽然一家人都太平无事，可赖以栖息的小窝毁了，望着三个身穿薄衫的儿女，面对空壳似的房子，阿荫的眼红红的，忍了许久，还是禁不住蹲在房子旁边号啕大哭起来……潘银堂静静地看着身子不住颤动的妻子，他没有眼泪，咬咬牙，暗暗为自己鼓劲："比起枪林弹雨的日子，这又算得了什么？没关系，一切从头再来！"

日子过得飞快，居住条件在逐步改善，孩子也渐渐大了，生活如芝麻开花般，一天天灿烂起来。

年近50，退役、找工、置业，人生开始新篇章

1973年11月，年已48岁的潘银堂才被允许退伍，此时，他已是头发花白之人。

从16岁被抓入伍，在部队度过了30多年，同所有老兵一样，他将人生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国民党军队。

退伍之后，是一段茫然和失落期。休息一阵之后，潘银堂开始找工作。茫茫人海，没有过硬的人脉关系，他只得借助报纸上的广告去应聘，因没有文凭，结果四处碰壁。看着自己一家五口还挤住在狭窄的眷舍里，老兵潘银堂开始有些焦急了。

夫妇俩商量后，他决定重拾年轻时在兵工厂里学会的维修技术。先是用一张红纸写了一纸告示，张贴在眷村自治会的公告栏里。内容是："修理水电，请找潘先生，小材料免费，大材料自备，仅收取人工手续费。"并留下联系方式。

消息很快在飞驼一村和二村内传开，左邻右舍也热心充当义务宣传员。退伍老兵潘银堂很快忙碌起来。后来，不仅在眷村，就连附近的军眷工厂及南势角一带的居民也纷纷找上门来。

潘银堂凭借诚实为人、辛勤劳动和公道收费，很快赢得了居民的口碑，他经常深更半夜还要外出干活。尽管十分忙碌，可自己的劳动受到了肯定，潘银堂心里有莫大的欣慰。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夫妇俩开始谋划新的未来。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邻居说，附近有一处房产要变卖，可以分期付款。阿荫听罢心里痒痒起来。夫妇俩前去一看，是一栋三层高、占地面积30多坪的小洋楼，打听价格，还算公道。夫妇俩商量后，当即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契约，并付了首期自备款。

熬了大半辈子，终于有了自己的房产，回到眷舍后，越发觉得住房太狭小了。想想很快就要住上大屋了，一家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那天晚上，老夫妻彻夜未眠。他们聊起这些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阿荫时笑时哭，将多年来的苦恼和憋闷统统宣泄了出来。

丈夫潘银堂军阶很低，分配的眷粮和食补、住房津贴加在一起，才勉强一家人的温饱。三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直至上大专，都需要花钱。所幸，阿荫省吃俭用，不仅将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还略有结余。尽管节衣缩食，可亲朋好友之间的迎来送往，两口子从来都不含糊。阿荫逛街时，看到高级化妆品以及漂亮的时装，她也会心动，有几次差点就要掏钱购买了，可思量再三，还是忍了下来。香水、粉饼、口红什么的，也只是外出做客时才派得上用场，家里像样点的衣服都是换季时才买的打折货。

潘银堂每晚劳作不止，经常要到午夜12点之后才回家，尽管非常辛苦，可看到日进七八百元新台币，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十多年过去了，夫妇俩积攒了不少钱。为了防止物价飞涨，他们购买了10根金项链和一根金条保值；为防小偷，他们在小店的墙上打了一个洞，再装上一个暗锁，外面伪装成一个电器开关，白天即便店门大敞四开，也不用担心失窃，因为谁也不能破获他们的秘密。

看到头发花白的潘银堂风里来雨里往，成天东奔西走，一位部队的老长官看不过去，遂介绍他到鸿霖大厦当水电技术员。为了适应新的环

境，他开始重新学习，逐渐掌握了高层建筑的水电维修技术。从此，54岁的潘银堂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每天，他骑着自行车从台北县中和市华新街到台北市区的鸿霖大厦上班，路上需要1小时20分钟。大厦共12层，有30多家公司在楼内上班，潘银堂的工作就是负责大厦内各种电器的巡查和维修。每天工作10小时，空余时间他就看看书报练练字。在这里，潘银堂一直工作到65岁。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见他工作勤恳，且身体依旧硬朗，希望他能继续留下来。又超龄工作了10年，直到75岁时，潘银堂才真正退下来，安享晚年。

“台胞”回乡，“圆了个乡梦，却梦犹未已”

时间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陆宣布不再追究去台人员以前的所作所为，两岸关系开始转暖。台湾方面虽允许与大陆通信，但要通过香港中转传递。

1988年，潘银堂向大陆发出了第一封信。在收件人一栏，他写了三位长辈和一位平辈的姓名，以便有人亡故了还有其他人收到。一个半月后，潘银堂收到了回信。回信是二哥写来的，由此，他知道母亲早已去世。信中并详列某年某月某日某位长辈过世了，最后不忘一句“我们全家都生活得很幸福”。在潘银堂的回忆录中，他时常重复描写心中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四川省大竹县石子乡，是一个拥有百余户人家的大村落。乡村环境清幽，十分宁静。村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敦厚质朴。山村的四周花木扶疏，村子的后面是一座小山，山上林木茂盛，鸟语喳喳。春夏时节，遍野是鲜花，香味袭人，到处蝴蝶飞舞，景色美不胜收。清晨，可看见日头冉冉升起，中午可见天上白云飘飘，傍晚，凉风习习，燕子归巢……

村前有一条小河，河边还有一条马路通向重庆。马路两旁是一块块绿油油的稻田，微风徐徐，绿波荡漾。牛儿在低头吃草，燕子飞蝶儿舞，农人三五成群地下地锄草，在田野里构成一幅春耕图。再向前走几步就是一条小河了，终年流水潺潺，河清见底，可见鱼虾在游动。 我和二哥经常到这里摸鱼捞虾，常常是落汤鸡般回家。

1989年6月12日，终于等到了回乡探亲的这一天。潘银堂同女儿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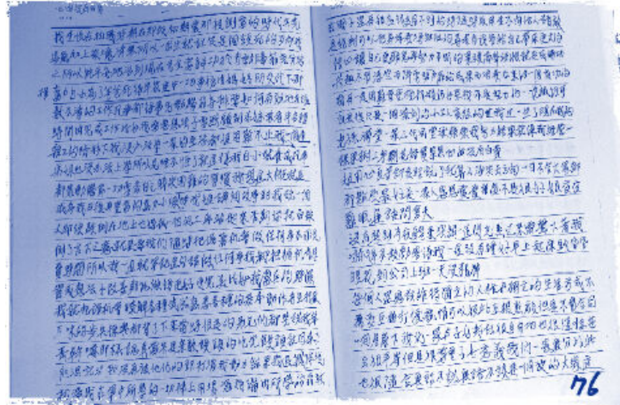
丽华踏上了返乡的路程。父女俩先是从香港坐飞机到重庆，再由重庆乘车到大竹县。在香港，他拿到了台胞证，这是他第一次以台胞身份回到大陆。“在台湾，我们这些老兵被称之为‘外省人’，回到大陆，我们又被称之为‘台胞’。”而在老兵们的实际生活中，依然按籍贯自称为四川人、山东人、江苏人等等，第一次被冠以“台胞”这个名头，潘银堂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飞机上的乘客，也基本都是返乡探亲的台胞。这是离家40多年后，一位远征军老兵的返乡之旅。盼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成行，飞机此时正向他昼思夜想的故乡飞去。

潘银堂闭着双眼，尽力回忆当年离家时的情形，重温母亲那时的容颜。本来，他曾有一张母亲的照片，可是在富联二村居住时，因一场大水，随同家具一起被冲走了。从二哥来信得知，母亲已经走了37个年头了。满脑杂乱无章的猜测和想象，还来不及整理，飞机已稳稳降落在重庆机场。



老兵潘银堂写的日记——家长里短，无所不包。



尽管年逾古稀，潘银堂的日记里依然满是少年时对故乡的记忆，以及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走出机场，取了行李，父女俩雇了台小汽车，直奔大竹县石子乡而去。潘银堂不住地观看车窗外的景象，将眼下的情景同当年的记忆进行比照。只见大街小巷全是骑自行车的人，密密麻麻。他发现，重庆境内到处都在修路，四处黄土飞扬，一片飞沙走石。眼下的大陆并不发达，与台湾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

车行6个半小时，到下午1点半才抵达石子乡潘家村。

走到村口，凝视周围，潘银堂感到了异样。“眼前的景象同无数次出现在梦境中的样子大有不同：村前的河水脏污不堪，红墙绿瓦的小院子不见了，村庄后的土地庙已经倾倒，里面的神像不见了踪影，几颗柳树缩着脖子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

潘银堂和女儿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原先自己家的大门，一个老人的声音传来：“喂，你们怎么闯进我的家了？”一位年约70多岁的老人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老一少。

“我叫潘银堂，这里是我以前的家。”

“啊，你是从台湾来的吧？”

“是啊！”

“我是这里当家的，名叫潘书堂。”老翁微微弯了一下腰道。

“你就是我40多年未见的二哥吧？”

旋即，两人拥在一起，泪水长流。

二哥说，咱家被清算了，自己老婆也被乱棍打死了，兄弟妹都成了“黑五类”受管制。唉，现在40多年过去了！

二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着了火柴，猛吸一口说，家里的几块旱地也被瓜分了……老态龙钟的二哥坐在门槛上，双手掩面伤心地抽泣起来，眼泪一颗颗滴在胸前。

过了一会儿，四弟绍堂也回来了。二哥哑着嗓子告诉他：“你三哥回来了，从老远的台湾回来了!”

紧接着，是其他的亲兄妹相见。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过多的言语。大家泪眼相对，许久没有说出话来，都用手紧紧抓住老三（潘银堂排行老三）的臂膀，仿佛生怕他跑了似的。

潘银堂早已泣不成声，女儿丽华也跟着流泪。这一刻，何止是肝肠寸断，连心都要碎了！

不识字的四弟带着潘银堂拐了一个弯，来到山坡下的一间屋前。他的家最为清寒，屋里只有一条长板凳，一张矮桌子。屋顶上压着大黑瓦，墙壁是纸糊的，隐隐透进外面的光线。

父女两人坐在长凳上休息，四弟赶紧去烧水泡茶。两人这才意识到今天走了不少路，口也有些渴了。兄弟俩边聊天边喝茶，潘银堂从行囊里掏出一大盒台湾产的凤梨酥分给大家吃。

傍晚，村里的人听说国民党老兵潘银堂从台湾回来了，都觉得很新奇。一大群儿童站在门外向屋里张望，年长的就进屋打招呼。“哎呀！40多年不见了，你好哇！……身体不错啊，看不出已是60多岁的人了。”一时，屋里屋外闹哄哄一片，犹如过大年一般热闹。

潘银堂将带去的牙刷、洗发粉等日用品一一分发给乡亲们。见屋外的小朋友还是不走，遂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就拿出预先准备好的小红包分发，每个红包里都装有5元人民币。得了红包，孩子们嘻嘻笑着散开了。老人们也纷纷告辞：“让银堂先休息，明天我们再来摆龙门阵。”

回乡后的首夜，潘银堂的心情非常激动。他不住地追问几十年来家中的情形，娘是怎么死的？葬在何处？等等。

一夜恍恍惚惚。次日清晨，游子潘银堂早早起床，他沿村庄小路探寻远久的记忆。在村巷内行走，眼前是一户户陌生的门墙，以及一张张陌生的脸孔，忽然间，潘银堂心头升起一丝惶恐，旋即奔出巷口。待抬头一看，村后的北山虽秃，但轮廓依旧。我这是在老家吗？他用手摸摸脑袋，又用左手紧掐右手，看有没有痛感，试图验证眼下是不是在梦境中……

回到故乡，抚摸这里的一草一木，感到既新鲜又陌生。尤其是看到尚存的旧物，更感到格外亲切，“连祖屋的每一块砖石，都觉得是温暖的”。

父亲早年过世，是母亲一手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因此，他对母亲的感情格外深切。“每次告别时，妈妈总是坚持站在门口，我挥挥手道别，她久久不愿转身。夜空中，四周漆黑一片，在老家昏暗的灯光下，妈妈慈爱的身影，孤独地站在那里，看他的儿子渐行渐远，直到拐角不见了，才返回屋子……”此番回乡，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拜祭母亲的坟墓。等做完这一切，潘银堂似乎心愿已了。

潘银堂希望拜访几位少年时的玩伴，竟一个也没有找到。他们或早已客死他乡，或战死在各个时期的战场。有一两个活着的，但都客居他乡，无从见面。他发觉，在老家他是一个另类，一个远客。

“我圆了个乡梦，却梦犹未已。”文化水准起点不高，全靠自学求进的潘银堂，如此总结自己的第一次返乡探亲之旅。

尾声——

写完远征军老兵潘银堂的故事，我轻嘘了一口气。

尽量忠实、完整地记录国民党老兵们的人生故事，不希望被自己及他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尽量以平和的心态和白描的笔调行文——这是我的初衷。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我们自己。

潘银堂是一个极普通的老兵，普通得连其家人对他的过往也毫无探

听的兴趣。当我向他的子女辈转达其父母相识相爱的情节时，他们微微一笑："哈，老爷子还有风流韵事？"显然，长期以来，老人只是一个自言自语者。

在台湾，老兵阶层基本就是个淡出历史舞台的"夕阳群体"，没有人会投入更多的关注与热情。

老兵们有"终身俸"，生计不成问题，只是他们年事已高，行动愈来愈不便，已完全被社会冷落。不同于20年前，老兵群体一度备受社会关注。现今，他们已是风烛残年之人。解严了、探亲了、尽孝了、老朽了，总之，被社会边缘化了。对老兵来说，大陆老家已重新变得"遥远"乃至"遥不可及"。

四年前，潘银堂老人相亲相爱了一辈子的阿荫离他而去。如今，两儿一女早已成年，孙辈绕膝的他，每月尚有1万多元新台币的"终身俸"养老。海峡风平浪静，正可安享晚年。

遇见潘银堂老人之前，我无法想象，一个88岁高龄的老兵竟有如此丰富的感情世界。无论当年何种原因来台，绝大部分台湾老兵，都抱持一个中国理念。正如潘银堂老人所言：我们不是"外省人"，请别以"台胞"相称，我们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啊！



远征军老兵潘银堂在台北向本书作者讲述人生遭际。

老人用一种近乎无奈的语气说："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时间在一分分地流逝，就像鱼儿的水越来越少了……我们即将作古，很快将被人遗忘。"

征得老人同意，我复印了一套老人“经常瞎写”而成的“回忆录”，拿在手里有厚厚的一大本。在写作此文时，我反复阅读、参考这些笔迹工整的繁体汉字。在不断重复，甚至颠三倒四的描述中，拉拉杂杂记录了一位漂泊者从童年到老年、从入伍到退伍、从大陆到台湾的生命历程。

我发现，台湾老兵们普遍热衷写回忆录，他们似乎急切地想表达什么，想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也许，他们那一代人内心有太多的无奈、太多的纠结、太多的鲜为人知，经历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之后，他们表达的欲望变得非常强烈。

合上厚厚一本老人手写的“大书”，心中祈愿油然而生：愿苍生永宁，愿和平恒久！

“中美班特战员”鲍大贤：共军“政战”技巧，国军望尘莫及



纯属偶然。在人生地不熟的台北街头，竟认识了一位国民党老兵，满口山东腔的他，却是安徽人。他名叫鲍大贤，现年80岁，皖南歙县人。

那天下午，我准备将上午采访获得的一位老兵材料拿去复印。在酒店服务员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一家复印社。

返回时，需要横穿中华路。在等红灯时，那家“荣民服务社”的招牌忽然令我眼前一亮——它虽然就在我所住酒店的对面，来来往往熟视无睹，竟从未多加留意。“荣民”是谁？不就是国民党退役老兵吗？真是“灯下黑”，为何不去那儿碰碰运气呢？我随即改变主意，转向跨过另一条马路。

在入口处的一侧有一处“荣民配镜点”。一位银须飘飘、慈眉善目的老人引起我的注意。见他已忙完，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去，立即趋前：“请问，您是老兵？”老人答：“是呀，我1950年由金门来的台湾。”我说，您应该是山东人吧？“不，我是安徽人，当年部队里山东人多，时间久了，学会了山东话，说老家话没人懂。”我说，咱们是老乡呢，我从大陆来。他说：“这样啊，那可真是难得!”

老人很爽朗，也很健谈。我说，如不介意的话，能否请您到我房间

坐会？老人非常爽快：“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可以。”

就这样，在我的房间里，一杯热茶，几句寒暄之后，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老人的经历很奇特。他15岁考入中美合作所特训班，1949年，解放军横渡长江，他所在的部队被追击后遭围歼，随数百残兵当了解放军俘虏。受老长官蛊惑，竟又回归蒋军。一路奔逃，九死一生到金门，见证了那场著名的“古宁头战役”。

他本应死忠于国民党军队，却因一场查不出病因的“痼疾”早早脱离部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断然放弃军职，成为自由民，从此没有津贴，更与“终身俸”无缘，赤手空拳打下一片新天地。在台湾的60年人生历程中，命运大起大落。曾经神气十足，也曾垂头丧气……如今，他有一个“国际家庭”，8个子女、9个孙子辈，分散在祖国大陆，以及美国、日本、英国等地。

年少气盛时被“中美班”网罗

说起这位国民党老兵的从军经历，我们首先应重温一段历史。

大陆的中老年人大都对“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胡司令胡传奎的形象印象深刻。胡司令所统领的就是“忠义救国军”，这是一支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辍学的学生，以及各类流亡人士所组成的抗日队伍，它诞生于“八一三”战火之后。

再向上追溯，“忠义救国军”前身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将其整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负责太湖流域和上海周边敌后抗日。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支抗日武装，虽然成分复杂，但属于共产党抗日武装团结和争取的对象。

时间到了1943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后期。这一年，国民党和美国海军创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设在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中美所”在各地开设各种不同类别的训练班，皖南雄村也开办了军统特训班。戴笠希望借此整训、强化江南敌后“忠义救国军”。他组织人马轮流培训学员，学习爆破、擒拿、电讯、情报等特工技能。后来，这支队伍逐渐成为效忠蒋介石的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总部先设在皖南广德县王岭，后移师浙江昌化河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忠义救国军”及军委会别动队、交通巡察部队、中美合作营及汪伪税警团合并成立交通警察总局，编成十八个交警总队，维护铁路公路交通，另有部分人士就地转业或编入地方保安团。

前述这段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国民党老兵鲍大贤口述历史的时代背景。

鲍大贤讲述自己报名参加中美所特训班的时间较为模糊。他出生于民国二十年，即公元1931年，据推算，其参军时间应是1947年。“那一年，大约在端午节前后，自己十五六岁的样子”，脾气暴躁、桀骜不驯的他，自作主张报名参加了中美所举办的特训班。



老人向笔者展示24岁时摄于台北县板桥镇的老照片。

报名地点就在老家皖南歙县潜口镇（现属黄山市徽州区）。“当时，招考方吹得天花乱坠，称录取者将被送到美国进行培训。”鲍大贤说，当时民间流传“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哪个愿意去当兵送死呢？“我仅读了几年私塾，可生性倔强，从不信邪，总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60多年后，鲍老先生回忆说，“我是被他们‘送到国外学习培训’的幌子给糊弄了。”

鲍大贤出生在江西，抗战爆发后才随在南昌做生意的父亲回到了老家皖南山村。鲍家所在的蜀源村（现属黄山市徽州区），位于黄山南麓，是个大山环抱、山清水秀、人文积淀丰

厚的山村。别小瞧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该村历史悠久，始建于南宋建炎年间（1127年）。这里本是世外桃源，因为群山环绕，日寇的魔爪暂时没能侵入，皖南山区遂成了抗日武装的栖息之地。当时，以蒋介石的干将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在这里招兵买马，意图网罗党羽，扩充实力。在此背景下，中美特训班在皖南正式开办。

“考试其实很简单，非常容易地通过了。”鲍老说，自己曾上过几年私塾，看到录取通知，心里自然非常高兴，以为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就这样，年轻的鲍大贤成了特训班的一员。未曾想，时局变幻莫测，江北的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中美班“壮志未酬”，被整编成了交警大队，负责从金华到上海的交通安全。

“腾桥之战，一千多国军仅剩下三百多”

“共军渡过长江，势如破竹，国军被共军追打，一触即溃，根本无还手之力。”1949年，鲍大贤随整编后的部队一路南下，先是从金华、义乌向缙云县境内“转进”，后在温州腾桥，遭到解放军十八个中队包围。

“国军坛坛罐罐较多，而共军行装非常简单，一把雨伞，一杆枪，外加一个干粮袋。”鲍大贤说，自己所在的大队共1000多人马，共军兵力占绝对多数。但是，国军的武器先进，多是美式装备，尤其是以戴笠统领的中美班班底雄厚，用的全是卡宾枪和汤姆冲锋枪。但是，国军被打怕了，无心恋战，打到最后，几无招架之功，只能举手投降。1000多人，只剩下约300人。“我躲在一堵土墙的后面，周围全是尸体。当时才17岁，因年龄小没有当成主力使用，也没敢向外冲，所以才捡了条命。”

在我的台北寓所，尽管初次相见，可鲍老先生还是无所顾忌，如竹筒倒豆般，讲述亲历的战争场景。

回忆起当年的战争场面，老人的面部立刻绷紧起来。“战争，太可怕了！”解放军用的是俄制马可沁重机枪，我们在前面逃命，刚爬到半山坡上，后面的机枪开始扫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位国民党老兵用双手做出握枪的姿势，口里不住地模仿重机枪的声响。“共军的这种机枪长时间射击需要加水冷却，但射速很快，弹头也大，杀伤力很强。机枪做‘之’字形来回横扫，打得树枝哗哗作响，弹头碰到石头上当当作响，火花四溅。这种重武器，给国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我端详起坐在对面椅子上的这位国民党老兵来。长长的胡须，几乎覆盖了唇齿，话说快时，显得有些气喘。不过老人的气色和风度很好，极像个具有仙风道骨的艺术家。我递给老人一杯来自大陆他老家的茶——黄山毛峰。他说，这茶，自己家里也有，是大陆亲友寄来的。

回忆战争情形，老人思路清晰，表达流畅。我很庆幸，偶然遇到了这么个健康且健谈的老兵。

“老长官一句话，让我又回到国军阵营”

“被共军俘虏那年，我才17岁，没有作战经验，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只能待在掩体里听老兵在外面开枪。等枪声停歇了，共军打扫战场时，才将自己喊了出来。”老人说，到处都是死人，推开了好多尸体才走出来。“被俘的300人被安排在腾桥的一处电影院内，看惯了死亡之后，心里已谈不上恐惧了。”共军派来了一个教导员，训话开始了。

数十年过去了，鲍大贤老人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这位操北方口音的教导员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一路忍饥挨饿，吃了不少苦头。”随即话锋一转，说，“实际上我们都是同胞，愿意留下来的，我们热烈欢迎——凡愿留下来的，无论官兵，一律晋升一级；愿回老家的，我们负责开具路条，保证在解放区的通行安全，并提供吃住便利，负责平安回家。”最后， 这位共军指导员提高嗓音说，“不愿加入解放军，也不愿回老家，而愿意投奔福州的（当时，福州尚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也不勉强，我们也可以送你们上船，保证安全抵达目的地。”

老人呵呵一笑说，这位教导员除了自信还很幽默，他说了句令人终生难忘的话："我们早晚还会再碰面的，希望下次碰面时，兄弟们将枪口抬高一点——都是自己人嘛！"鲍老先生说，共军教导员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有情有义，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心，共军的"政战"功夫真是太厉害了！这方面，国军可真差远了。"国民党军队没有政工干部，直到败退到台湾之后，老蒋痛定思痛，才责令蒋经国按照苏联的做法，组建了政工干校，培养政工人才，专门负责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并提供心理辅导等。"

发生在60多年前，在浙江腾桥电影院内的那一幕幕，迄今刻印在这位国民党老兵的脑海里，并时常在梦境中浮现。

"我们在电影院待了一天一夜。共军不断挑来用大木桶盛装的米饭，还有大块的猪肉。一桶又一桶地送进来。可是，俘虏群中的长官悄悄下令，'不能吃啊，共军在里面下了毒！'虽然肚子很饿，可是无人敢动口，大家悄悄将饭菜倒在地上。"

共军的指导员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没有点破，吃不吃并不强求。只要看到盛饭的木桶空了，就立即吩咐人继续送进来。

次日早晨，开始派人来做调查。愿回老家的，发放路条，并根据路途远近，发放一定量的大米。这边发大米，另一边设了个回收站，嫌大米携带不便的，可就地置换成金圆券。不值钱的金圆券一捆又一捆地码放在地上。一部分人留下了，一部分人选择回家。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表示要回国民党部队一方。"共军确实说到做到，言行一致，没有任何刁难。"

"我为何要求到国民党控制的福州去呢？完全是听信了老长官的一句话。他是一位老上校，山东人，年近60了。他悄悄对我说，'小伙子，你还很年轻，未经历过共产党的管制。'他别有用心地说他曾在家乡见识过共产党的厉害。'我是吃过共产党亏的人，他们说一套做一套，你还是跟着我们走吧。'我那时才十七岁，没有识别能力，又担心回家没面子，听他这么一说，就决定随他去了。到台湾不久，这位老长官就过世了，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的选择。"鲍大贤老人说这话时显得心情复杂。

"共产党果真没有食言。他们派出一艘大木帆船，从温州出发，航行一天，经过马尾，再将我们安全送到福州境内。登岸后，我们来到一座

庙内。尽管国共双方交战，但在对待战俘方面，似乎早有默契。这里是国民党方面设立的一个接收站，专门收罗‘来归国军’。挨个核实身份后，立即发放粮饷，安排休息。”

鲍大贤被俘时是交警大队的一员，被打散后编入陆军野战军18军11师，后改为17师，军长是高魁元，后来此人成为国民党在“古宁头战役”中的关键人物，最后还当上了台湾的“国防部长”。

“鼓浪屿附近，上千国军差点喂鱼”

鲍老先生回忆说，在南逃途中，本来是不该让交警大队殿后的，当时的交警大队，属于交通部管辖，因解放军已经渡江，战事吃紧，临时变成副司令部， 负责保卫上饶至上海段的铁路安全。在从义乌到金华的路上，遇到了李延年集团军。他将杂牌的交警大队扣留下来，腾出道路让他自己的队伍先撤。真乃弱肉强食，可怜鲍大贤所在的地方部队变成了队尾的炮灰……

“从福州到厦门，路途艰险，汽车因为加不到汽油，只得放火烧掉。福建境内山高路险，完全靠步行，途中吃尽了苦头。”

好不容易到了厦门，台湾方面派来了“江建轮”，准备载其经金门到台湾。“江建轮”原是长江上航行的大型客轮，有七层楼高，客房有50多个，可此船本是在内河航运，船底较平，吃水不深，在海上航行遇风浪很容易侧翻沉没。

为了确保运输安全，江建轮奉命到大金门岛停靠，在金门太武山下搬运压舱石保持船身稳定。尽管如此，行在海里还是摇摇晃晃，一旦遇到大风浪更是十分危险，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危急之秋，逃命要紧。鲍大贤所在部队一千多人待在船上，等待风平浪静时开拔。可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出发，一千号人在船上吃喝拉撒，很快耗尽了船上的淡水。万般无奈，只得又从金门开回厦门准备补充淡水。途经鼓浪屿时，解放军已经迫近厦门，江建轮只得暂时抛锚待命，由旅长乘坐小艇到厦门去交涉物资补给。

旅长离开不久，忽然，“嗵”——一枚炮弹落到不远处的海面炸响。当时的金厦海面十分混乱，蒋军常用手雷在海里炸鱼，因此，第一炮没人在意。紧接着又是“嗵”的一炮，这回看清了，原来是解放军在调整炮位，第一炮打远了，第二炮又打近了。因为没有看到弹着点有浓烟升

起，解放军继续调整炮位。“一旦有一发击中，看到冒了烟，紧跟着就会咚咚咚连发，若是这样，千余条性命就完了。”

“赶紧跑啊！”一船的人都在请求开船逃跑，可旅长不在，群龙无首，谁也不敢擅自撤离。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中队长出面了，他一拍胸脯说：“立即启锚开船离开，如军法从事，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就这样，江建轮冒险起航，开到了小金门海域停靠，离开了危险区域，大家悬着的心才稍稍安定。

鲍老先生回忆说，当家旅长叫杨遇春，是蒋介石使手段，从共军队伍中“反正”过去的。杨旅长从厦门交涉完回到原地一看，发现江建轮和部队都不见了，一番寻找才看到了自己的队伍，于是大发雷霆：“没吃没喝时就找我要，到了关键时刻，却撇下长官逃跑！是谁下的命令？老子毙了他！”周围的人吓得大气不敢出，都在为这位中队长求情：“旅座，不行啊，再不走就成了共军的靶子了！”旅长见众怒难犯，这才渐渐息怒。

鲍老说：“我当时很傻，遇到共军炮击，船上人乱成一团，很多人都去抢救生衣，担心落到海里喂鱼，可我懵里懵懂，虽然不会游泳，却将救生衣让给了别人。一旦落水，非喂鱼不可。”

其实，江建轮在逃离途中已经中弹，只是这一船人命大。“一发炮弹穿透巨大的烟囱后，冲击力延缓，掉到了船缝处的金属网上，弹头向下卡在半空中未着地，居然没被引爆。”当时一船的官兵都暗自庆幸大难不死，并迷信地说，这艘船上一定有真命天子在，所以能逢凶化吉。

“古宁头战役，解放军虽败犹荣”

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一时不能撤向台湾，鲍大贤所在的部队只能滞留金门，接受金门守将胡琏的指挥。胡琏下令，将该旅一分为二，一部分驻扎在料罗湾，一部分驻扎在洋宅村一带。

“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活这么久。一路上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鲍大贤后来同大陆的妹妹说，“我今年80岁了，能活到今天，真是没想到。莫说在浙江被共军围歼，就是从福州到厦门这一路上，死亡也是随时都会发生。”

从福州开始，一路翻山越岭，马匹背着行李，稍不留意，脚下一滑

就掉了下去。山涧深不见底，掉下去许久才听到回声。人也一样，掉下去后，再也不会有人闻问了。一路走，一路掉队，人马越走越少。

路过泉州时，要经过泉州大桥，为了防止共军追踪而至，鲍大贤所在的部队走后立即将大桥炸掉。两边的桥头都有碉堡，桥被炸掉后，两端的碉堡里都驻扎了军队，北面是追上来的共军前锋部队在把守，南面是国民党断后的军队在驻守。一方听到对岸有人用山东话在交谈，于是隔江喊话："老乡，吃过没有哇？"这边乓乓乓一阵扫射。那边又发话了："我们是老乡，老乡不打老乡！" 这边也用山东话回他："今晚俺们都辛苦了，都睡个好觉吧！"

其实，在战场上，有时也并非你死我活。都是中国人，有时敌我难辨，曾有一位国军趁天黑溜到共军的宿营地偷吃包子馒头，吃完了抹抹嘴，又回到自己的阵地，竟然神不知鬼不觉。

除了防备共军突袭，有时还要防备天上的飞机。当时本只有国民党军队才有空军，可是陆上两军混杂在一起，从空中看，根本分不出敌友。"遇到天上有飞机时，我们就用白布临时拉起约定的信号。"有时稍慢了一点，飞机在头顶上兜了两圈，等到第三圈时，机枪已经"嘟嘟嘟"扫射过来。老人家用手比划说，飞机子弹又粗又长，一旦击中就是三颗，非死即重伤。

"等下面的帆布拉好了，飞行员识别出来了，便拉起机身，翅膀摇一摇，飞走了。下面的人已经躺倒一大片，个个破口大骂。可这有什么用，兵荒马乱，各自逃命，谁管谁啊？"

"我们这一千人，本来是去台湾本岛的，因为没有交通工具，被搁在了金门岛上，等待台湾派来登陆艇。"那时，国民党各军种、各派系间相互倾轧，危机时刻，各找门路，还经常发生相互抓人的事。"一个连本该130至150人，上边也按照这个数字拨付给养，可实际上，一个连还不到七八十人，空饷都被连排班长给瓜分掉了。上峰下来调查，情急之下到处乱抓人充数。"

发生在1949年10月24日晚的古宁头战役（我方称金门战役），虽然蒋军吹嘘大胜，实际上，他们死的人也不少。解放军死了3000多，被俘7000（此说未有定论——笔者注），国军自称死了1200多人。夜间双方相互穿插，而且有蒋军被俘后立即调转枪口，彼此死在对方的阵地

里，加上当时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成分复杂，谁也不认识谁，战后打扫战场，只能就地挖坑，用推土机集中掩埋。金门岛上，有多少无名冤魂在游荡啊！关于古宁头战役之初，共军如何被发现，有多种版本。作为亲历者之一，鲍大贤的版本是：当时有一个传令兵半夜起来小解， 猛然看到海面上来了一片黑压压的木船，意识到共军偷袭过来了！情急之下，那个传令兵顺手抄起冲锋枪“嘟嘟嘟”来了一梭子，这才惊醒了睡梦中的守军。当

时，“解放军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以至于近岸时才被发觉。”

当时，共军大都是北方人，在海上一颠簸，下到海滩时连站立都困难，哪有战斗力呢？以逸待劳的守军用坦克车排成阵列，将登陆的共军向海里推，没淹死也被轧死了，战况极其惨烈。

双方激战，晚上看不见对方阵地，台湾方面派来飞机丢照明弹，战场被照得通亮，可还是分不清敌我。

当时，国民党部队身着草绿色的军便服，解放军的服装颜色也差不多。解放军的情报很准确，准备也很充分。国民党部队这边在胳膊上扎什么颜色的识别带，对方立刻换上同样颜色的识别带。结果是一场混战，最终，因后继乏力，缺乏渡船增援，导致共军两批登岛部队全军覆没。

鲍大贤和所在部队被分在洋宅这边驻扎，距太武山较远，被当作预备队使用。“山东兵上前线前有吃饺子的习惯，边吃边等上阵的命令下来，大家已吃完饺子，正准备上前线去送命了，却从前线传来消息说，战事已经结束了！”

当年，金门岛上没有树木，被打散后的解放军，撤退到太武山准备打游击，可光秃秃的山体，令藏身非常困难。最后一个“漏网之鱼”是一位团长，他在晚上出来偷挖地瓜（山芋）时被发现。被俘后，询问他是否知道部队已经投降，他回答说知道，但认为后续部队还会继续进攻。这位被俘的共军指挥官坦言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身患“痼疾”，提前告别军旅生涯

在战争年代，国共军队虽然是生死对头，可是，“人员交流”频繁，“被俘来归”并不是稀罕事。

鲍大贤回到部队后，国民党“国防部”曾下发了一个“被俘来归同志调查表”。“当时不知道这个表有何用，加上被俘总是不光彩的事，因此几乎无人愿填，调查表都扔进了废纸篓。后来才知道，凡填了表的都获得了一笔慰问金。”

初来台湾时，曾经有机会回到大陆。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曾抱定“反攻大陆”的幻想，不断进行人员空投，从事情报及颠覆工作。招募人员空投大陆，要求自愿登记，承诺事成之后每人发奖金20万元新台币，这笔钱很诱人。曾经受过特种训练的鲍大贤同妻子商量，希望借此回老家看看，万一牺牲了，留在台湾的妻儿也能拿到这笔钱。可是，他的盘算难以实现。蒋介石早就算计好了，他许诺的“重金”并不好拿。比如说，派你到上海，要同那里潜伏的人员接上头，等回到台湾后，要出示到过现场的凭据，例如那期间上海某家电影院的门票等，这样证明你真的到过那里，完成了任务才能拿到奖金。

鲍大贤最终放弃了这种火中取栗的妄想。

老兵鲍大贤军龄六年，在金门就待了近两年。

“整个金门什么都没有，当地的食物除了地瓜就是花生。国共两军隔海对峙，最多时，大小金门岛有驻军20万人。”后来，鲍大贤患上了一种怪病。四肢无力，长时间发烧，并久治不愈。部队只能将他送到位于台北的陆军总医院救治。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依然不见效果，医生也无法判断究竟是何病，只能开具证明，说是患了某种不知名的“痼疾”。“部队征询我的个人意见，我说那就离开部队吧。对方说，一旦放弃军籍，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今后你就是一个同政府福利没关系的人了。”那时年轻，做事喜欢不顾后果，鲍大贤心想，即便什么都没有了也没关系。于是，就填了一个“自迁表”，声明放弃部队的一切。从十五岁当兵入伍，历经九死一生的煎熬，六年后，鲍大贤又成了一名自由人。“当初报名参军，是想出国见世面，可最终发现，这场搏命游戏的结局是让自己远离家乡，变成了一名在举目无亲的海岛上漂泊的游子。”

自谋生路，从小伙计做起

刚开始谋生时，无依无靠，鲍大贤只能投靠老乡。

皖南歙县籍的一位老乡名叫王德焜，他原在上海开了一个牙膏厂，生产“四合一”牌牙膏，1949年后搬到台湾继续经营。

“我在他的工厂打工，一天到晚折牙膏盒。做了两三年，因表现不错，从普通工人升任为公司的办事员。”老板只身来到台湾，孩子都留在了大陆，于是，他将来自同一地域的鲍大贤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

后来经人介绍，鲍大贤交了个女朋友，她是在台湾出生的福建籍人。“当时，我的月薪仅180元新台币，这个经济实力哪能娶得起老婆？尽管日子很苦，但自己开始做点小生意，还是比部队强。”在部队当兵每月才有18元新台币的津贴，中尉才66元新台币。

得知鲍大贤交了女朋友，王德焜出钱帮助操持了婚礼，成全了这对小夫妻。王德焜成为鲍大贤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位“贵人”。

“老太婆常与我回忆当年是怎么过来的，她说，‘天上一滴露，地上一根草’，意思是说，像自然万物一样，能生下来就能活下去。虽然养了5男3女，共8个儿女，但一个个都被拉扯成人了。”

徽商底蕴，使他跻身商界大款之列

巧遇鲍老一个星期后，我按照老人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台北县老人的家。那天，我乘错了车，以至于让老人在楼下等了许久。

鲍大贤老两口住在一栋多层住宅的四楼，因住顶楼，又在上面加盖了一层，因此，住房面积很大，楼顶有一个可以养花种草的大平台。

两位老人很高兴，对着墙上的照片，向我一一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并回忆起当初创业时的种种遭遇。“其实，刚离开部队时身上还有点钱，是用金圆券换成的袁大头银元。其时，台北的一间房子价值不到2000新台币。也有很多人劝我，趁现在还有点钱讨个老婆安个家。当时，蒋介石拼命鼓吹反攻大陆，仿佛打回大陆很快就会实现似的。我心想，马上要反攻大陆了，大陆面积广大，房子多得很，到台湾买房干什么？”



结婚时，鲍大贤（后中）同妻子（后左一）、介绍人（后右一，也是结婚时的伴郎）及岳母等在一起。

鲍老说："那时，我身边有超过300块银元，这些积蓄是经多年积攒下来的。我父亲是个生意人，曾经在江西南昌市开过一家南北杂货店，家产可值200 两黄金，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经常带着儿子蒋孝文到父亲的杂货店买香烟。后来， 日本人轰炸南昌，为了逃避战火，父亲带上家小回到皖南老家。"

"我在部队时，父亲还经常寄汇票来，有时换成现金，有时也给退回去。随着战局变化，有朋友劝说，你还是留一点钱在身边吧，战局变幻莫测，现钱可以防备急用。"鲍老记得很清楚，"被解放军俘虏时，没有遭到搜身，300块银元一直带在身边，有时由几个朋友分头带。还有一枚金戒指，也扳直了塞在皮带里，等到台湾时，慢慢变卖成现金。退伍之后，因为有一点钱，加上慷慨大方，所以经常有几个朋友围着自己吃吃喝喝，将我奉承得像皇帝一样。"

提起过往，鲍老有件事至今后悔不已："当时在台北中华路一带的简易房屋，每间不到1500元新台币，估摸自己口袋里的钱，可以买上10间没问题。但是，当时没有置业的意识，现在这些地段早已是台北的黄金旺地。"

作为徽商的后裔，鲍大贤身上还是留下了经商的基因。成家后，他用这笔钱，与朋友合伙开了家广东饮茶（早茶）馆：凤凰茶楼。这是台北第一家广东饮茶馆。生意很快就做开了，随后，又开了10多家连锁店。就这样，凤凰茶楼、五福楼、中兴茶楼等成了台北著名的茶楼，生

意十分火爆，日常食客都要排队。这样的红火一直持续了十年。鲍大贤，这位徽商的子孙，摇身一变当上了董事长，成为台北市商界的头面人物。

1979年3月26日，鲍大贤又在台北近郊的三重市开了家大上海菜馆，专营上海菜。

一场火灾后，“鲍董”从天上跌回人间

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大火一夜之间令商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的鲍大贤几乎陷于破产境地。

位于台北峨眉街的凤凰茶楼开在六楼上，那天，楼下蹊跷失火，延及六楼。“死了7个人，都在我的茶楼内”，尸体都是好好的，是让烟给熏死了。

这是1982年的事了。“这被烧死的7个人，都在我的茶楼里饮茶，只能由店家全赔。每人赔了40多万新台币，一共300多万。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全额赔偿，一分钱不打折扣。”

出了这么大的事，房东也顺势将大楼收回，不再续约。“我也不想再做了，一把火，烧掉了我半辈子的心血。”曾经风光八面的鲍老板，变得狼狈不堪。

凤凰茶楼不能开了，可还有中兴歌厅、中兴茶楼等，靠它们维持生存不成问题，东山再起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老兵鲍大贤的命运遭际，还是应了祸不单行这句古话。

话头还要回到当年在牙膏厂那阵子。

厂子有位姓徐的股东——徐伟峰，此人是鲍大贤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他一直栽培我，从伙计一直升到副经理，都是他在帮衬。后来，徐先生开办南华内衣公司，委派我当经理，一直到开办茶楼都是这位徐老板一路提携。”鲍大贤内心十分感激这位徐老板。

徐老板经常往返于台湾和香港之间，认为台湾没有早茶店，开这样的店一定大有赚头。于是，在徐老板的动员下，鲍大贤用自己的积蓄和他合伙开店。

徐家有三兄弟，个个都是经商的高手，后来都是台湾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鲍老介绍说，徐伟峰家族曾经创立台北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第一百货”，在上世纪60年代风光无限，后来，走了下坡路。徐伟峰的弟弟徐之丰接棒，创办“今日百货”，一路扩展，成为巨型连锁百货企业。后来，也慢慢走入历史，被新型业态的诚品书店等接手……

且说徐伟峰死后，其子徐小丰准备振兴第一百货，为了借贷融资，径直找到父亲曾施恩的鲍大贤作担保人。

鲍大贤明知道此举风险极高，可为了报答徐伟峰，他还是在2000多万元新台币的借贷担保单上做了背书。不幸的是，商场如战场，行情瞬息万变，徐小丰最终生意破产。债主转而向担保人鲍大贤索债2000多万元。

徐小丰落魄后寄住在永和市鲍大贤的家里，鲍大贤念及其父徐伟峰当年对自己的好，便收留了他。徐小丰自然对鲍大贤感恩戴德，他发誓说：“只要我不死，以我的身家背景，总有翻身报答您的一天！”

徐小丰个人背运衰落，但他的亲叔叔和舅舅依旧都是富翁。徐小丰曾带鲍大贤到自己的亲舅家筹款还债。其舅曾任台湾某保险公司的老总，身家数亿计，拆借几千万根本不算什么，可是，这位亲舅舅此时闭门不见。见不到自己的亲舅，徐小丰流下两滴眼泪，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说：“老鲍，我们走吧……”

生意场上，人与人之间就是如此冷酷无情。

本有翻盘机会，又遇节外生枝

在笔者与鲍老交谈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老太太，此时插话说：“徐小丰人长得很帅，对人也非常礼貌客气，我们看在同他父辈的情分上才为其担保，为了支付担保金，我们将永和市两间60多坪（每坪约等于3.3平方米）房子出售了，凑足了2000多万，帮助徐小丰还了借贷。”老鲍说，为了徐家，就是赔光了也心甘情愿。“我能有今天也得益于他父亲的栽培。”鲍大贤由此元气大伤，再也无心经营。

世事难料，若干年后，徐小丰果然等来了机会。台湾方面与苏联开展经贸交流，俄方希望台湾推荐一名贸易代表，台湾方面将徐小丰推荐给“经济部”，一表人才的徐小丰果真成了台湾驻苏联“代表”，负责洽谈

经贸合作。得知这一消息，鲍大贤满心欣喜，对徐小丰的复出抱有极大的期望。徐小丰也认为终于有机会打翻身仗了。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徐小丰在莫斯科发生车祸，不幸身亡。尸体送回台北时，鲍大贤才知道这一坏消息。

那天，有朋友说，老鲍，有个消息告诉你，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小丰，他死了！这个消息，让鲍大贤一时难以接受，可这就是现实，不得不去面对。

“从1982年至今，我再也没有挣过一分钱。”一切均放弃了，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孩子们慢慢长大了——这，就是一位台湾老兵在台湾的60年人生历程。

鲍老说，自己离开大陆后的这60年，大体可分两个阶段：前30年短暂迷惘后风光无限，后30年意兴阑珊日子紧迫，甚至没再挣一分钱。因意外变故导致生意失败，又因为朋友担保赔了2000多万。尽管从此一蹶不振，但还留下一些积累。随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大家庭开始由儿女们共同负担了。

再到后来，徐家有人开办酒店和夜总会，希望请鲍大贤出山担任财务经理，可生性倔强的鲍大贤认为，失意人不找得意人。在电话中，他婉言谢绝了邀请：“你都知道我脾气不太好，这么多年的合作，也算尽了缘分，现在，年龄大了，不想再费劲……”

鲍大贤说，人的一生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凡事都由天命，对恩人不亏欠，心里就无比踏实。

首返大陆，恰赶上父亲八十大寿

那天，在鲍大贤老先生的家里，我看到了他的两个孙子。正在上幼儿园的两个小男孩，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在爷爷的怀抱里，片刻不能消停。

还有他最小的宝贝女儿，曾在美国波音公司就职，同许多台湾新生代一样， 她完全依靠读书在国外站稳了脚跟。鲍老说，这个小宝贝女儿，迄今还没有结婚哩，从来没向家里交过一分钱，现在还向母亲要钱花。

说这番话时，鲍老伯虽语带抱怨，其实是有很大的自豪感。如今，八个孩子共五男三女都已经长大成人。“我们家现在是一个国际家庭，逢年过节，家里人永远聚不齐，不是他有事，就是她有情况。”

如今，大儿子在祖国大陆做生意，在上海从事房地产开发；老二去美国留学后，成了美国公民，现在一家大陆商人在美国开的公司里担任翻译；老三在台湾，是一家著名品牌洋酒的代理商。大女儿结婚晚，孩子还在读小学。两个孙女，一个在日本东京留学，另一个在英国伦敦留学。老大的大儿子在台湾工作， 小儿子也在美国读书。

目前，鲍大贤的孙子辈，仅老大的一个儿子已经就业，其余均在世界各地读书。孙子辈共有9人，全家包括老两口，共有19人，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家庭”。

说起自己的父母亲，鲍老先生忽然感伤起来，他说：“我拿一件东西给你看！”

随即，他从客厅的一个柜子里取出一个纸包，细心地在茶几上一层层打开。原来，这是一个熏得漆黑、变形的小铜壶。他拿开壶盖，从里面倒出一张卡片，　　上书这样一句话：“美惠、阿璞与我第一次返乡探亲，欣逢老爸八十岁生日，临别时老爸赠我——它很丑，意义很大。”

老人说：“我告诉儿孙们，将来，我身边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丢弃，但是这个东西谁都不能丢掉！唉，我父亲为了我受尽了苦头！这是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父亲拿给我的，他说，儿啊，现在，我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家里面是一清二白了，就剩下这么个旧物，炖药用的古铜罐，你拿到台湾去做个纪念吧……”每当看到这个东西，鲍老先生就感到很心酸。

1987年，蒋经国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次年的中秋节前夕，鲍大贤在三儿子的陪同下，踏上了返乡省亲的路途。从台北飞香港，再乘火车到广州，次日飞杭州，再乘车到皖南徽州老家。

“当年，杭州机场连个像样的座椅都没有。次日，从杭州出发，长途班车也十分破烂，车窗连玻璃都没有。”鲍大贤赶到老家时，正巧赶上了父亲的八十大寿。“当时，一块钱人民币可买6个鸡蛋，8块新台币可换1块钱人民币，觉得人民币太值钱了。”

“我有一个朋友，由台湾经上海回老家省亲，准备买100个包子带回老家。等包子全部打包好了，付钱时，被告知需要粮票。他说，我多给一些钱能不能行？结果被告知不行，因为没有粮票，第二天就不能采购面粉，生意将没法做，那时大陆粮食是定量供给的。”鲍大贤觉得大陆普遍贫困。

“当时的大陆农村还很艰苦，父亲当天做八十大寿，连个鸡蛋也没得吃，妹妹买了块蓝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算是寿礼。”



鲍老先生保留的第一封辗转从韩国寄来的家书。



父亲的“宝物”就是这只铜壶。

从杭州一路颠簸了6个小时，才到达皖南老家。从台湾出发之前，鲍大贤已给父亲写了封信，告知何时启程。可那时通讯落后，信比人走得慢，等人到了老家时，信还没到。

“父亲第一眼见到几十年不见的儿子，一下子呆掉了！第一句话竟是，儿呀！好在是现在政策开明，要是早几年回来，你可把我害死了！”

家里连儿子小时候的照片都不敢保留，村里有人整天逼父亲交出人来。鲍大贤在家排行老大，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说，我有三个儿子没错，可是老大跑掉了，到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啊。

父亲胸前挂了个木牌子穿街走巷。很厚的木板挂在脖子上，还要一边敲锣。每天在规定的路线游走示众，脖子上都磨出了血。晚上，还要再继续检讨罪行……

“可怜我的父亲，他本是一个生意人，从江西逃难到了皖南老家，因为有点积蓄，置了些地，遂成了地主。但他的心地很好，交租都是看农民的能力，交得起才收租。当地人都知道这个小地主不坏，但批斗是上面的意思，村里人只能照办。”

回老家时，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两个弟弟均在农村。如今，在徽州，鲍大贤只有二弟和一个妹妹还健在。“二弟书法功底好，现在已经是有点名气的书法家。我们兄弟三人，我原名叫鲍传仁，大贤是字，大弟弟叫鲍传义，二弟叫鲍传礼。”

鲍老先生还从书柜里拿出弟弟的书法作品集送给我一本。他说，几个侄子辈现在也都混得不错，生活条件也都很好。“大陆这些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共产党真的很会顺应潮流，很了不得！”

夙愿已了，晚年心系大陆发展

鲍老先生从资料袋中，找到一份当年的《黄山日报》，他说，这是老家人从大陆邮寄过来的，自己一直留作纪念。



“这就是我的父亲大人！”



鲍老伯家里唯一“与蒋介石扯上关系”的东西就是这个瓷盘。

这是一份1988年10月1日出版的报纸，在第三版右下角刊有题为《今日中秋喜团圆》的消息，说的是迄今歙县已有147名台胞返乡，有携妻带子的，更多的人是只身回来——

鲍先生1948年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虽在台湾成家立业，但他无时无刻不思念在故乡的亲人。在歙县，他有80高龄的父亲，还有弟弟和妹妹。当探亲回到台湾的歙县同乡会负责人告诉他，其父亲身体不好时，立刻申请于19日从台湾出发，一路上马不停蹄，23日就赶到歙县富堨乡冯唐村（鲍大贤妹妹家），真是归心似箭！

鲍先生见到了八旬父亲鲍润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不孝之子四十年不能在父亲身边，今日能与父亲见面，实为人生最大乐事。”此番回乡，他一是与亲人欢度中秋佳节，二是为父亲祝寿，三是修缮已故母

亲的坟墓。他说："四十多年来，我只能望日思故乡，今年终于在故乡和亲人团聚、赏月，了却了四十多年夙愿。"

如今，老父亲和一个弟弟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在有生之年见到了父亲，他还是心满意足了。"要是再迟些时候，可能就真的见不到父亲一面了。"现在，自己也已80高龄，为防止发生不测，儿女们不再允许老两口单独行动，到大陆时要他们作陪才同意出行。

好在两岸之间交流频繁，距离不再遥远。鲍老伯用电视遥控器轻轻一按，立即出现了大陆卫星电视节目，可看中央四套，还有深圳卫视、东方卫视等等。这一刻，我感到身在台湾的鲍老伯，同大陆的普通老人几无差别。他们儿孙满堂，衣食无忧，晚年幸福，寄望两岸和平发展，希望子女事业有成，一家人健康美满。

告别鲍老先生时，已是台北华灯初放之际，老人坚持要送我下楼，并执意牵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来到马路对面的乘车点一同候车。

直到公共巴士开出好远，透过车后窗玻璃，我还能看到老人站在原地不住地挥手……

“老军需”仲跻玉：军官姐夫改变我一生



首次拜访，被怀疑是骗子登门

台湾的同乡会多如牛毛，基本都是“外省老兵”组建，随着岁月流逝，许多已名存实亡。台北市安徽芜湖同乡会登记地址后面，竟留有一个家庭固定电话号

码，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我尝试了一下，竟一拨就通。“我就是芜湖人。”对方爽快回答,“芜湖同乡会会长已过世，通讯录上留下的是我自己的住宅电话。”

笔者曾在江城芜湖工作生活过多年，尽管离开那里也已十多年，可在偌大的台北，第一次听到熟悉的芜湖口音，还是让人感到相当意外。老人老家就在芜湖市区，一个个彼此熟知的地名、掌故，让我们很快拉近了距离。电话里我们聊了几十分钟，我判断，老人应该年事已高，听力不佳。

我告诉他，下午两点还有采访，结束后再去拜访。

匆忙参加完一个发布会后，便打了台计程车（出租车）直奔那位芜湖老兵的住地，司机一直将车停在了复兴北路427巷一栋住宅楼前。

心想，先前费尽周折，现有预约在先，寻找老兵今天总算顺利了一

回。于是兴冲冲上前按门牌号摁响了门铃，可好久无人应答。遂特意站到门前的电子眼前再试，依然没有动静。我很纳闷：仅一个多小时前老伯还在家，聊得很亲热，怎这么快就没人了呢？我失望地退后一步，抱憾准备离去择日再访。刚回转身，一位身材高大、身穿制服的保全（保安）堵在了我身后。他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你认识这家人吗？"我如实相告并不认识。闻此，对方更加狐疑起来。与此同时，先前紧闭的大门打开了，一位老人缓步迈出。

我上前打探："请问仲跻玉老先生住这栋吗？"老人个头高大，满头白发，弯曲的背部显示出年龄老迈。他反问："你认识他吗？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我将来龙去脉向老人详细介绍了一番。听完后，老人指着保全说："他是我女婿，走，我们到那边去坐一会。"

我心里犯着嘀咕，他应该就是要找的人，为何老人前后态度判若两人？来到马路对面一家热闹饭馆外落座后，老人问："你不是说两点钟来吗？怎么现在才到啊？"我恍然大悟，老人耳背，他一定是听错了时间。

从老伯的举止和神态看，他依然疑虑未消。我拿出名片，并将几本证件一一掏出来给他及保全看。他依然疑惑不解："你是大陆记者，怎么会到台湾来工作呢？"我将自己为何能来台湾驻点采访的背景详细讲给他听，最终，两人都释然一笑。误会消除，我掏出采访本准备开工。老人说："这里不方便，走，到我家里去聊！"

保全松了口气，回到了自己的岗位。我随老人再次来到先前的楼下。这回他放心地打开大门，引我上了三楼。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后，老人笑了："我在大门外等你好久！保全问我等谁，我说有大陆记者要来，他说，这怎么可能呢，肯定又是骗子，您要当心！"并商议好请君入瓮的应对之策。"他只是小区保全而已，哪是我女婿！"

确认我曾在芜湖生活过多年后，老人心情大好。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希望谅解，并打电话给住在同一小区的二女儿，让她过来招待客人。很快，二女儿仲伟玲就到了。她笑着告诉我，父亲87岁了，视力不好，耳朵也背。去年，他一人在家时，曾遇到一位假冒上门检查瓦斯管道（管道天然气）的骗子，被骗走了几千元钱。吃一堑长一智，老父亲现在有了警惕性。

哦，原来如此！

翻箱倒柜，几十年传奇经历和盘托出

老人性格十分爽朗，他同我讲了很多很多，并翻箱倒柜将珍藏多年的个人资料找给我看。表示“我这把年纪了，没有什么好担心”。老人说的“担心”，是指当局可能要找麻烦。因为他是“荣民”，“终身俸”还捏在退辅会的手里呢。老人烟瘾颇大，我从大陆带来的香烟这回派上了用场。我送给他两包中华香烟，他笑纳了，像小孩一样，急不可耐地打开一包，点上一支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连称味道特别。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多，老人打开电视机说，你先等一会，我要看一下比赛结果。原来，今天下午有一场正在台北举行的大学生篮球赛事，当天直播的正好是大陆队与台湾队的比赛。因为我的到来，耽误了老人看球的时间，现在，他只能关注比赛的尾声了。“都是中国人，谁赢了都一样。”老人说，自己年轻时酷爱篮球运动，大陆篮球队在台湾的比赛直播，自然每场必看。他抱怨说，年龄大了，不然一定到现场去看才过瘾。

我陪老人看了一段比赛，结果是大陆代表队取胜。（这是一个“国际邀请赛”，大陆大学生队最终进入决赛。因赛场遭绿营人士捣乱，以大陆队退场告终。两岸间关系之微妙由此可见一斑。）

在台湾老兵的家里，看一位老兵抽中华香烟，看两岸球队比赛，感到很有趣、很有意思，于是，用相机拍下了当时的情形。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到了晚饭时间，老人一定要“请客”。我推辞不掉，只能客随主便。还是原先就座过的那家饭店，老人的二女儿仲伟玲说，父亲平时也经常到这家饭店吃饭，彼此都很熟悉。

择定座位后，老人点了几个菜，却没坐下来。他起身到后场找师傅去了， 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大概是嘱咐师傅菜的份量要足些、快些之类的话。他坐回后，我让老人安心等候即可。不料，我一转背他又离开了座位，走出了店门。我担心老人安全就跟过去。只见驼背弓身的老人正在用有些微微发抖的手，挨个地掏烟递给在门外就座的几位烟友：“这是大陆老家朋友带来的好烟，给你们尝尝……”看到老人顽童般的举动，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在我看来，他其实是个“空巢老人”，在台湾待了60多年，如今大陆有人来看他，同他谈起家乡的人和事，其内心情

感是复杂而丰富的。我无法深入老人的内心世界，甚至很难去换位思考。毕竟，我们曾经生活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



一支来自大陆的“中华烟”令仲老回味无穷。

从提防骗子登门，到欣然迎客，这一切都是在短短三两个小时内发生。今天的经历，不禁让人联想起两岸交往：两岸之间毕竟分隔太久，有隔阂和误会极其正常，关键是要保持常态性接触交流。除了官方交往外，更重要的是要让普通民众多沟通、民间多往来，任何误解终将冰融雪消。时间，可以填平一切鸿沟。

挥手告别诚朴而热情的父女俩，台北的街头已是灯火阑珊。看到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弯曲的身影一点点消失在巷道深处，那一瞬间，心情很迷茫：对于仲跻玉父女来说，我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访客；之于我来说，也只是偶然踏进这个普通的台北街巷，印象将转瞬模糊。即便身为记者，来台采访也非易事，这一别，不知还能否相见。实际上，仅过两天我们又见面了……

头脑好用的他，一生活得潇洒

位于长江下游的芜湖，曾是中国的四大米市之首，历来是个商贾云集、水陆交通发达的要津。芜湖，扼守皖江咽喉，是民国首府南京及十里洋场上海的门户。芜湖人素来精明玲珑、巧言善辞，富有坐地行商的传统。因此，多年来，芜湖人总想摆脱附加在安徽人身上的贫穷土气形象。无论是明眸善睐、巧舌如簧的小姑娘，还是衣着光鲜、油头粉面的小伙子，他们对皖北人向来轻视，市井俗民更视宁沪杭为代表的“下江人”为同群。

特殊的区位优势，使芜湖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尽管年届耄耋，可从老兵仲跻玉先生身上，依然可以透出老芜湖人身上特有的那种人情练达及江湖豪气。许多国民党老兵来到台湾后吃尽了苦头，生存艰难，娶妻生子更是个奢望。可芜湖人仲跻玉是个反例，他自称“来台后没有吃过苦头”。去台湾前， 他就曾娶妻生女，来到台湾后，依然潇洒地过着“游手好闲” 的生活： 成天腰挂“盒子炮”，骑个自行车，带几个小喽啰，在台北城郊之间逛荡。

日暮时分，他倚在台北郊外的淡水河桥头吹口琴，吸引过往美女们倾慕的目光。最终在师长夫人的撮合下，挑了一位扬州美女成亲，继续吃香喝辣，并生儿育女。

即便在今天，回忆起60年前初来台北时的境遇，他依然沉醉在一片浪漫色彩之中。从仲跻玉老人身上，我看不到台湾老兵眼神中的那种特有的悲苦和沧桑。“活得潇洒、过得快活”，是老人一生的风貌写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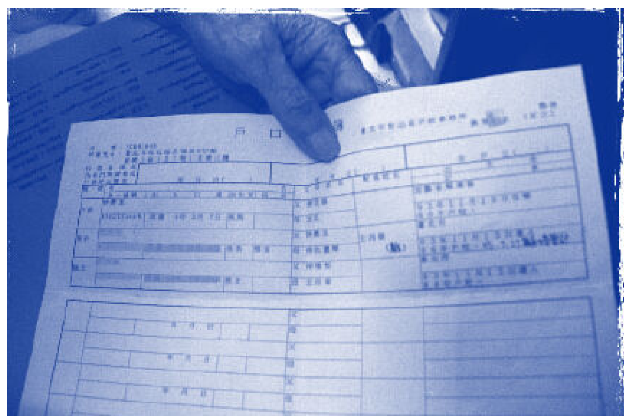
受益于军官姐夫，初中毕业捡肥差

如今，仲老同许多幸存的台湾老兵一样，拥有“荣民证”，领取“终身俸”。他说，实际上自己从未真正当过一天兵，甚至连枪都不太会使。但这不妨碍他成为数十万败退国民党军人中的一员，并由金门换防，来到台湾本岛。

“我的老家住在安徽芜湖市狮子山33号，从芜湖广益中学初中毕业后（在仲老提供的学历遗失证明资料中，尚有“会计学校高级班毕业”一项，真伪无从考证），我在家无所事事，成日游手好闲。”所幸，他有个当军官的姐夫，在姐夫的安排下，依循“圈内用德”的官场法则，被安排掌管军中要务。这也让高大帅气的仲跻玉从此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破烂不堪的“经历证明书”。



老人连户口本也拿了出来。

仲跻玉的姐夫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名叫孙正中（经笔者查询，黄埔军校第十四期，有一名叫孙正中者，时间也较吻合，可能是老人记忆有误）。“如果不是姐夫，我不会同国民党部队扯上关系，这辈子恐怕都会在老家芜湖度过。”老人毫不避讳自己的来历，对姐夫充满感激。

姐夫孙正中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担任无（无为县）当（当涂县）繁（繁昌县）警备司令部下属保安队大队长，授上校军衔。保安大队驻扎在与芜湖市隔江而望的江北无为县凤凰颈（地名）。保安队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的职责是维护地方的社会治安，但不是警察，是独立的准军事部队。队员也穿制服，但不用上前线打仗，日常归宪兵队监管。

乱世之秋，部队更乱。“保安队大队长是我姐夫，他任命谁就凭他一句话。我初中毕业无所事事，被姐夫一声令下招到保安队当差，先是在

特务营担任准尉， 随后调任警备司令部任少尉军需，主管财务及物资供应，后升任为中尉军需。我的任务属于后勤保障性质，负责粮饷调拨。”明眼人都知道，这个位置上必须是“自己人”。负责掌管保安队的钱和粮，自然油水充足，日子过得潇洒快活。

生死大逃亡，被解放军追至厦门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日本人已投降，可太平日子没过上几天，国共内战就又开打了，国民党军队转眼被打得东逃西窜。随着前线战事日益吃紧，为了补充兵员，地方保安队也被整编到国军第74军。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74军。该部队曾是一支颇富威名的抗日队伍，曾在正面战场上同日军作战屡获殊荣，被誉为“抗日铁军”。1946年该军被整编为74师， 在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时，则如日薄西山。1947年5月，整编74师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于山东孟良崮，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均被击毙，所率2万余人被全歼。随后，以留守人员及残余干部为班底再次恢复建制，编成74军，由原整编74师副师长邱唯达中将任军长，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陈官庄再遭覆灭。其后， 74军三度重建，由劳冠英任军长。仲跻玉所在保安团被编入的，应属此时期的74 军。该军在后来的厦门战役中，终被解放军消灭殆尽。

据仲跻玉回忆，保安大队被编入74军的第13纵队。从此，这支地方准军事武装，摇身一变成了正规军，并随74军转战杭州、金华、南溪一线。

这段历史并不遥远，教科书上写得清楚明白。1949年初，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但缓兵之计终究未能阻挡解放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长江天险很快失守， 蒋军全面溃退。仲跻玉所在的74军，也从此开始了大逃亡的日子。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部队奉命开拔，从杭州一路往南逃命。“浩浩荡荡三个师，与军部一起转移。”但是，这支杂牌军装备差，又缺乏交通工具，完全靠两条腿逃命。一路狂奔了20多天，几至溃不成军。

仲跻玉印象中的解放军则个个都是玩命的角色：“共军每人身上交叉挂了两个粟米布袋，外加一个水壶。他们的行动非常迅速，随身带着轻武器，每到露营地，立即开始将包谷去壳，同时一边架电话，一边生火

做饭。”

蒋军被追得无路可逃。“遇到急行军时，虽然两军相距很近，但双方交火很少，甚至还能隔山谷喊话应答。”仲跻玉感叹，“共军惯于运动战，经常边走边吃饭，非常能吃苦，机动性很强。国军兵败如山倒，哪里有还手之力！”

在仲跻玉的记忆中，解放军下江南后，两军基本没有正面交锋。当时，从上海、杭州一路南逃的，除野战军外还有宪兵和流亡学生随行，共有几万人，浩浩荡荡向南方开拔。“我姐夫担任上校团长，大小还是个官，但也需要徒步逃命。”

最艰难的一段行军路程是进入福建后。部队进入崇山峻岭中，山高路险，行走十分困难。一路犹如惊弓之鸟，睡觉时都要睁一只眼，提防共军游击队放冷枪。几万人马一路奔逃到泉州一带时，才稍稍喘息。

“部队进入福建不久，我同一名战友在圩埂上行走，两人刚好拉开一小段距离，正在说话时，忽然‘砰’的一声冷枪，回头一看，不好！同行的战友已仆倒在地，随即滚落田埂下……”仲老迄今仍心有余悸地说，他再也没有爬起来，甚至没人去收尸。战争是多么血腥，在战场上，生命变得微不足道。“死个人很正常，看得麻木了，连眼泪都不会淌一滴，大不了挖个坑埋掉就算过去了。”

部队吃饭，开始还能正常，后来被追得急了，无法埋锅做饭，只能啃冷饭团充饥。行军途中，一路都有人“掉队”。在一次露营后，曾有几十名军人留了下来。当时，逃亡的部队暗地里传着一句话，叫“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这几十个人就是“去找毛泽东”了。

金门之战，开始时以为末日临头

去金门之前，部队由福州经马尾再到厦门，在厦门进行整编。仲跻玉被编入军官团。没多久，听说共产党很快就要攻打厦门，上峰要求赶快离开。

部队在炮火来临前，急速撤退到金门。“15艘美制204登陆艇日夜往来不停，装载数万人撤退到金门避战。”

当时的金门，老百姓非常贫困，家里的粮食就是用陶缸装的地瓜

（山芋）和花生等。仲跻玉依然担任军需主任，手下有9名军需员。“那时，金圆券和银元都不值钱，部队发的薪饷是袁大头，当兵的每月5块，当官的每月8块。”

在仲跻玉看来，古宁头战役（即金门战役）解放军失利，可能是情报失准。他们不知道国民党军队5万多人已集结金门。解放军乘木船利用涨潮之际偷袭金门成功，可是天亮后，海水退潮，船只搁浅在沙滩上，被国民党飞机全部炸毁。共军没有了渡船，无法增援，成了一支孤军。仲老说，共军分批抢滩，有1万人登陆，偷袭是成功的。

1949年10月25日，约在凌晨2点多钟，“我听到海边有部队吹号声，同时， 枪炮声连天响，天空被战火烧亮。我们不知道共军有多少人在登陆，所以非常紧张，以为是末日临头了。”



台北文史馆陈列的“金门纪念”炮弹弹头。

危急时刻，金门防卫司令部下令将弹药库全部打开，供人随时去取枪支弹药。“可是，我是保安团出身，又是管后勤的，连枪都不会使，拿了枪也没什么用。周围都是同我一样的人，大家只能心思重重地瞪眼干着急……”

战斗结束后，来自台湾的“黑寡妇”运输机飞临金门，从空中丢下猪肉和牛肉罐头，犒劳守备将士。军官团因非战斗部队，在金门没待多久，即再次乘坐204艇离开，由基隆港登陆前往台中驻扎。“凡参战者人人都领到一笔可观的赏金。”

来到台湾不久，仲跻玉就离开了军界。

师长夫人成全，台湾再组家庭

仲跻玉离开大陆时，已经结婚。当时，大女儿还在娘胎里，已有6个月大。在台湾，他满心等待“反攻大陆”，可等了两年还没有动静，只得开始新的人生

规划。

回忆起往事，老人陷入沉思：“她是一位流亡学生，扬州人，在人群中显得特别漂亮，同我结婚时她才19岁。”

因为有当官的姐夫“罩着”，仲跻玉在台湾的日子一点都不苦。当时，部队在台北市郊的永和成立一个福利委员会，仲跻玉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交际科科长。他虽出生在江南水乡，却有一米八几的个头，配上高挺的鼻梁，周正的五官，显得格外英俊潇洒。仲跻玉同师长太太混得很熟，并深得其好感。

一次，他趁师长太太高兴时说，因工作需要，请求配发一辆脚踏车、一支手枪，外加一个随扈卫兵。在师长太太的枕边风作用下，仲跻玉如愿以偿。“当时，脚踏车可是一个既时髦又昂贵的家伙。英国造的海格力斯牌脚踏车，一辆车价值一两黄金。”有了这身行头，27岁的仲跻玉春风得意，办起事来简直无往而不胜。

今天的台北近郊永和市中正桥一带，当年居住了许多来自大陆的流亡学生，总共有数千人。在台湾孤岛上，有这么一个美女如云的佳处，自然吸引了“党国精英”们的目光。

每当周末黄昏之际，生性爱玩的仲跻玉便来到淡水河边的桥头逛荡。薄暮时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口琴，面朝夕阳余晖下的缓流吹响，《何日君再来》、《夜上海》等婉约浪漫的歌曲，伴随晚风在淡水河畔幽幽地飘散开来。帅哥仲跻玉的举止，磁石般吸引了过往女孩们倾慕的目光……

仲跻玉的举动没能逃过师长太太的眼睛。终于有一天，精明过人的师长太太将他喊到面前，半开玩笑地说：“仲科长，你觉得这里的哪个女孩子漂亮？看中了谁就跟我说一声。”仲跻玉知道瞒不过她，却半真半假

地来了这么一句：“我在大陆已有家室，现在只是打发寂寞而已，正等待反攻大陆回家团聚呢。”师长太太听罢哈哈一笑：“什么‘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那是糊弄人的，做梦去吧！”如此放言，在戒严时期若被安上“造谣惑众，动摇军心”的罪名，会掉脑袋的。所以虽是半开玩笑，仲跻玉听了还是惊出一身冷汗。

“其实，师长太太真的对我很好，她是有意成全我，希望我不要被当局一时的宣传所蛊惑，白白耽误了青春年华。”从此，仲跻玉便留心观察，终于相中了一位意中人。“她姓仇，皮肤白净、脸蛋动人，是个扬州美女，我一眼就看中了她！”

“她除了美貌还做得一手好菜，能娶她为妻是我的福分。”仲跻玉对新太太宠爱有加。结婚后的几年里，她先后为他生了一儿三女。从此，仲跻玉过起了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

歌舞厅被查封，“下海”首遭败绩

局势趋稳，姐夫手头也有了点钱，基于对国民党军队及时局看得很透，姐夫建议仲跻玉趁早脱离军职，进入商界。而他自己继续留在部队，以便暗中相挺。仲跻玉听从姐夫的话，编个理由借机脱下制服，成为台湾老兵中最早“下海”者之一。当时，无正当理由很难脱离军职，究竟以何种理由离开部队，仲老没有明说。

经过一番准备，台北市中华路上一家名为“至美楼”的酒楼隆重开业。“当时，位于台北西城区的中华路及西门町一带治安环境最乱了，但也是声色场所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开酒楼，选址没错，但若无相当的后台，则一天也开不下去。”

至美楼一开张生意就火爆，许多老台北们至今都还记得这家酒楼的名字。酒楼的后台老板其实就是仲跻玉的姐夫，仲跻玉还是做老行当，当会计掌管财务，另雇了两位出纳。酒楼有80多名员工，在当时的台北市，规模已是相当可观了。

老婆一心一意做全职太太，丈夫开酒楼挣钱养家，这在当年的老兵群体中已是凤毛麟角。“当年我的心太大了，总想扩大经营范围，结果适得其反。”

仲跻玉将临街的两层楼全部租了下来。一楼开咖啡馆，二楼开酒

馆，地下室则是歌舞厅。他总结说，其实仅开一个酒楼就够了，可人心不足蛇吞象，总希望做强做大，搞成吃喝玩乐一条龙，最终成了一只“出头鸟”。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歌舞厅在台北刚刚兴起，是一个暴利行业。一小杯洋酒要卖10块新台币，简直是天价。”开歌舞厅确实挣钱容易，且时常有军政要员出入。可好景不长，因为树大招风，很快就被当局盯上了。那年头，两岸剑拔弩张，台湾实行“戒严”，陈诚任“行政院长”后，对台湾实行更加严格的管制。他认为歌舞厅属于声色场所，一旦形成气候，会影响社会风气，最终会瓦解部队的斗志。主管部门觉得台北市先前已有了三家舞厅，不能再开了。仲跻玉开的歌舞厅，可谓生不逢时。“辖区派出所得到上峰暗示后打着各种旗号三天两头来查，客人哪敢上门。派出所每查一次，就要打点一次，可事后他们还是照样上

报。”

架不住派出所的骚扰，闹到最后，不仅歌舞厅被关掉，连酒店和咖啡馆也一并被查封。“歌舞厅装潢是花了大价钱的啊，忽然关门，变得一钱不值，要安顿员工，处理各种事务，连先前赚的钱都搭进去了。”仲跻玉说，老婆没工作，自己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一时天昏地暗，不知如何走下一步路。

“装甲司令”徐庭瑶相助，再入伍任“特务长”

生意做不成了，可是，变卖资产，清盘结算后个人还是分得了一笔钱。

仲跻玉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待在部队安稳，起码衣食无忧。于是，他又开始打部队的主意了。“那时，国民党军队管理非常松懈，只要有门道，进进出出都不是难事。”仲老说，在军队里很讲究老乡关系，攀上官阶高的老乡，办事往往就凭长官一句话。这回，他傍上了一位在部队地位显赫的老乡徐庭瑶。

徐庭瑶，何许人也？他籍贯安徽无为，是国民党嫡系高级将领，号称“国军装甲兵之父”。在军中徐庭瑶的名声并不太响亮，虽然他曾经带出了包括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廖耀湘等一批勇猛将士。徐庭瑶早年在芜湖皖江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国民党军队历来讲究出身门第，派系严重。徐庭瑶因工作严谨、作战勇猛而一路升迁，并很快得到蒋介石的赏识。1938年，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随后番号改为第五军，隶属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升任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国民党所谓的五大主力之一。抗战期间曾屡创日军，成为蒋介石所倚重的嫡系。1948年，徐庭瑶任陆军总装甲兵司令，1949年随蒋逃往台湾。1974年，徐庭瑶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无为县，与芜湖市隔长江相望，同属皖中之域。仲跻玉姐夫所率的保安团曾驻扎在无为。因此，按中国人人际交往的某种潜规则，这便有了一种亲近的渊源。这位“装甲兵团司令”看到这位外形俊朗、举止不凡的小老乡，留下良好印象，认为党国需要这样的人才。又经过几次接触，徐庭瑶答应为其恢复军籍。就这样，仲跻玉又顺利回到了军界。

入军籍需要填表。离开部队前，仲跻玉好歹是个官，浪子回头金不换，总不能从大头兵当起吧？为人慷慨厚道的徐庭瑶沉吟半响：“先填个‘特务长’吧， 其他事以后再说。”在军中，这个职务无“星”，省去了许多麻烦，但听起来又像个官，面子上过得去。

就这样，像进出菜园门似的方便，曾经在社会上浪荡了好几年的仲跻玉又溜回部队，成为一名特务长。仲跻玉在部队里又混了四五年。

精明头脑帮他觅得新财路

经过一系列的国际事件和两岸攻防，台海局势渐趋稳定。曾经在社会上“混”过的人，经历了灯红酒绿，再回到部队便难以按捺一颗浮躁的心。最终，仲跻玉还是离开了部队。离开部队前，脑瓜精明的他“骑马找马”，找好了退路：与人合伙开店。

这次，有过经商经验和失败教训的他不再冒失。他选择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闹市区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烧腊店。他分析市场，台湾外省人中广东人喜欢吃烧腊，而这样的特色店台北并不多。果然，烧腊店开张以后，立马受到欢迎，生意相当火爆。仲跻玉家的日子又开始滋润起来。

天生的经商头脑，让仲跻玉如鱼得水。酷爱打篮球的他，每天下午，安排

好店里的生意，都要约几个人到篮球场打一场篮球。摆脱了部队的束缚，又有钱

赚，仲跻玉的日子过得很惬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一天天长大了，太太也走出家门，参与经营。供货商

也是一位朋友，他很够意思，进货时，无需先付钱，等卖完了才去结账。容貌清

秀、性格温和的仲夫人很结人缘，将无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这样，夫妻两人都有一份事业，依照分工各忙自己的事务，家庭经济建设迈

上了快车道。

光阴荏苒，仿佛在转眼间，时间已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家庭和社会都

在变化，两岸关系也终于迎来新曙光。

两岸融冰，暮年再续少时缘

离家40年，第一次回到芜湖老家探亲那年，仲跻玉年已61岁。台湾老兵返乡，按规定大陆家人要到派出所登记。消息因此传开，统战部门的领导特登门找到他，对他嘘寒问暖，并设宴款待。

在家乡芜湖逗留期间，有关领导请仲跻玉到位于长江边的经济开发区参观，向他介绍家乡的城市规划和经济发展形势，希望他能发挥余热，组织台商来家乡投资兴业。“参观时，有多位记者随行采访，三个镜头对着我，希望能说几句。”仲老说，几十年没有回家，这回切实感受到了家乡人的热情和发展经济的渴望，一时间，心里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客套话。”

令仲跻玉没想到的是，尽管时隔几十年，大陆的女儿早已成家，可第一任妻子对自己依旧一往情深！

不少台湾老兵都有过这样的尴尬：同时拥有两个“合法”妻子，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不过，仲跻玉遇到的尴尬没有持续太久，原因是台湾的爱妻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征得子女同意后，他将大陆原配妻子

接到台湾，老夫妻得以再续前缘。在台北的子女非常体谅父亲，也很快接纳了大陆来的“大妈”。二女儿仲伟玲说，16年前，大妈来台，让父亲在情感上有了依靠。少年夫妻老来伴，两位老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年岁总是残酷无情，算起来，“大妈”过世也已经有11年了。



“这是大陆女儿的照片。”

如今，87岁的仲跻玉同儿子住在一起。老人身体硬朗，但眼睛和耳朵不太好使。由于儿子长期在大陆做生意，实际上，他是同孙女住在一起。不过，二女儿住在同一个小区，她随时会过来照料父亲。

仲老快人快语，对一切都看得很开。儿子长期在大陆奔忙，平时很少归家，其实一个人的时候也很孤单。他说，现在我还能走动，等走动不了时，干脆住到“荣民之家”（专为老兵而设的养老院）算了，那里有许多老人，免费居住。如今，自己每个月还可以拿到1万多元新台币的老兵“终身俸”，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仲老说，大陆芜湖的女儿今年已61岁，她多次希望让我到芜湖去居住，并服侍我到老。“现在大陆的经济发展起来了，生活条件不比台湾差，但我已习惯台北的环境。”他开玩笑说，再过20年，大陆经济一定会超过美国，到那时，大陆小伙子娶台湾媳妇就很容易了。

老人向我一一介绍自己的家庭成员。大女儿在台北内湖区一家医院做护士，现已退休；二女婿是上校军衔退休，家庭生活殷实；小女儿在交通裁决所工作，工作和生活都很稳定。唯独儿子长期在大陆做生意，很少回台湾，不知道他的事业发展得怎样。

现在，陪伴父亲最多的是二女儿仲伟玲。她说，父亲年轻时高大帅气，记得上中学时，每次他到学校来送雨伞什么的，总能引起同学们的一片惊叹声：“你爸太帅了！看起来像是外国人！”回忆父亲年轻时的模样，仲伟玲迄今还充满自豪。

老人喜欢热闹，平时爱交朋结友，邻里关系十分融洽。他说，早些年全台湾的安徽芜湖老乡就有200多人，其中，在台北市及台北县的有80多人，现在台北只剩下约30人了。原本老乡每年要聚会一次，地点也固定在台北东门市场的银翼餐厅。“现在，老乡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许多人都已经走了。”

……

暮色中匆匆告别老人，我又要忙碌于其他的工作了。仲跻玉是一位个性独特的台湾老兵，他是来台数十万老兵中的一个缩影。采访一百个老兵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故事，仲跻玉的故事似乎不像其他老兵那么悲催，但足以令人浮想联蹁。

后续——

我以为在台北驻点的短短时间内，不大可能再访仲老了。可仅隔两天，我就接到了老人自己打来的电话。那天上午正好是周末，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吧？”

我说：“怎么不记得，两天前见过您。”老人听了很高兴，他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原来，昨天晚上他在家看电视，有新闻说西门町附近一家酒店失火。他非常担心是不是我入住的酒店，会不会有安全问题。听罢，我心头一热：原来仲老还惦记着我！

老人在电话里说：“今天是周末，你到我这边来吃饭吧，你不是想采访老兵吗？我替你约了几位，空军的。”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刻答应：“好，我现在就过来！”



仲跻玉当年所在的“军官团”同仁及家眷合影。摄于1988年。

到了楼下，按响门铃，老人很快应声。他说，你别上来了，我立刻就下去。待其下得楼来，我发现老人背在身后的手里竟握着一瓶茅台酒！他说，这是大陆客人送的，放了好多年了，今天，我们将它喝了。

原来，今天是空军眷村的几位老朋友请他小酌，他希望对我的采访有所帮助，就又将我喊来一起参加。见了面才知道，他们是仲老的一群忘年交，属于眷村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曾是两岸名人林毅夫的战友。当然，他们不属于采访计划之列了，但道出许多趣闻秘事，极大丰富了我的见闻，也算是意外收获。

“古宁头幸存者”陈书言：金门那湾海水哟，挡了我大辈子的路



很想到金门看看。那里，无数人的血与泪曾为之抛洒，生与死、光耀与羞辱都曾在那里凝结……

那天，我从澎湖转飞金门，终于踏上了被国民党军队标榜了几十年的“古宁头大捷”纪念地。

当地朋友驱车带我前往。在一处残垣断壁前，朋友停下车。这里并非风景名胜，因此游客寥寥。那会儿，我是这里唯一的外来参观者，一名来自大陆的过客。这里是解放军登陆后建立的一处临时指挥所，现在成了战争纪念地。

抚摸残存的建筑物外墙，看完碑文记录，令人心情抑郁。

墙上的累累弹孔，像一双双永难合闭的眼睛，它是在昭告世人：60多年前的那场血战，后人切莫早早忘记！这是一处村庄，解放军的临时指挥所就位于村口的这栋建筑内。笔墨鲜活的门联、随意摆放的摩托车等，显示村里还住了人。不过，住客稀疏寥落。路边的麻黄树已高过屋顶，海风吹过，掀动树枝摇曳，低矮的渔村分外宁静。

古宁头之战，大陆称之为金门战役，以近万名解放军全军覆没告终。现在， 台海风平浪静，尘封的历史在慢慢掀开，鲜为人知的细节也逐一披露出来。人们已不再讳言胜败，更多的是反思战争之外的因果之数。

在我此次随机采访的10多位台湾老兵中，有半数是通过金门来台，他们见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见本书相关章节）。

金门之行，其实，还与一张私家纪录光盘有关。它保存了一位古宁头之战解放军幸存者的口述历史。我分明看到了一个被压抑、扭曲的灵魂，及其惨淡无光的人生遭际。因此，赴古宁头凭吊，心情颇复杂。

回到台北后，我辗转联系，终于找到纪录片的拍摄者。她叫陈心怡，也正是那位古宁头战役解放军幸存者的女儿。

一个周末的夜晚，在台北市西门町附近一家星巴克咖啡馆内，我们有了一次长谈。我很想前往拜会老人，可陈心怡说，父亲永远不会告诉外人隐藏数十年的秘密，也不会面见陌生人。“他老了，病魔缠身，去年又摔断了腿，现在他的体重仅48公斤——父亲的故事，他不会再讲了，就由我来转述吧。”



笔者所摄的一片金门海滩。

发现父亲死守数十年的秘密

陈心怡从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知道有几个伯伯是父亲的密友。

他们经常在一起喝闷酒。有时候是他们到自己的家里来，有时父亲也会到他们的家里去。逢年过节，或家里有大事情，也会相互商量。这几个伯伯是父亲的生死至交，无话不谈。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因何结交。他们都是来自大陆的国民党老兵，来自五湖四海。在陈心怡的记忆中，他们的家境都不太好，也并不快乐。其中，有两位在台湾一直都没有成家。

有位祖籍山东的伯伯，到老孤身一人，1987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他立马回到大陆，从此定居在家乡，再也没有回来。扎根台湾的几位老伯伯，也陆续离世，迄今活着的仅有三位。因年事太高，老人之间走动得越来越少。在父亲的要求下，陈心怡偶尔也会陪同他去看望另两位老伯。尽管都在台湾，老人相见已是见一次少一次。

直到最近两年，陈心怡才破译了父亲心里的密码，也因此知道，这几位老伯心中压着同样的心思。

“他们永远不会对人讲自己的这段经历，包括自己的家人。”陈心怡说，自己曾尝试过聊一聊，但失败了。这些老伯的心扉，永远也不会打开了。不仅对外人，对自家的妻儿也一样。他们的妻小只知道丈夫或父亲曾是国民党老兵，来自大陆，压根儿就不知道父亲曾有过这一段难以启齿的经历——他们正是台湾教科书上所称的“古宁头大捷”的战俘。

一段行将湮没的历史，一个活的化石，因为一位女孩的努力而留下了一段珍贵记录。陈心怡说，自己也是最近才偶然打开了父亲的心扉。

有两件事触发了陈心怡的好奇心。

2002年，她陪父亲到大陆探亲。此前，父亲已经两次回乡探亲，但都是独来独往。这一次，他带上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那一年，陈书言72岁，女儿陈心怡27。

正是这一次探亲之旅，让女儿陈心怡了解到父亲过去的蛛丝马迹。

在江苏兴化老家，父亲和他的外甥，也就是陈心怡的表哥坐在一

起，爷俩一边喝酒，一边大谈解放军如何神勇，国民党军队如何溃不成军等等。言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父亲立刻眉飞色舞起来。说到解放军，父亲完全是一派“自家人”口气。

陈心怡在旁边听着观察着，感到十分纳闷。她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一定隐瞒了什么秘密。因为，在台湾时他总是沉默寡言，而现在他仿佛像换了个人一样。

回到台湾后，陈心怡趁父亲心情开朗时，试探着问：“你难道是共产党的人？”父亲这回终于响亮回答女儿：“是！”

这让陈心怡心底荡起一丝涟漪。原来父亲这么多年隐藏了这么一个惊天秘密。她觉得父亲这辈子不简单，可再追问下去，父亲就开始闪烁其词了。

时间飞逝，转眼间6年过去。2008年，台湾全面实施旧城改造，根据规划，残存宝岛各地的眷村（军眷居住区）将被陆续拆除。为了抢救历史记忆，民间公益组织“外省台湾人协会”推出一项纪录片拍摄计划。他们召集眷村子弟，培训用DV摄像机录下父辈的故事。

陈心怡自小并不住在眷村，因为父亲退伍后才成家，即便在军中，也因军阶太低，眷属没资格入住。父亲是一个正牌的外省老兵没错，于是，她报名参加，希望借助这个拍摄计划，在父亲尚能自如表达的有生之年，说出心底的秘密。

从2008年3月起，陈心怡一边参加培训，一边开始了对父亲的拍摄。未曾想，此举竟获得意外的收获。坚持拍摄了5个月，终于打开了父亲的心锁，并记录下一个个自己都觉得难堪的镜头。如，老迈的父亲去菜市场讨价还价，及颤抖着双手买青草茶喝的镜头；母亲节当天，父亲一怒扔戒指，并破口大骂；以及在自己追问下，老人欲说还休的窘境等等。最后，在弟弟的陪同下，她带着父亲重回了一趟金门，并顺着当年的路径，从金门到高雄，再返回台北……

先加入新四军，再参加淮海和渡江战役

虽然自己大辈子都是当兵，可是在心灵深处，陈书言对“当兵的”历来评价不高。他说，在江苏老家，一直有“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说法。他对“当兵的”最初的印象极差。

陈书言祖籍江苏兴化，出生于1930年。在女儿的镜头前，父亲陈书言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当时，他挑了一大担小白菜上街去卖，本来可以换回240个铜板，结果在半途遇到了汪伪政权的队伍。凶神恶煞的阿兵哥喝令："快，把菜送到营房去！"少年陈书言无奈跟从。到了营房卸下小白菜，阿兵哥非但不给钱，还试图将他扣下来当兵。

收起菜筐，陈书言准备离开，这时一名当兵的用眼神示意守卫的哨兵将他挡住。这位少年满心的憋屈终于爆发了，他狮子般咆哮道："谁敢不放我回家，等当了兵手上有了枪，我一定先干掉他！"看到面前的年轻人像一头难驯的猛兽，几位兵痞也着实吓了一跳。其中一位自找台阶下：这种人留在部队真的会动枪杀人，到时长官怪罪下来，谁也承担不起。几名大兵见对方不是个好欺负的主，就放了他一马。

在回家的路上，陈书言对天发誓："不管谁与这支队伍为敌，我都会去帮忙！"

次年，一支新四军的部队来到兴化，13岁的陈书言报名参军。当时，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他当兵的动机十分单纯，到部队可以混口饭吃，复仇的心理倒是其次。

"当时在江苏一带，有很多支部队，说句实话，真正打日本的是新四军。"陈书言对女儿说，"你们所学的教科书，都变了味，我是过来人，亲历过当时的抗战，无论在盐城、扬州还是高邮，都是新四军在抗日……"

解放战争开始后，陈书言连续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部队一路势如破竹打到福建沿海。每次作战，陈书言都属于前锋部队，屡建战功的他领了很多奖金、奖章。他多次负伤，迄今左小腿还留有伤疤，一只手指也断了一截，所幸大难不死。陈书言面对一张地图，指着江苏盐城一带对女儿说，我参加了在这里的一场战斗。当时，国民党被解放军一路追击，遇到一座木桥，国民党军队倒上煤油，一把火烧毁了。桥面虽然不宽，可没了桥只能眼睁睁看敌人跑掉。蒋军在河岸边还架了一挺机枪，隔河扫射。我立即卧倒在地，等敌人换弹匣的间隙，立即冲了出来，一连打出十多颗子弹，歼灭了敌人的火力，部队立刻跨过小河冲上去消灭了敌人。

他说，当时解放军给蒋介石起了个诨名叫"运输大队长"，意思是没

有武器，有蒋委员长提供。缴获这挺机枪后，就成了他们的重兵器。

生死搏杀后，他一口咽下了党证

时间定格在1949年10月24日的那个晚上。陈书言随部队从福建泉州石井出发，乘坐渔船借助夜幕掩护向金门方向秘密进发。这一年，陈书言19岁，已经是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解放军老战士。



这是笔者在金门海滩拍摄的一个场景。战争遗存：无数钢矛铁叉均指向大陆方向。

“渔船不大，坐满了才20来个人。”年已80的陈书言回忆说，渔船在风浪中一路颠簸，许多人都开始晕船，可接近金门海岸时，大家立刻忘了疲惫。等敌方发现时，我们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排长振臂高呼：“同志们，冲啊！冲啊！”战士们立刻跳下船，不顾一切地向海滩扑去……

回忆这段历史，陈书言迄今满怀忧愤，声音颤抖。这种痛苦和无奈折磨了他一辈子。他告诉女儿说：“跟我一起参加金门攻击战的，有一个姓袁的伯伯，他是和我一道报名参军的同村老乡，在部队我们关系十分要好，赴金门作战，两人又被安排在一个突击排。”

陈书言说，自己亲眼看到他被国民党军队的战车履带压到了沙滩里，轧成了一堆肉泥。老人哽咽着，面露悲愤、痛惜的复杂表情。“战争太残酷了，死亡瞬间就能降临。”

陈书言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袁伯伯”的妹妹闻讯赶来了，她急切

地询问哥哥的下落。“我真的不敢如实相告，担心她听到真相后会精神崩溃。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根据我的经验判断，他可能早已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解释说，“离开”一词容易让人接受，也许是摔死了，也许淹死了，也许出了交通意外死了， 这些死亡很常见，让人听了不会疯掉。



金门岛上，解放军临时指挥所。这面墙上的弹孔与射击口，像一张张永远 合不上的嘴巴，仿佛在向岁月诉说着什么……



这里，正是当年两军浴血奋战之处。

当年的金门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陈书言冲在前头。他在沙滩上奋力前进，每向前走一步，敌人就“砰砰”来两个点射，一起身必中弹无疑，他感觉不对劲，深知此时若起身前突必成活靶子。于是，他就势倒在沙滩上，并用手扒出一个小坑躺在里面。敌人以为对方已中弹身亡，于是调转枪口找其他的目标。陈书言又爬起来向前，等敌人枪响了，他又佯装倒了下去。这是一名有经验老兵的欺敌之策。陈书言说：“就这样，我活到了今天。”

古宁头一役，解放军万人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后援不继，致全军覆没。这场悲壮的登岛之战，其失败原因曾引发军史专家太多的讨论，评点成败是非不在本文之列。

在大金门的沙滩上，陈书言腰里还绑着一双布鞋，这是母亲为儿子缝制的新鞋，他一直舍不得穿，等到打仗时，才把它绑在腰上。

战斗到了第三天，经过多次冲锋和反冲锋，部队已是弹尽粮绝，眼看援兵到来无望，最后关头，陈书言将中国共产党党证嚼碎了，一口咽到了肚子里……

同其他衣衫破碎、面貌憔悴不堪的战友一道，陈书言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俘虏，从此，命运的航船漂向了另一片前途未卜的激流险滩。

噩梦，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虽然时隔60多年，陈书言对很多人和事的记忆都已模糊，可他对一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楚，那就是从金门被押往台湾基隆港的日期——1949年11月6日。

清晨，如血的太阳从海面升起，战俘们的心却沉到了海底。他们先是被人用小船分批运转到一艘大船上，大船停泊在大小金门岛之间的一片水域。战俘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搜走了，一切都被掏空了，漫漫长夜即将开始。

陈书言回忆说，在金门时已经饿了几天，到了大船上，依旧没有吃的东西， 已经饿得昏昏欲睡的战俘们，只能吃随身携带的残余生米。有一些人挺不住就饿死了，还有些人实在饿得慌，就开始抢别人身上的米袋，你争我夺之间，有人从船上掉落下来，直接跌落到船舱底部，立刻被摔死了也无人闻问。就这样，在钢铁囚笼中，战俘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路上绝望而死的人不在少数。

船抵高雄港，大船慢慢靠了岸。等待这批战争幸存者的，是生不如死的磨难。

在高雄，陈书言等被押上列车。列车的门窗早就被全部钉死，只留有一个出入口。战俘列车一路往北行驶，最终停在了新竹的湖口。陈书言和其他战俘一起被关押在临近海边的一个小学校里，进行为期一个月

的“洗脑”。

“就是讲共产党如何骗你们，教你如何痛恨共产党。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马上就没命，明天早上一准就看不到了。如何处决？大部分都是活埋（此说无从考证——笔者注），子弹要留着打‘共匪’，不能浪费在你身上。”陈书言说，当时的心情坏到极点。

沉默寡言数十年，甚至连梦话都不敢说错， 只为了死守一个秘密——自己曾是共产党员。似乎也没有人对他的过去感兴趣，谁都不去问， 他也从来不说。女儿陈心怡慢慢长大，长到30多岁，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父亲。

女儿同父亲有过这样的对话——

“你能否说一下被俘之后的情况？”陈心怡问。

“现在照样不能讲，讲了对你们不好……唉！这是机密的问题啊。”老迈的陈书言痛哭失声。

在女儿的记忆中，父亲喝了酒，经常会哭。

这批金门战役的被俘人员，接受“洗脑”教育后，被编入国民党军队，但仍遭到长期监控。

在部队里，不时有人来“套”话，问他觉得国民党如何如何一类的问题，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上面”的人还会让战俘们互相“咬”，他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旦被发现，只怕是性命难保了。

这恐怖的梦魇，一直伴随了他几十年。

依靠酒精麻醉的灵魂

“没有办法，不喝酒我没办法入睡啊。头脑好乱，想回忆过去，可总也想不起来细节，唉……”

陈心怡用手中的DV摄像机，真切地记录下父亲痛苦的内心挣扎。父亲现在每天要喝一瓶半（矿泉水瓶）容量的白酒，他以此麻醉自己，才能进入梦乡——不是现在，多年来即如此。

“很小时起，我就恨父亲。”陈心怡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常问女儿的

一句话是："我和你妈妈离婚了，你愿意跟谁？"

在陈心怡的记忆中，父亲从部队退伍后，就在一家钢铁厂上班，因为离家远，只能在周末回家。回家后就自顾自喝酒，喝完酒就骂人、摔东西，还打母亲，拿着菜刀四处追她。

每个周末家里都是吵闹声，东西被摔得乒乒乓乓乱响。年幼的陈心怡只能捂着耳朵缩在角落。邻居们探身过来问："哎，你们家又出什么事了？"她很想离家出走，可是谁能收留自己呢？

有一次，父亲在夜里喝了酒，将母亲关在了门外，一直关到午夜12点。母亲出生在台湾，她很胆小，不敢反抗，只能在外面待着。直到父亲发泄完毕，良心发现，自己将门打开，母亲这才蹑手蹑脚回家。随即赶忙收拾东倒西歪的家什， 并安顿几个孩子入睡。

出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充满硝烟味的家庭，幼年的陈心怡心里满是恐惧。等到懂事时，她开始自卑，总觉得低人一等。每次出家门，她都极力回避邻居那种怪怪的眼神，只能低着头，贴着墙根走路。

陈心怡的家位于台北市郊的台北县新庄市。那是上世纪70年代买下的多层建筑的顶楼，共30坪（每坪约3.3平方米）。当时花掉了全家的积蓄。直到现在， 除了同母异父的姐姐出嫁之外，自己、父母、弟弟，及哥嫂和3个侄女，共9口人还住在这里。因为是顶层，根据台湾法律可以加建一层。这样，一家人勉强能容身。自己和弟弟迄今都还没有成家，是名副其实的剩女剩男。

后来，父亲所在的工厂搬到外地，回家就更少了，从每个月回家两三次，再到两三个月回家一次。不同于其他同龄伙伴，陈心怡从小就不喜欢过年。因为一到春节，父亲就会回来，又该鸡犬不宁了。

似水流年，人生如戏。如今，面对老迈的父亲，陈心怡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

父亲1966年从陆军后勤部队退伍，直到1974年才结婚成家。母亲的前夫因病过世，便带了一双儿女改嫁过来，再生下了陈心怡和弟弟。

1975年，陈心怡出生时，父亲年已45岁。陈心怡说，论年纪，我都可以叫他"爷爷"了，但他却是我的亲生爸爸。

她说，作为一名外省老兵，父亲没有挑选配偶的资本，比起那些娶残疾或智障女为妻的老兵，他已算是很幸运了。

对这场婚姻的起始，父母各有说法。父亲陈书言说，是经朋友介绍才认识了太太，她是台湾本地人，带着一双儿女，看到两个孩子像洋娃娃一样可爱，当时就觉得同这样的女子成家一定会很幸福，于是同意组建家庭，谁知道生活会是这么个样子……

而母亲则说，家里人都说外省仔（来自大陆的老兵）顾家，也会疼孩子，觉得嫁给这样的人虽然穷一点，但家庭会很稳定，谁知婚后情况这么糟糕……

父亲退休后，一家人开始生活在一起。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可父亲孤僻、难以与人相处的毛病丝毫未改，他依旧我行我素。每天，他独自上市场买菜，自己煮饭炒菜。在同一间厨房，父母各忙各的，形同陌路。没有人与父亲说话，他说话最多的，是对家里的一只小鸟自言自语。

陈心怡虽然自卑，但她懂事很早，是个争气的孩子。从小她就知道，必须用功读书将来才有出路。在她小学的学籍资料上，家庭经济状况一栏填的是“清寒”二字。全班仅两三个“清寒”学生，她因此领了好多年的“清寒助学金”。

后来，要强的陈心怡顺利考上了台湾大学。台大，在台湾人心目中类似大陆的北大和清华。

念了8年政治学之后，陈心怡硕士毕业。父亲日渐老迈，家境依旧清寒，她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打拼，前面的路并不好走。

“我的骨灰宁做浮尘也不要撒到海里”

陈心怡说，19岁是父亲生命里的一个“节点”。换句话说，经历1949年金门古宁头的那场战役之后，他的人生彻底改变，性格逐渐变得阴郁孤僻。

血与火的战争，他侥幸存活，可是活着也是一种负累。在台湾漫长的岁月里，烈酒就是他最好的朋友。身为这个不幸家庭的一员，女儿陈心怡总结父亲这一生：“父亲的前半辈子，活在有战场的战争中；后半辈

子，则生活在家庭战争中。前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后面的战争，是痛苦与折磨。总之，苦难缠绕了他一辈子。”

陈书言80岁时的一天，一个人到街上买青草凉茶喝，端个纸杯，手不停地颤抖，试了几次杯子都举不到嘴边。女儿手中的DV如实记录了老人的真实状态。陈心怡坦言，如果他只是一个陌生的老人，我会心疼他，当他成为我父亲的时候，对他的恨意竟丝毫不减。“父亲和母亲组建了一个破碎的家庭，仿佛将痛苦的种子种植在全家人的心上。”

陈心怡回忆说，组织拍摄纪录片时，总共有10部片子在拍，每周，大家都会在课堂上交流拍摄进度。有位同学也拍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十分恩爱，很是感人。片子放完时，大家热烈鼓掌，交口称赞。

见此，陈心怡却悄悄哭了，她很嫉妒这个同学，他们家可以这么美好，而我呢？镜头下那些令人难堪的画面，简直是献丑。镜头将时间带到2008年母亲节。那天，一家老少坐在一起。陈书言独自坐在沙发上，他拿出一个金戒指，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今天是母亲节，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连说了好几遍，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此时，孩子们自顾玩耍，而妻子正在照顾外甥女，根本没听见他说什么。

陈书言觉得善心被误解，自己被冷落了，瞬间勃然大怒，他将戒指一把扔到了地上：“我一生没有干过一件坏事，可你们为何要这样矮化我？！”脱口而出的竟是一些不明不白的话。陈书言对妻子用的是粗话，女儿陈心怡也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用的也是不堪入耳的粗话。这一场景真切记录了这一家人反常规的家庭关系。客观说，这是一个充满病态的家庭。

2008年8月份时，纪录片拍摄要完成了，父亲陈书言突然“反悔”，他强烈要求将片子中有关“解放军”、“共产党”的那些内容删除掉。

“我现在还活着，还不能公开，公开了对我不好，对你们也不好。”陈书言说。他担心这些内容有可能会让自己再吃“牢饭”，“我老了，不想再受那种折磨”。

女儿陈心怡大声质问他：“都什么年代了，你以为现在还有人会监视你吗？”父亲的回答毫不含糊：“是！虽然看不到，但我想得到、感觉得到！”末了，他发出哀鸣般的祈求：“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没有经过那种痛苦，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陈心怡说，自己受过良好教育，一度很不明白为何父亲老是跳不出过去的阴影，总不能从精神的枷锁中解脱，现在，终于明白，当年的白色恐怖对人心灵的摧残是多么深切。“不是我父亲不肯说，所有与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在台湾依旧噤若寒蝉。”

如今金门战役已过去了60多年，台湾“解严”也已20多年，可陈书言们依旧没有走出当年的恐怖阴影。女儿陈心怡说，父亲最近经常叨念一句话：“我们本来是兄弟，是一家人，为何换上不同的制服就成了仇家，互相杀红了双眼呢？”

对陈书言来说，大陆老家已经没什么特别需要顾念的亲人了。还有一个妹妹健在，她的两个孩子分别在杭州和上海生活。由于年事已高，对大陆已故亲人的牵挂只能体现在逢年过节时，他会对列祖列宗牌位焚香祭拜，祝愿他们在天国安好，并希望庇佑后代子孙。

父女俩就老人百年之后的安排有过一番讨论。

哪怕让人当，老人对女儿说，这里很热闹，既有小孩子在玩耍，也有老人在闲聊，愿意安息在这里。“我死后就将骨灰悄悄撒在公园里，哪怕让人当成灰尘，随手掸掉，落到地上、飘到空中。这样最好，一切悄无声息。”



1976年，陈书言抱着女儿陈心怡的留影。那一刻，他脸上有了一丝快乐的神情。



1980年， 摄于台北新公园（现改名为二二八纪念公园）。陈书言掌镜，为妻子及四个孩子留影。

女儿问，可否撒到大海里？老人立刻制止：“千万不要！我这一生就是吃了海水的亏啊。没有海峡里的那湾水，我不可能到这里来，也不可能沦落到今天。”老人用一声沉重的叹息，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注解：“唉——金门的那湾海水哟，挡了我大辈子的路！”

此文收笔之际，已是2011年6月间，我离开台湾回到大陆转眼已有数月。因需要核实一些内容，我向陈心怡发去电子邮件。她回电邮说，父亲现在病情加重，正在住院，我要尽女儿的责任，每天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父亲，很累很辛苦……

陈心怡反问：“我父亲的故事，大陆还会有人关注吗？”

背景补白——

金门战役及后续

金门战役，台湾称古宁头大捷。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10月17日国民党军汤恩伯弃守厦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叶飞决定集中船只进攻大金门，由于战备不足，日期一再延后。1949年10月24日夜，解放军乘涨潮之际渡海抢滩作战。解放军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苦战三昼夜，终因后援不继宣告失利。

资料显示，解放军在金门之战中计有数千人被俘，他们的命运坎坷曲折。战斗结束后，一些原本从国民党军俘虏过去加入解放军的，特别

是进入福建之后被俘虏的，再次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后，立即被补入金门守军，其他俘虏则被运抵台湾，在内湖“新生营”集中关押。军官及“共产党死硬分子”被立刻处决，其他人则被反复“洗脑”。1950年7月起，国民党方面将战俘中年龄较大、伤残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分批遣返，先后于7月、10月和11月遣返三批，约600人。其余战俘则留在了台湾……

“老宪兵”刘志衷：初次远行南京，夜半偷米上竹排



来宝岛之前，曾通过朋友关系获得几个台湾老兵的联络电话和住址信息。经过核对发现，这份地址早已过时，至少是10多年前留下。许多老兵早已不在人世，其住址也多半难以寻觅——道路改造已经面目全非，城市变迁今非昔比。

一个周末，我手拿这份错漏百出的地址，居然靠撞大运找到其中的一位老兵。他叫刘志衷（原名刘烈如），生于1929年，安徽枞阳县（原属桐城县）汤沟镇陈家洲人。

地址过时，上门寻访遭碰壁

周末时间宽松，我下定决心按图索骥，去寻找这几位素未谋面的老兵。台湾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先前已领教过，即使警方帮助你找到了，他们也不会单方面告诉你任何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所以，如有可能，最好的办法是直接登门拜访。

上午10点多钟，我背上采访包，由台北捷运（地铁）西门站上车，到忠孝新生站下，再步行转入建国路。就在这同一条路上，即有两位老兵的住址。我决定先拜访其中一位住在建国北路一段67巷的张姓老兵。

正值当午，烈日如火，耳边伴随的是摩托车的阵阵轰鸣，我沿辅道边走边观望。很快衣衫就湿透了，裸露的双臂更是有一种火辣辣被炙烤

的感觉——这就是秋天台北户外的感受。头顶烈日没关系，可烦人的是转来转去怎就找不见那个门牌号呢？

忽然，我看到路边一位绿衣邮差正往邮箱里塞邮件。我急忙走过去将写有地址及门牌号的纸条拿出来向他打听。他看了一眼就连连摇头："这个地址早就不存在了，那个地段拆掉修了公路。我一直负责这个片区投递，不会有错。"邮差同我攀谈了几句，他说，以前这里是一个老旧的眷村小区，多年前就已经改造了，原先的平房都被推平了，现在的高层住宅是后来建设的，原先的门牌号已经废弃了。

是否回迁了？或搬到了另处？无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再拿出位于建国南路三段某巷的另一个老兵住址请教邮差，他端详了一阵说："建国南路倒是有这个巷号，可那里仅有二段，哪来的'建国南路三段'呢？"

怎么会是这样呢，按址找人竟这么困难！我一时对寻访老兵的行动完全失去了兴致。

误撞误中，竟找到老兵的家

在台湾、尤其是台北，向谁问路，都会得到礼貌的回应，有时会热情得让你都不过意，这我已有多次亲身体会。得知我从大陆深圳来时，这位邮差更是眼睛一亮："我老爸就是广州人啊！1949年来的台湾……"他急得团团转，看起来比我还急："建国路很长哦，步行很辛苦的，找不到人你怎么回去交差呢？"

我心想，这倒无所谓，探访老兵没有谁安排我去做，也非受人之托，这只是我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而已。告别这位热情的邮差，虽然唇焦舌燥，手里拿着个分明早已失效的地址，心里开始打退堂鼓。可还是心有不甘：也许是哪个环节出错，会不会是地址提供者一时笔误，将"二"写成了"三"呢？我的犟劲上来了，决心找寻到底。

现在是反向往南前行，横穿几条道路，再路过一个公园，咬紧牙关继续寻找。终于，走近了地址上的街巷编号。我走向巷口的一处值班岗亭，值守的是一张老年面孔。我递上了写有地址的纸条。他说："对呀，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巷号，这条巷子就归我看管喔。"可是，当他端详"建国南路三段"、"二楼"字样时却疑惑了："你这不对呀，这里是二段，建国南路根本没有三段啊。即便是二段的这个街巷，可你这上面只说是某巷二楼，具体是哪一栋的呢？你这地址太不准确。"

一看，还真是。这叫什么地址！

“既然找来了，能否让我去随机按几栋房子的二楼门铃试试运气呢？”说完这话我自己都觉得愚不可及，这么长一个巷子，那么多房子不是大海捞针吗？可满脸友善的老年门卫竟一口允诺:“从大陆跑这么远的路过来，多不容易啊，你就去试试看吧。”

当着门卫的面，我决定从最近处的一栋楼着手。这是一梯两户的多层建筑，门铃按钮分两排布局，上面写有序号。先按了二楼左侧的门铃，可无人应答。稍后又按响了另一个写着“2”字的门铃。短暂等待，居然有了应答声。我开门见山：“请问这里是刘志衷先生的家吗？”“是，谁来找他？”一位女性的声音。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是对方没听清，又重复一遍，再次得到肯定答复。同时，防盗大门“哒”的一声已经打开。我立即推开进去。

上到二楼，一男一女两位老人已经打开了防盗铁门，正探出头来张望，两人都满脸疑惑地望着我。我说：“很冒昧，我从大陆来的，现在台北驻点采访，请问刘志衷老人住这吗？”并附一句：“他老家在安徽。”

两位老人稍微迟疑后，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我终于首次走进一名台湾老兵的家。

安庆当上青年军，无锡考入宪兵队

简短寒暄并说明原委后，两位老人都非常惊讶。直呼：“你能找到我家，这真的很不容易啊！”

刘志衷老人说，我是他来台湾60多年来，在家里接待的第一个大陆访客。随后，老人从书房里翻出一堆珍藏了数十年的老相簿、老纪念册、老信件和个人证章等等，并用一口安庆乡音同我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连一直抱怨他“过度顾念大陆老家后辈”的老伴都说，看来你们真是投缘，他本来下午不在家的，也很少这么激动过……

“我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离家当兵的，那时，社会极不安定，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精神爽朗、嗓音洪亮的刘老先生同我侃侃而谈。他说他当时才十几岁，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安庆报名参加了青年军，后来“跳槽”加入宪兵部队。“那时，当宪兵需要通过文化考核，可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根本不够条件，但我的国文底子好，通过撰写一篇自

传，得到了主考官的赏识，才顺利进入了宪兵部队。后来又通过艰苦学习，在台湾上了军校取得了文凭，32岁才拿到同等学力证书，人家20多岁就当少尉，我40岁才当上连长。”

刘志衷共有4兄弟和1个妹妹，大哥在原桐城县经过考试当上了保长，他在家排行老二，大弟就读枞阳师范，小弟没有读书，在家务农。按照农村人的习惯， 几兄弟必须分散各找出路，但也必须有人留在父母身边，尽孝道并守住祖业。按照父亲的计划，两个儿子已经离开了村庄，老四太老实，又没有念过书，所以，体质较弱但略通文墨的老二必须留下来协助老四继承家业。

刘志衷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天性不安分的他不想守着祖上的一亩三分地度过一辈子。17岁时，他就曾随舅舅由安庆顺江而下，到南京去卖柴禾。为了实现自己的初次远行计划，他瞒着父亲及家人，不惜从家里偷米上路。没有米袋，他用细绳子将长裤管扎紧，再将大米灌进去。半夜时分，他随舅舅一道悄悄坐上运送柴禾的竹排。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安庆是省城，自然同乡村情形大相径庭。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市井，喧闹的人群，这些让刘志衷看得目瞪口呆。第一次见了大世面，从此，他再也不能安心于单调、贫乏的乡村生活。他下定决心要离开家乡到外面闯荡一番。



劉志衷
安徽桐城
總統 蔣中正
憲兵司令 王永樹

刘志衷早年的证件。

1947年，刘志衷18岁。当时国共内战正酣，虽处在国统区，战火暂时没有烧到这里，可商人动辄罢市，学校也在闹学潮，城乡间地痞恶棍横行，社会动荡不安。刘志衷身体原本不好，还患有严重的痔漏症，在农村不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他渴望有机会离开家乡，摆脱艰苦的环境，并有所作为。

回想当年，老人记忆犹新：“那天，得知省城安庆市大华旅社附近设有一个募兵站，便赶忙跑去报了名。”对兵源紧缺的国民党部队来说，送上门来的壮丁，自然笑纳，刘志衷成了一名青年军。同时参军的有周边几个县的青年共1000多人。这批新兵乘船经芜湖、南京等地来到无锡，在这里接受整训学习。

在国民党部队，对宪兵要求较高，军人素质也比普通部队过硬，因此，地位在一般部队之上。在刘志衷看来，只有进入宪兵部队才有出息。可进入宪兵部队需要考试，自己初中都没毕业，凭什么报考宪兵

呢？

省城安庆历来文人辈出，周边诸县读书氛围极好，素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上过私塾、念过几年书的刘志衷国文基础甚好。于是，他手书一份自传，托熟人递到宪兵部队一位长官手里，果然受到那位长官的赞赏。刘志衷被破例录取到宪兵学校学习，经过一番刻苦努力，他如愿以偿成为宪兵部队的一员。

刘志衷被编入南京宪兵司令部教导一团。1948年8月，队伍奉命移师开拔，先是抵达上海，再乘船经海路前往台湾“轮训”。

作为一名下层士兵，刘志衷哪里知道，其实，这是蒋介石为稳定台湾，寻找退路而提前布局的一着棋。其时，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是屡战屡败，时局正发生根本性的扭转。

由上海至基隆，熬过艰难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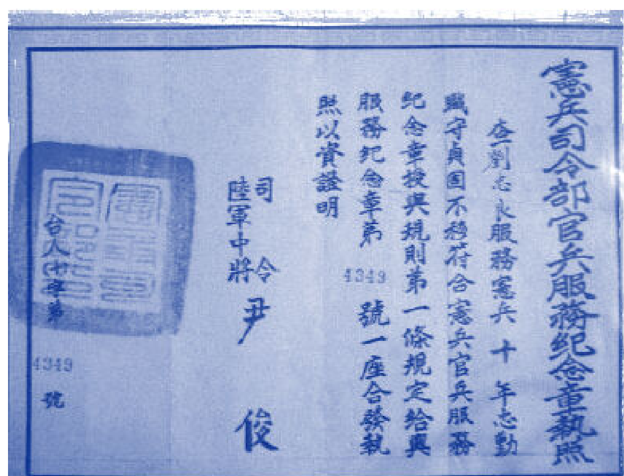
运兵船在基隆港靠岸，下船后始知条件十分艰苦，远非先前部队长官作动员时所宣传的“宝岛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应有尽有”。

登陆后，部队就近驻扎在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境内，入住一处日据时期所留下的破旧营房内。营区周围杂草丛生一片荒凉。1000多人马在这里开垦荒地，种粮种菜，并受训8个月。

开始时，这批来自大陆的军人被告知到台湾只是短暂轮训，为的是开赴福建接管防务。刘志衷及战友们满以为很快就能回到大陆，还同家乡通过几次信，告知父母说台湾这边条件尚好，生活得不错。其实，在这里是做同家乡务农差不多的营生，只是身上多了一层黄皮制服而已。



宪兵刘志衷使用过的臂章。



憲兵司令部官兵服務紀念章執照

查劉志衷服務憲兵十年忠勤職守貞固不移符合憲兵官兵服務紀念章授與規則第一條規定給與服務紀念章第4349號一座合發執照以資證明

司令 陸軍中將 尹俊

4349號

刘志衷保存的宪兵纪念章执照



刘志良（刘志衷）的军校登记照。

时间到了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随着“五大王牌”的相继覆没，蒋介石已濒临山穷水尽，只得宣布“下野”。1月5日，被蒋介石先期派到台湾“养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陈诚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为的是保住台湾这块国民党最后的据点。

陈诚先是在台湾实施“入境管制”，目的是限制共产党势力渗透。3月27日，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爆发学潮，被军警镇压，当局随即对部分高校实行军事化管制。一个月后，陈诚以台湾警备司令名义发布台湾省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此举开启了国民党对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直至38年后的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令。对刘志衷这批先行抵达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来说，意味着从此失去了同大陆的一切联系，两岸之间也因此隔海峡紧张对峙。部队没有如期调往福建驻防，而是开往台北市，番号也改为台北宪兵4团，驻守台北火车站一带。

刘志衷回忆说，小时候，在安徽老家时家庭条件很艰苦，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被大人喊起床，挎个筐子四处拣拾猪粪做农家肥。捡满了一粪

筐才能回家吃早饭。尽管60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如今仍历历在目。当兵入伍，就是为了摆脱农村的艰苦环境，过上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未曾想，虽提前移师台湾，躲开炮火连天的战争，可部队生活依然辛苦。到了台湾，竟也要从开垦荒地开始，同在老家干农活并无两样。而且，随着一拨又一拨的军政人员退往台湾，社会变得混乱不堪。刘志衷这才明白，在动荡不定的社会，当兵讨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40岁时，才混上“连级干部”

同许多国民党老兵一样，若不能考取军校，只能当一辈子大头兵，等到退役时，早已浪费了大好年华，若没有一技之长，回到社会上生存都成问题。

31岁时，刘志衷同出生在宜兰的当地刘姓女子结婚。经过一番苦读，刘志衷32岁时才拿到高中同等学力文凭，随后报考军政干校，被录取，这才有了升任军官的机会。别人20来岁就可晋升少尉，可刘志衷到40岁时才混上个连指导员，成为一名连级干部。军校毕业后，同期的同学有人30岁时即晋升为少校，可等到刘志衷晋升少校时，已经到了临近退役的年龄。这一年，42岁的刘志衷以少校军衔告别军旅。

从18岁当兵入伍到脱下军装，刘志衷已经服役24年。按照台湾的有关规定，他属于“荣民”，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助。可是，此时的刘志衷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他要养活一家人，必须重新谋生。

刘志衷本名为刘烈如，入伍后改名为刘志良，因此，包括学业证、结婚证上的姓名都是刘志良，可是到提升少校时遇到了麻烦。原因是在国民党部队系统中，少校以上的军官中已经有了名叫刘志良的人，根据国民党军队的规定，同级及以上军官不可以有同名同姓者出现。为了升任少校军官，刘烈如只得再次改名，这回他改名刘志衷，一直沿用至今。

退伍后，因为无一技之长，找工作相当困难。他只得放下军官的架子和尊严，一切从头开始。先是找了一份司机助手的工作，其实就是装卸工。搬运货物体力消耗很大，加上吃饭、休息的时间均无法保证，所以干了不到一周，刘志衷实在吃不消，只得辞工回家。

经过一番思考和准备，中年刘志衷决定再出发。他又尝试做过洗车工和加油工等等。直到最后，才找到了一份像模像样的职业：为一家工

厂担任记账组长。经过几年艰辛努力，这位退役老兵的工作态度和组织能力最终得到企业董事会的认可，随后被升任为课长、厂长。

刘志衷在厂长任上一直做到60岁。根据企业的相关规定，男性到60岁必须退休，不能再继续占住位置。退休后，勤劳惯了的刘志衷还是闲不下来，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找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做。现在，年已83岁的他依然劳作不止。他现在的工作是为人“看大门”，每天，共有3个老人轮流倒班。老年刘志衷每天都要外出，到台北市大安区龙门里社区担任值班员。在台北市和郊县拥有三处房产的他，已经是一个有产阶级，他所做的这份工作，已不再是谋生所迫，而是满足自己热爱劳作和充实晚年生活的需要。

女儿从日本寄出第一封寻亲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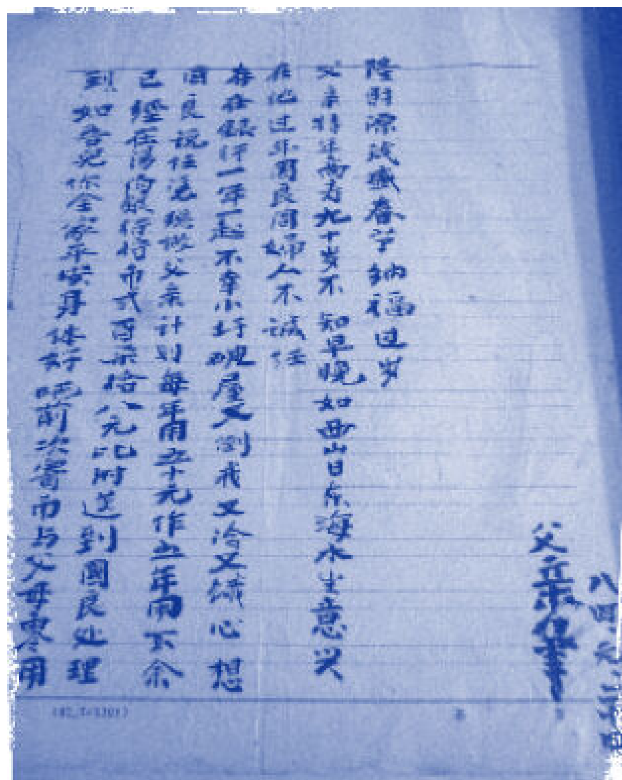
在台北市建国南路二段的家里，面对第一位登门拜访的大陆来客，刘志衷老人拿出自己珍藏的厚厚一本资料册细细向我介绍—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可两岸依然音讯隔绝，　老死不相往来。此时，虽然4个孩子一个个长大了，生活也已经好转，可远在大陆家乡的父母亲人依然杳无音讯。30多年过去，父母怎样？家人都还好吗？已到了退休年龄的刘志衷无时无刻不在惦记亲人。

1982年，大女儿宜君到日本学习。刘志衷让女儿从日本悄悄向大陆寄出第一封信。后来才知道，当年自己离开故乡时是桐城县，可解放后行政区划调整，老家所在的村镇现已划归枞阳县，行政称呼也有了变化。

尽管如此，宜君还是收到了“绕了好多圈子”的回信。

第一封家书连同信封和内页，现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见图）。收到的第一封家书是老父亲用毛笔写的，行文不长，可这是30多年后第一次看到家父的手迹。刘志衷老人说，当时同大陆联系可是有很大风险，按照戒严时期条例，“私自通匪”是要判刑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可是谁也阻断不了血脉相连的亲情啊。



刘志衷保留的父亲亲笔信。

“大陆家人因为我受了很多苦。”刘志衷决定在父母有生之年尽孝。于是，他按照每天2块钱人民币的标准，向大陆老家寄去了一笔款子，希望父母靠这笔款子可以安享晚年。可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年迈的父母被整怕了，他们不敢轻易花这笔由“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寄来的钱。直到1989年，首次到大陆老家探亲后，经刘志衷劝导，父母才敢用这笔钱。如今，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二老的画像就悬挂在客厅内，每当逢年过节或在特别的日子里，一家人会来焚香敬拜。



烈如儿

你大哥于去年年底生了重病是痛相传[illegible]症吾心很重现来字予你想方设法据些药品寄来勿误火速

你父峻山亲笔

八六.四.十六

1986年，父亲写来的一封求助信。

在客厅的中间位置，还设有一个祖宗牌位。“这是我让女儿制作的，为的是

让下一代不忘记远在大陆的祖先。逢年过节，都要拜拜。”

老人说，父母亲和大哥都已经不在了，自己也曾数次到大陆探亲，现在自己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出远门就不方便了。安徽老家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分别在枞阳县、池州市及东至县等地生活，虽都年届高龄，但家境都还不错。

“心中铁路”已贯通两岸

刘志衷老人反过来向我求证：“国民党老兵都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当年国家动乱不堪，想吃一口安稳饭很难。据说美国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吃不好饭，现在大陆有13亿人口，是靠什么来养活的呢？”

老人是对大陆的经济发展现状感到难以置信。他十分惊奇：共产党要在大陆养活这么多人口都很困难，是什么魔法让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呢？这位国民党老宪兵发出感叹："共产党还真是了不起！"

聊到两岸交往，刘志衷老人起身走到挂在客厅墙上的一幅中国地图前。

"这是我让儿子特地从香港买回来的中国地图。"当听到有报道说，大陆正在规划一条从北京连接台湾的铁路时，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中国人有这样的财力和水平吗？"

顺着老人的手指，我惊讶地看到一条穿越台湾海峡的铁路动脉非常醒目地标注在地图上。在这幅中国地图上，一条用红、蓝等不同颜色图钉做的标记，由北及南、跨过台湾海峡，将北京与台北紧紧"连接"在了一起。老人好奇地问我："这条铁路真的会修建吗？谁来出钱呢？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一定要去坐一趟!"

在这位台湾老兵的心目中，两岸之间一分钟也没有分离过。"虽然在台湾生活了一甲子，可在我的心里，台湾从来都是同大陆连在一起的，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

他无限感慨地看着我说，要是在以前你这样一个从大陆共产党方面来的记者单独到我家里来，那还了得！我当宪兵出身，当然清楚后果了。现在两岸的情势都不一样了，不久前一大批退役的将领还到大陆旅游参观呢。"两岸关系改善了，不再刀兵相见，这对谁都好，随着交流的频繁，两岸人心也会越靠越近……"



刘老先生心中的北京—台北铁路，在地图上用红蓝标记早已“规划”好了。

老人说，当年自己背井离乡出来当兵，为的是有一口饭吃，现在，这个问题大陆已经解决了，而且经济发展得很迅速，我们台湾老兵听到这些消息心里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中国人真的很了不起！

乡音无改，庆幸健康活到今天

聊着聊着，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忽然，他意识到什么，忙问：“说话说忘记了，你还没吃饭吧？”随即，他嘱咐老伴说:“快去下碗面！”老太太赶紧去厨房下了一碗肉丝面，坐在我面前，非要看着我吃下。她说：“我以前陪老头子去过大陆，那时大陆还非常落后，农村的条件很差。现在，早已发展起来了。”不过，老太太也直言不讳地抱怨说，老头子平时特别节省，可对大陆老家人就显得非常慷慨大方，几乎有求必应，不知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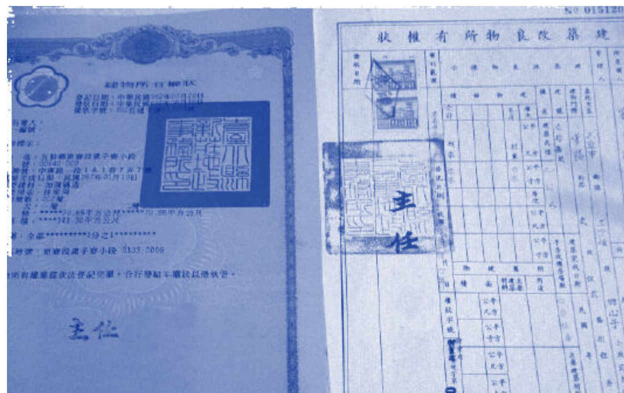
“我离开大陆数十年，在台湾生了根，也开了花结了果。”刘志衷老人说， 自己曾经在部队待了20多年，现在，每个月有2万多元新台币的退休薪俸，还有多余的房子收租金。“我们老两口的生活足够了，儿女们早就大学毕业，也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孙子辈也开始上大学了。只有到节假日，他们才会回来团聚。”

老人将我带到客厅的一张全家福前，向我一一介绍家人——

“六十多年前，我孤身一人来到台湾，当时举目无亲，全靠自己一双手去打拼。现在，我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每家都生了两个孩子。一个人‘发出’这么多个，你看，我在台湾发展得还可以吧？”老人乐呵呵笑得像个孩子。

看得出，老人为自己的家庭及下一代的成长感到十分满意而自豪。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老兵，出生在贫苦的农村，当年如果不是出来当兵，在农村可能也活不久，因为严重的痔漏顽疾导致脓血不止，当年的农村医疗条件很差，害这种病夭折的毫不足奇。到了部队后，才有机会送到医院做了手术，从此一身轻松。我虽然吃了很多苦，人生经历有点曲折，但能健康活到今天，比起那些在炮火硝烟中殒命或伤残的人，算是幸运之极了。”



经多年拼搏，刘老先生早已成为台湾的有产阶级。图为老人的家庭房产证。

刘老先生语带感伤地说：“我的同代人，包括军校的老同学，很多都不在人世了。包括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性爱光碟事件的主角璩美凤的父亲，他和我是军校同学，又是桐城老乡，现在也过世了……两岸要永远休兵啊，国家富强了，别人就不敢欺负你……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过上太平安逸的生活！”

听着这些耳熟的安庆乡音，品味老人这些朴素的话语，觉得他同大陆的同龄老人们无啥区别，甚至同大陆的退休老干部说的道理也都一样。恍然间，我觉得与他似曾相识——说的那些话好像在哪里听过，而这个老人也好像在哪里见过。

临别之际，老人赠我手书《离家一甲子忆昔》小诗，浓缩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现辑录于后。

附：

离家一甲子忆昔

——刘志衷诗体自传

烈如生于沿江北，父兄教书不种田，

雇工耕耘收成少，犁田稼穑一肩挑。

不幸身患痔漏疾，创口不愈常流脓，

弱冠未臻恩未报，离乡背井弃家人。

初入宪兵叫学兵，结训过关才能成，

人当学兵要考试，我写自传入军营。

安庆无锡到上海，乘坐轮船到基隆；

花莲北埔废机场，营区杂草一人深；

千位新兵齐动手，焕然一新成兵营。

台北处处显乱象，街头都是逃难群；

住宿饮食无处所，卫护治安靠宪兵；

饭团包菜当便当，尊严难挡腹中空。

别人入学二十许，我比他们长十庚；

同学三十晋少校，我升少校退役龄。

戎马倥偬廿四载，脱下军装转荣民。

赤手空拳民间混，陌生社会难生存！

儿女皆似软脚蟹，养家活口靠何人？

只要找到工作干，哪顾轻重和卑尊。

初任司机助手职，鼓起勇气去上任，

装货卸货很吃力，吃饭休息时不定。

振作精神再出发，几经辗转往上升。

记账组长到课长，厂长任内届年龄，

心不情愿也要退，适逢开放去探亲。

现今年高超八十，劳作不休英雄逞。

（2010年2月至4月刘志衷于台北寓所）

（注：刘志衷，乳名刘烈如，入伍后易名刘志良，升任少校时，因与先期拔

擢的人同名而改名刘志衷。原为繁体字，本书摘录时稍有删改。）

“韩战战俘”李银生：当年若活着回国，定能立功受奖



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批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战士成了“联合国军” 的战俘，后来，计有1万多名战俘被送往台湾，成了当年台湾社会妇孺皆知的所谓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来台后，他们全部“自愿”加入国民党部队，继续自己的行伍生涯，这批“反共义士”早已淡出历史舞台，幸存于世者已寥寥。

以前曾经看过相关报道，也阅读过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可现实中的“反共义士”究竟是何面目？我很想寻找一位“反共义士”，同他面对面聊聊，亲耳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亲眼看看他们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

多方打听之后，某一天，桃园县广东同乡会热情好客的廖先生，从桃园打来电话，告知终于找到了一名来台的“反共义士”，他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接受采访。廖先生帮忙约请，并热心陪同前往。

这位“反共义士”，名叫李银生，出生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5日，现年79岁，山西省洪洞县苏堡镇蜀村人。

我原以为打开这类老兵的心扉会比较困难，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老人得知我的来意后，以山西汉子特有的爽直，十分干脆地答应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毫不隐晦地将曾经的“难言之隐”向我叙说一番。

13岁随了国军，15岁加入共军

李银生的老家所在的山西洪洞县，熟悉京剧《玉堂春》中“苏三起解”唱段的人应不陌生。实际上，洪洞县还有一棵著名的“老槐树”。洪洞县曾是明清时期进出山西省的移民集散地，官府在县境内的广济寺边设立机构发放迁移资费， 因此，很多离乡背井的山西人都记住了广济寺旁那棵老槐树。

李银生说，60多年前，自己告别苏堡镇蜀村时，也曾从这棵大槐树前经过， 那时，就已经是小槐树（老树已死，新槐树为同根所生）了。老人印象中的蜀村，“在洪洞县是很大的一座村庄”。

1944年，李银生13岁。那年，有支国民党部队进驻蜀村。同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他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我家有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因为日本人经常扫荡无恶不作，村里人无心耕种，经常‘跑反’，我只勉强读了3年书，随着田园日渐荒芜，村人生活日益困顿。”李银生老人由此拉开话匣。

这天晚上，听说又有军队进村，大人吓得全都跑掉了，家里只留下老爷爷带着几个小孩：13岁的李银生及更年幼的两个妹妹。

乡里人未曾料到，这回来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军队。一位连长走过来向长得还算敦实的李银生扫了几眼，说：“小毛孩，多大了？随我去当兵怎么样？到部队可是有吃有喝。”当听到“有吃有喝”几个字时，李银生想都没想立即答应：“走！当兵就当兵！”

其实，说是当兵，也就是其他人在前线作战时，让他帮助看看行李、粮食和弹药什么的。所以，连长说的倒是没错，真的是有吃有喝，而且不用动枪动炮，因远离前沿阵地，似乎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入伍后的次年，日本投降，部队随之转移到了太原县和祁县一带驻扎。李银生所在的部队是炮兵，他实际上是一名打杂的小勤务兵。

1946年，国共陷入内战。李银生所在的这支国军在距离洪洞县苏堡镇不远的驻地被解放军给抄了后路，一举端掉老窝。李银生因年龄小依旧被安排在家“看东西”，被八路军连人带物一并“接收”了。

79岁的李银生老人还清楚记得当时与共军王连长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小鬼，你在这里干什么？”王连长问。

“我在照看东西呀。”李银生仰着脑袋回答。

“跟我们走怎么样？”年纪很轻的王连长再问。

“那这里的物资怎么办啊？”少年李银生颇有责任心，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

“呵呵，东西你就不用管了，收拾完跟我们走吧。”王连长笑道。

就这样，15岁的李银生一转身就当上了共产党解放军，调转枪口朝向“有吃有喝”的国军。

老人回忆说自己参加的军队是解放军60军179师109团1营3连。

“邓小平首长的劝降水平确实高”

共产党的部队机动灵活，四处活动。先是转战山东，李银生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在一次战斗中，他左腿负伤，一颗子弹贯穿左腿腿肚子。受伤后，他被部队安排到后方一间窑洞内养伤，仅一个多礼拜，就基本康复，又回到部队。

“子弹击中的伤好治，只要没伤到骨头，一周时间就基本恢复。”老人轻描淡写道。他回忆说，解放军打国民党军队，似乎不用费多大的劲，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更是如刀切豆腐一般。1948年部队进攻太原，队伍从北门攻城，最终全连仅两人负伤，顺利拿下省城。1949年初，部队又开始进攻陕西省会西安，依然攻无不克。休整了两个月后，部队奉命从陕西一路追歼国民党部队到四川。

从陕西到四川，这一路尽管山路陡险，可两军基本没有正面交锋。“国民党部队根本就无抵抗之力，我们跑路跑得太辛苦了，一路紧追，追了一个月才追到四川。”

解放成都实际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当时，解放军首长邓小平劝降成都守军的讲话令李银生记忆深刻。邓小平既用四川乡音向敌方喊话，也同自己的队伍分析敌我形势和战争性质，讲得句句实在。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是自相残杀，再打下去受伤害的还是中国人，只要你们（守军）放下武器，无论军官或士兵都有好的出

路……”

当时，守城的国民党部队虽无心恋战，但心有不甘。他们说，接受整编可以考虑，但要先看看你们的真实实力。于是，解放军下令一个炮兵营从敞开的北门进南门出，为的是展示实力给守军看，震慑他们。后来，这个守备师坦然接受了解放军的整编。当时规定，整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安排统一受训。将高级长官调离部队，目的是好给留下来的普通士兵做思想工作。基层的连排班长职务不变，但采取“双领导”制，连排长均是“双”的，原先的连排长还照干，再安排一名来自解放军的连排长，由两个连长或两个排长同时指挥部队。“共产党这一奇招果真厉害，被整编的队伍，保持了战斗力，很快平稳过渡到解放军序列。”

此外，解放军当时对投诚部队的政策是，“愿意留下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当然欢迎，不愿继续当兵的，也可自愿离开，由解放军统一发放路费”。共产党军队的思想工作很实在，采取的政策也很得人心，打下江山也就毫不奇怪了。

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陷绝境

李银生说，感觉是国共内战的硝烟还未散尽，抗美援朝的战幕又拉开了。当年四川境内还不通火车，部队快速转移要靠汽车。

约在1950年七八月份时，部队奉命开拔，179师从四川乘汽车沿川陕公路浩浩荡荡抵达陕西宝鸡。第二天，再转乘火车来到河北省仓县，这里距离北京仅有两站路。部队在这里接受军政训练。先是鸟枪换炮，换上清一色苏式装备，包括各式火炮及弹药等均是苏联造。随后，部队开始接受为期两三个月的军事准备和思想动员，李银生的身份随之变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正式拉开帷幕。

李银生记得自己是从安东进入朝鲜的，他所在的179师担任预备队。由于没有制空权，部队只能白天隐蔽，晚上攻击前行。头顶上敌机在狂轰滥炸，地上已是焦土一片。从鸭绿江到汉江，从汉城到釜山，一路遇到的都是伤员。

1951年5月20日至21日，179师行军两三天均未受到美军的攻击，天上飞机只盘旋不下蛋（扔炸弹）。大家都感到奇怪，觉得很不寻常。这时，先头部队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李银生印象深刻的是，才渡过汉江，又再一次渡汉江退回。后来才明白，部队突进太快，不知不觉中钻进了敌人的大口袋，等到发现被敌军包围时，撤退已来不及了。

先是友军180师做掩护，要求179师迅速回撤，随后，两师互相交替掩护向后方撤退。180师后来几乎全军覆没，失利的原因除了战略安排上的失误外，是大家又饥又冻，战士都没有继续行动的气力了。

李银生所在的179师，连续三天给养断绝。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和战友们忽然发现身后的山头和道路被灯光照得雪亮，原来是美军已经占领制高点，并形成合围，探照灯强光将志愿军阵地照得一清二楚，我军火力完全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

经过一番激战，兵员损失惨重。李银生左手负伤，连长是右手负伤，所幸伤势不算太重。“如果我能活着回到国内就是英雄，一定会立功受奖。”李银生说。现实是，官兵饥寒交迫，部队伤兵满营，想移动一步都困难。

全连共有30名伤员，其中有两名是重伤员，继续坚持下去，将是全军覆没的命运。入朝作战时，李银生是班长，排长在第二次过汉江时身负重伤，他被火线任命为代理排长。

面对严峻形势，连长找李银生商量如何突围。最后，连长决定将这30名伤员全部交给代理排长李银生“关照”，他率领有生力量先突围出去。匆匆告别， 没有过多话语，更无豪言壮语。趁着夜幕，连长带领其他战士悄然撤退，顺着探照灯死角，转眼消失在山谷中。“当时战局很乱，不知这支队伍最终撤出去没有，只记得这位连长姓王，具体名字已不记得了，此时一别，今生再也没可能相见……”

率30名伤员坚守三昼夜无奈成战俘

李银生带领这些伤员在山上又坚守了两天三夜，直至战斗力降为零。

第三天早晨，伴随一阵马达轰鸣，伤员们见坑道上方有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有人通过喇叭用汉语向下喊话。大意是说，我们是联合国

军，将按照国际法公平对待战俘，希望你们听到喊声后，向我们摆摆手示意放下武器，我们将接收伤员。

不“摆摆手”，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躺在坑道内的，除了30名志愿军伤员，还有一位美军的伤员也在其间。他在双方交火中受了伤，被李银生好心拉进了掩体内，否则早被打死了。此时，这位美军伤员第一个起身摆手。为了不被饿死，志愿军伤员们也只能向飞机“摆摆手”回应。

美军直升机随即悬停在半空中，将这些伤员一个接一个全部吊运到了山下的战地医院。“对方还算是讲信用，确实按照战俘对待，轻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并没有受到打骂虐待。”伤愈后，战俘们被统一送到巨济岛战俘营。这里约有2万多名志愿军战俘，集中管制。

在战俘营里有各式各样的人在那里活动。包括“联合国军”方面的人，也有国际红十字会的人，还有传教士以及国民党方面安排的人。各路人马都在做战俘们的思想工作，目的是争取人心。

摆在战俘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被遣返大陆；第二，就地留下，再转往日、韩等地；第三，送到台湾。李银生18岁加入共产党，历任班长，入朝作战，当了三天的代理排长。如果接受“人道安排”留在日韩，前提是要懂日语或韩语，前程未卜，这肯定不成。因此，他的选项就是，要么遣返回大陆，要么去台湾。

当时他心里顾虑重重，早在四川作战时就听到部队的大学生教导员说，共产党将来会实现苏联一样的政策，兴办集体农场，大家过集体生活。这样的政策他觉得并不好。同时，自己身为志愿军干部，没有战死在战场，却成了俘虏，担心回到大陆不会有好结果。

李银生说，其实，作为军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身体负伤加上几天几夜没吃饭，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如不投降必死无疑。“求生是人的本能啊！”

不过他还是心怀愧疚，为没能成为志愿军战斗英雄而感到耻辱。早在赴四川作战时，自己还亲手打掉了一名拔腿逃跑的国民党俘虏。现在，自己沦为战俘，其中滋味唯有自知。

1954年1月23日，在战俘营关押3年之后，李银生同1万多战俘一道被运往“自由世界”台湾。在基隆登陆后，他们先被送到淡水，后转往林

口，这些战俘被编成两个联队，当时号称“一万四千反共义士”。

23岁的战俘李银生，从此戏剧般开始了一名“反共义士”在台湾的大半辈子生涯。

“反共义士”的刺青，一抹历史的血痕

在台湾驻点采访期间，笔者曾到台北的“国军历史文物馆”参观，发现这里有当年“反共义士”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义士”们赤裸上身，露出满身肌肉和“反共抗俄”刺青的“明志” 照片。还有一幅嵌在玻璃框内的“反共义士”宣誓效忠“蒋总统”的“血书”，上面除了誓词外，就是一长串血书签名，虽然因年代有些久了，血书的字迹呈紫褐色，但依然清晰可辨。据笔者观察，年轻参观者大多对此表情淡然，问及作何感想，均会摇摇头表示不解。

由此可见，当年的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后，是如何处心积虑地通过这批战俘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也由此可以想见，在高压下被“洗脑”是一件多么令人恐怖的事情。岁月流逝，　　铅华洗净，这些“反共义士”的行迹，在今天的台湾人看来都有些滑稽可笑。这些写血书的“义士”今日多半已经作古，但战争和政治对人性的扭曲和绞杀从他们身上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为了偷生于乱世，人，这种高等动物，其令色机变的本领，岂是变色龙之类的低等动物可以比拟！

经过一番教育洗礼之后，李银生们“自愿”从军，他成为国民党陆军驻桃园基地的一名战士。在13岁时曾经入列的队伍里又服役20多年，才彻底告别行伍生涯。

退伍之后，李银生开始新的谋生历程。因为没有专业技术，文化水平不高，只能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先是替报馆送报纸，挣钱养家糊口，随后，又开了11年的计程车（出租车），最后是当幼稚园（幼儿园）的校车司机。直到年事已高，才不再从事劳动。如今，李银生按政策享受老荣民的“终身俸”，每月可领取约3万元新台币的养老金。

比起鳏寡一生的那些台湾老兵，李银生还算幸运。他在台湾娶妻成家，育有一双儿女，现早已当了爷爷和外公了。身体依然健朗的他，在台湾桃园县的一座小镇上安享晚年。

“我回过山西老家探亲，那里已经没什么亲人了，只找到一位叔叔的

儿子，他在当地担任公务员。我离开家乡后，父母曾经抱养了一个继子，父母过世后，继子将祖业变卖，回到了原先的家。原本还有两个妹妹，因战乱失散多年，寻无可寻，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在人世……”

采访结束，老人疑惑地问：“有些东西怕是大陆不给报道吧？台湾可是什么都给报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见报。”很显然，老人担心的是，自己那段参加抗美援朝时被俘的“难言之隐”，以及后来“投奔台湾”的经历，在今天的大陆同胞听来，是否还会“犯忌”。

“山区农民”廖潜生：老婆孩子热炕头时，被国军抓了壮丁



廖潜生的从军经历及人生遭际，可视为台湾老兵中来自草根阶层的一个典型。已86岁高龄的他，居住在桃园县平镇市龙岗里游泳路一间低矮的小平房内。这是他的家，也是一生中唯一的固定资产，因没有子嗣，现已作价卖给他人，但依约可居住至终老。

1949年8月，被抓壮丁前，他是广东梅州市大埔县一名地道的农民，已成家并育有一女。随部队来台湾后，他一直没有结婚，期待有一天能回到大陆同妻女团聚，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1988年，终于迎来了开放探亲的时刻，可等待他的却是妻子早已改嫁的消息……

半夜惊魂，以为遇土匪劫舍

如果不是1949年8月的那个夜晚被抓了壮丁，廖潜生一定会安分守己，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庄户人生活。在时代大变迁面前，个人命运的改变，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

那天，我在广东同乡会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来到廖伯家时，已是下午四点。在桃园县平镇市一处偏僻的住宅区，老人坐在自家小平房的门前，同我交谈起来。对过去发生的人和事，似早已云淡风轻，只以呵呵一笑带过。

记忆中的那一夜，成了廖潜生大陆庄户人生活的最后定格。

廖潜生的老家在广东东部梅州市下辖的大埔县大麻乡昆仑村。大埔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山区，位于韩江的上游。大埔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山清水秀，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也是著名的侨乡。山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过着朴素而单纯的农耕生活。

25岁的廖潜生弟兄两人，那一年，作为弟弟的他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女儿。按照农村人的习惯，儿子成家了，并生育了孩子，要分门立户。廖潜生同妻小单独住在一处房子里，哥哥那天恰好到邻村走亲戚没有回家，因此逃过一劫。

这本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庄户人起得早也睡得早，劳累了一天的廖潜生正同老婆孩子熟睡在床上。到了半夜，村里的狗“汪汪”狂吠起来，人影杂沓， 山村陷入一片骚动。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山村的夜空，睡梦中的廖潜生夫妇被吵醒。睡眼惺忪，廖潜生起身侧耳倾听，感到有很多人在屋外走动，同时，灯光在窗外晃来晃去。

“快开门！快开门！”又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催喊。“不好，遇到土匪了！”廖潜生惊出一身冷汗，深更半夜，如此嚣张呼喝，一定是遇到了打家劫舍的大群土匪。廖潜生和妻子急忙起身，藏无可藏，逃无可逃，只能惊慌失措地相互张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万般无奈之际，廖潜生只得慢吞吞起身开门。刚打开一条缝隙，就被人猛地推开。屋内立刻拥进来五六个穿土黄色制服的国民党兵。只听得有人喝令：“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未等廖潜生质询和争辩，只听得一阵枪栓拉得“哗啦啦”响，吓得他大气不敢出，老婆更是面如土色浑身筛糠。

刚刚披上衣服，还没来得及扣好衣襟，就被人双手一架推了出去。

无法向父母兄弟告别，更容不得有丝毫的抗争。廖潜生，这位年轻的庄稼汉就成了壮丁中的一员。

刚开始，他还抱有一丝希望，以为仅仅只是当个挑夫，完成了任务还可以再返回家里。一路走，还一路惦记着地里的庄稼，以及父母和老婆孩子。

没什么文化知识的廖潜生没有意识到，发生在粤东大埔山区的抓壮丁事件，仅属于一个重大的军事劫掠行动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

多年过去，廖潜生心里牢牢记住了“胡琏”这个名字。不错，他正是被胡琏的兵抓走的。

其时，国民党在长江以北接连失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如秋风扫落叶般，将国民党几大主力逐个消灭。

狼狈不堪的国民党胡琏兵团从北及南，取道江西经粤东山区向潮汕一带奔逃。一路上，为了弥补兵员不足，他们原形毕露，沿途劫掠，见壮丁就抓，见粮食就抢。腿脚灵活的人闻风而逃，闭目塞听、老实本分的“廖潜生们”则被从被窝里、路途中、耕作时抓走。

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廖潜生几乎是一边扔掉锄头，一手握起枪杆，不需经过任何正规程序，报上姓名就成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

两个月后在金门迎击解放军

且看将廖潜生半夜抓了壮丁的这支“奇葩”队伍。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部队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一路往南溃逃。在蒋军的南逃队伍中有一支部队很特别，那就是胡琏兵团。胡琏是陕西华县人，黄埔四期毕业，曾因剿共卖力，获得蒋介石的赏识，被迅速拔擢。1948年，胡琏担任蒋介石嫡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在淮海战役中，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解放军包围，胡琏和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弃部而逃。结局是：乔装逃跑的黄维被俘，而乘战车出逃的胡琏侥幸负伤逃脱。

胡琏逃脱之后，并未销声匿迹。稍加喘息，即在江西、浙江一带收拾残部， 在蒋介石委任下成立胡琏兵团，企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胡琏兵团短时间内竟发展到一万五千之众。这支队伍经过解放军的一路追歼，在南逃的途中，原本并不齐整的乌合之众竟逐渐磨合成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武装，并在后来的金门战役中充当了急先锋。

1949年6月，胡琏兵团迫于解放军的强大威势，从江西分两路南下广东境内，意图由海路向台湾方向逃窜。一路从赣南进入粤东地区，经梅州南部进入潮汕地区；另一路则由赣南入闽西，从上杭到永定，由峰市过大埔来到潮汕。大埔县位于赣南和粤东之间的走廊地带，胡琏部队沿途劫掠，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灾难。

据记载，胡琏部队原本素质低下，士气低落，军纪涣散。在南逃途中，重要辎重又在江西宜黄被解放军截获，限于交通工具不足，部队校官以下均需自背行李，因此，行动十分缓慢。如此军容不整、仓促成军的队伍，如蝗虫掠地，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天怒人怨。

大埔县就沦为胡琏残军的重灾区。阴差阳错，许多大埔人因此成了国民党军人，现在台湾老兵中大埔籍人士较多，其中不乏成了高官阶的人物。

廖潜生被抓后，伴随一路行军，很快就脱下便服，穿上了蒋军制服，由一名挑夫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军人。部队先是来到了广东沿海的潮州和汕头地区，同蒋介石从台湾派来的原12兵团18军11师会合，继而守住汕头港，保住了出海口。1949年10月20日前后，在解放军追击下，蒋军弃守潮汕，乘船由海路逃往金门和台湾。



10坪的家里，墙上醒目处挂着父母照片。

经过兵源补充后，胡琏兵团遂成为金门战役中的主力部队。胡琏也成为蒋介石部队守备金门的一根救命稻草。

“部队除了班长副班长是老兵外，其他都是新兵。”在被抓壮丁两个月后，他经历了一场真正的血战——古宁头战役（金门战役）。廖潜生说：“从汕头到金门才半个月，古宁头战役就开始了，死了好多人啊……”

廖潜生的口里，他亲历“古宁头大捷”是这样一番景象：大约子夜12点，我正在站岗，忽然听到从厦门方向传来了“嗵嗵”的炮声，此时，解放军的攻击部队已经悄然登岛，而战前并没有任何征兆。被炮声惊醒后，老兵班长一骨碌起床，他有作战经验，凭听觉即知道发生了大事

情，于是将战士全部喊了起来，大家拿起枪就往外面跑……

“集合集合！”口哨声、叱骂声乱哄哄搅成一团。此时，滩头阵地上双方已经全面交火。守军一时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

新兵参战很胆小，可是，枪声一响，反而镇静下来。什么也顾不得了，长官命令干啥就干啥。“由于没有作战经验，其实是乱打，不知道打到人没有。稀里糊涂打了三天两夜，战斗就结束了。”廖潜生的记忆中，这场生死战像早年黑白照片那样，久已模糊不清。

1950年，廖潜生随部队来到台湾宜兰。他心无旁骛，一直在部队服役。当了20多年兵后，1971年人到中年的廖潜生才脱下军装回归社会。

孑然一身返乡，妻子早已嫁作他人妇

退役后，廖潜生来到桃园县平镇市一家工厂做杂工，一直做到60岁退休。



一本斑驳老相册，记录了一名国民党老兵在台湾几十年来的人生历程。

1988年，孑然一身的廖潜生返回大陆老家探亲。此时，面对他的是难言的局面。虽有幸见到了母亲，可父亲已经过世；老婆早已改嫁成他人妇，唯一的女儿也已经成家……

同许多台湾老兵的家庭摆设一样，在桃园县廖伯家墙上的镜框内，悬挂着父母亲的画像，还有一张他同女儿的合影。老人将自己珍藏的老照片翻出来给我看。年轻时的廖潜生身着戎装，颇为英武。还有一张是当年返回大陆探亲时，他同家乡父老相聚欢饮的照片。可见，回到大陆还是受到了相当的礼遇，这成为老人值得永久回忆的一页。

廖老伯所居住的是一处占地仅10坪（约33平方米）的一间平房，这

也是廖伯在台湾的所有家产了。推开一道不锈钢防盗门，就进入了客厅，其实也是卧室，因为一张床占据了大半位置；后面还有一间小厨房和厕所。过日子，当然也能凑合住，可在台湾湿热的气候条件下，这种平房在夏季就显得十分的闷热。

不过，老人心情爽朗。“比起年轻当兵时所吃的苦，这种条件算是很好了。”同廖伯在一起合住的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她是台中人，现在同老伯生活在一起，为的是彼此间有一个照料。

有人看中了廖伯房子所占的这块土地，于是同他协商，共出资70万元新台币，廖伯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和土地所有权一并转让到了对方名下。契约规定，廖伯可以永久居住在这间房子里，不用再支付租金，等到老伯百年之后，购买方再来接收土地及房产使用权。

除了这笔售房款外，廖老伯还享受老兵“终身俸”，即每月可领取1.35万元新台币的养老金。

匆匆而来，匆匆道别。

廖伯手拄拐杖，站在门前挥手同我作别，矮小的身影显得十分孤单。此时，已是薄暮时分，天空收走了最后一缕晚霞，夜幕即将来临，我得抓紧时间返回台北……

“幸运少将”丁治民：美国军校常见“毛理论”，独不见蒋氏片语



那天，台北市正举办科技发明展。

台北新朋友熊先生打电话过来说，你过来一趟吧，我在现场有一个展位，请你过来参观参观。此外，你不是要采访国民党老兵吗？我这里就有一位，他是一名将军，也是我老爸以前的好友，现正和我在一起……先前见过的均是中下级老兵，这应该是官阶较高的一位了，于是我立马招了一台计程车（出租车），即刻赶往位于台北101大厦西侧的台北国际会展中心。

在人声嘈杂的展场，我与丁将军握手相认，并排除噪声干扰，完成了第一次交谈。傍晚，熊先生带我们到101大厦地下层的餐馆就坐，我们边吃边聊。作为退役将领，与其他普通老兵相比，丁先生显得颇有见地，但出言谨慎。

勤奋读书，换来青云直上

丁老先生出生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现年88岁，是国民党军队一位退役少将。如今，子女都已移民美国，仅丁先生和80多岁的太太留在台湾，安享晚年。他是我本次随机采访中，官阶最高的一位。

老人头戴鸭舌帽，身穿休闲装，看起来精神很不错。显然，他对我

这位来自大陆的记者有些好奇也有点戒心。

刚开始时，他尽量淡化“政治”，总是将“教育”两字挂在嘴边。

虽然已是高龄，但老人思路清晰，头脑冷静。他说：“国民党老兵，有文化、爱学习的就能升到很高的官阶。在高级将领中，依靠刻苦学习，升到上将的也不在少数，国民党军队讲究学历，出人头地未必靠打仗勇敢这一条路。在老兵中，那些退伍后还靠体力劳动谋生的就吃尽苦头了！”

“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参军。那年我才17岁，刚上完高中，正准备考大学，当时正是全面抗战时期，正常升学基本没有好的出路。于是，在同学的怂恿下报考了军校。结果被中央军官学校顺利录取，成为学校的第16期学员。”

虽然身处内忧外患的大时代，遭遇兵荒马乱、炮火连天，可丁治民老先生用“幸运”两字概括自己的一生——不仅在大陆，也包括来台湾后的数十年岁月。“除了抗战之初吃了点苦，我一辈子都走得很顺，35岁即升为上校，三次赴美国军校深造，1981年晋少将军衔。”他总结，人确实有命运之说，但归根结底是要靠读书。

身陷日军包围圈，审时度势全身而退

从军校毕业后，丁治民被直接分到部队领兵打仗，在陆军88军担任上尉连长。“开始时，国军在杭州—金华—衢州一带打游击。当时，正值抗战的相持阶段，双方进入拉锯战。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相继失守，抗日军队转入外围同日军周旋。”

说起领兵打仗，老先生一下来了兴趣。他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兴致勃勃地比划起来。

老人在纸上圈出杭州、金华、衢州三个地点。“我们被日本人在这三个城市之间的三角范围内追击和包围。因为失去了大城市的依托，队伍只能在山区转来转去，条件非常艰苦。我所率部队曾经1个星期没有盐吃，更谈不上鱼肉荤腥了。行走都气虚无力，战斗力十分有限。”

日军因战线过长，兵源不足，为了补充兵源，他们使尽了手段。曾有一支国军部队被打散了，按常规，战斗结束后部队会设立联络站，收

罗突围的队伍。狡猾的日军得知这个信息后，他们穿上国军制服，摇身一变成了接收人员，并放出风声，在当地招徕打散的国军官兵。不少人上当中计，这些误入罗网的国军俘虏，被送往东南亚战场效力。直到多年以后，他们之中的幸存者才得以返回台湾等地。

“日本人很坏。”丁治民讲述自己的抗战经历：民国31年（1942年）6月，日军发动金（金华）衢（衢州）战役，驻扎在金华、兰溪一带的日军两万多人，分三路进犯衢州。中国军队在衢州北岸等地组织兵力4万余人抵抗，至6月26日，衢州失陷。

中国军队分头突围，军部撤退到山区继续抵抗。指挥部试图趁乱突进到一座大山深处，但被敌人看出了意图，鬼子在正面佯攻，却集中主力从腹背进攻军部所在地。经过急行军，丁治民所率部队与军部失去联系，只能各自为战。他依靠自己的独立判断，觉得敌人应该会在东面集结，于是，他果断指挥部队向西面奔跑。

第二天，在一座不知名的大山脚下，他们迎面碰到一支队伍，一场遭遇战眼看就要打响。忽然，阵前观察员示意有新情况，待对方走近一看，原来是副师长领队撤下来的主力！两军汇合，大家兴奋无比。副师长很惊讶：“音信全无，你怎么晓得我们要到这儿来？”丁治民报告：“我是根据军事常识，通过自己大脑判断得出的结论。”于是，头脑冷静、智慧的丁治民头一次受到了上峰的表扬。“其实，我们都是为了逃出日军的包围圈，谁都慌不择路——打仗，有时候全靠运气。”丁治民说。

丁治民说丁治民指挥连队，随大部队转移，虽然跑得辛苦，但他运气就是好。其后， 部队转战太湖和鄱阳湖一带，再也没有正面遇到大规模的日军。除了零星战斗外，大部分时间太平无事。领兵抗日的经历，让丁治民赢得了宝贵的军事作战经验，也充实了领兵履历。

驻防上海，逃过与解放军对垒

抗战胜利后，丁治民加入青年军序列，被派往上海驻防。“民国35年（1946　年）至38年（1949年），我驻防上海，等到解放军即将到来时，却接令换防，从上海移防厦门，正好避开了同共产党渡江大军的正面作战！”

丁治民至今记得，5月8日，在从上海到厦门的船上，通过电台获悉， 上海“丢掉了”（丁治民的回忆应有误。据载，上海战役是1949年5

月12日开始，经过16天激战，至5月27日，苏州河以北最后一股敌军被歼，上海战役宣告结束）。“阴差阳错，我避开了同解放军的战斗。民国38年（1949年），受命来到台湾，继续在国民党部队工作，其后，升任上校参谋。”

回忆60多年前在上海的经历，年已88岁高龄的丁治民老先生，依然不忘年轻时的一段浪漫史。“在上海驻防时，我才20多岁，在那里交识了一位女友。虽然是战争年代，并不影响青年男女谈情说爱。在离开上海之前，我们有过一次促膝交谈。我让她选择是否跟我一道走，她选择留在了上海。”

“经过长久离乱后，我在台湾成了家。本以为这段青春邂逅会永远丢失在历史尘埃中，谁也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们竟然又联系上了。”显然，丁治民对这段情史念念不忘。

非常巧合，她的一位妹妹的儿子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到日本留学，上学期间认识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两人谈起了恋爱，此后双双到台湾举行婚礼。“她让姨侄到台湾找到了我，这才知道她后来嫁到了东北的哈尔滨。从此，我们又开始建立了通讯联系。”

“虽然保持联系，但一直没有机缘再见面。现在，她已经过世了，我今年88岁，她比我还大一岁……若没有国共内战，恐怕我们的人生都会重写，各自的命运也会完全不一样。”丁老先生陷入一片沉思中。

三赴美国深造，避过台湾艰难时期

“战争没有赢家，无论日本和台湾，都饱受战争创伤，人民的生活都很贫穷。我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到日本考察，发现那时他们国家也很穷，迫于生计的卖淫女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重新协助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派驻军事顾问团。从1951年4月23日开始，顾问团进驻台湾。随着美国军事力量的介入，军队交流增多，国民党开始选派优秀军官到美国军校进修。有英文基础的军官受青睐，意味着那些文化底子薄弱的人没有机会。丁治民先是被选拔到“国防部”外语学校进修一年，经过一番努力，英文水平大幅提高，从而奠定了后来到美国进一步学习深造的基础。

“当时，台湾很穷，谁都想到美国进修。我运气好，每次考试都能入围，在十年之内竟三次选派到美国学习，一次是美国陆军通信学校，一次是美国陆军装备学校，一次是美国参谋大学。”

“按规定，离开台湾赴外国学习，每隔3年才能去一次。我每次都考取了，　每次都巧妙规避了3年期限。当时的台湾，无论军队还是普通老百姓，日子过得都很清苦，可我却很有钱。第一次赴美学习，一个月薪金280美金，后来，升职之后，再赴美国，薪金升到每月380美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台湾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全台湾都在受苦，可我却经济宽裕。一个人的命运有时真是无法估量，只能说我的运气特别好。”

丁将军说，在美国军校学习，开阔了视野，也见识了很多在台湾见不到的东西。譬如说，在美国参谋大学图书馆随处可见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高层的军事作战思想，可是就找不到蒋中正先生的军事言论，哪怕只言片语。“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理论太厉害了！用蒋先生的军事理论打共产党，很不好打啊……”丁将军表示，美国人历来奉行实用主义，可不听你自己吹嘘的那一套，谁是胜利的一方，自然受到重视，美国人崇尚强者精神与胜者理论。

老人感慨：“现在的大陆主政者更聪明，大陆经济为何搞得这么好？我还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中国人真有大智慧啊！”

丁将军的三个问题

当天的展览闭馆之后，在朋友熊先生安排下，我们来到邻近的台北101大楼地下餐厅就餐。因为交谈甚欢，老人家开始反过来询问我一些他感兴趣的问题。

丁将军的第一个问题很是突兀：“你被大陆方面批准到台湾采访，那你必须是中共党员喽，我们可否握一下手？”未等回答，他伸出了一只手，同我紧紧握了一下。老人的手很凉，这一瞬间我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坐在我对面的可是一位曾经与共军势不两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啊。在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及认知中，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文学及影视作品里，“国民党反动派”历来都是阴险毒辣、凶残歹毒，甚至无恶不作的负面形象。当然，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历史的真面目开始清晰起来，曾经一成不变的“丑恶脸谱”，也变得中性起来。同样的人，在不同

色彩光线的投照下，会呈现不一样的身影。

老人沉默良久。

他说，自己从来没同共产党正面交过手。显而易见，20来岁就任少尉连长的他，曾经风光无限，尤其在那个国民教育极其低下的年代，一位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是何等出类拔萃，丁先生成长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应不奇怪。可以想见，对两岸情势的变化，这位迄今享受台湾高官厚禄的老人，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丁将军的第二个问题是："温家宝在大陆是否地位很高、名望很高？"他说，这回钓鱼台事件（指日方在钓鱼岛海域驱逐大陆渔船，致撞船事件发生，随后日方扣押大陆渔船船长，导致外交纷争，台湾媒体就此大肆渲染）处理得很有骨气，也很智慧，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真的不简单。"中共高层并不专权，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显得非常有政治智慧，同全球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共太明智了！"

顺带说件事，这几天我搭计程车，司机得知我是大陆来客，都会脱口而出："大陆真的够硬气，每次台湾渔船在钓鱼台（钓鱼岛）被日本军舰撞上，都是赔钱消灾才放人，大陆就是不一样！"

近两天，还有一个笑料。大陆刚刚又发射了一颗探月人造卫星，当晚台湾媒体煞有介事地作了报道。电视台说，据花莲和台东的居民报料，看到一个带尾巴的火球划过天空，落到东面的大海里去了，引起居民"惶惶不安"，于是，电话打到"国防部"，被告知没有坠机事件发生，也没有敌情异动报告。究竟是什么奇异的天象呢？官方讳莫如深。我当时就觉得好笑，这分明是大陆的火箭升空，初级火箭箭体坠入大海的场景，在大陆这不是常识么？到了第三天，媒体才"基本肯定"是大陆在发射"嫦娥二号"，并作出诸多臆测性报道。看来，面对大陆的强势发展，台湾民众的心态颇为复杂。

老人的第三个问题，是他心中的"疑惑不解"："我很奇怪，大陆这么个地域广博、人口基数庞大的地方，为什么经济说搞上去就上去了？还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这是真的吗，有没有浮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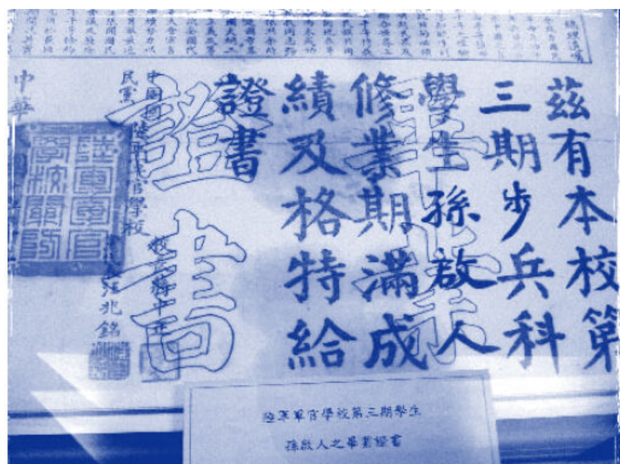
对于丁老先生的疑问，我以自己的理解为他做了一番中性的分析解答。老人听后，许久没有作声。最终，他自言自语道："这——真是谁都想不到的事！"

言罢，丁老先生再次陷入了沉思。

“大陆选择和平发展，老兵个个赞同”

就餐完毕，我们的交流也告一段落。我说，能否将您留存的一些资料供我拍照使用？比如听熊先生说那挂满墙的证章等等。这回，老人发话了：“这就算了吧，陈年旧事，没意思。”最后，他似心有疑虑地说，你要是作报道的话最好给我看看，内容越少越好，最好不要用真名实姓。“我们台湾的情况复杂，弄不好会惹出麻烦。”

我知道，他指的是台湾有反对党，怕被人抓住某种把柄。其实，不少台湾老兵对大陆记者都还存有一定的戒备之心。一方面，他们一辈子的政治烙印一时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吃“终身俸”的党国“老荣民”，担心在晚年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害了自己和家人。


茲有本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生孫敬人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特給證書

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學生
孫敬人之畢業證書

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

丁将军总是重复这句话：“人就是要读书啊！人生确实有个命，但不努力也 不行啊。时代变化很有意思，未来其实如何演变谁也说不准。”

我无法猜测老人的心理变化和真实想法，但是，拿大陆各领域的巨大变化同台湾现实相比较，一定是他们心中反复权衡和掂量的内容。

“大陆走和平发展道路个个都赞同。我们老兵都认为两岸不能再打了，兄弟相争真是两败俱伤！大陆走和平发展道路方向正确，期望两岸走向一统，但执政者不能太急，要有足够的耐心，很多事非一下子就能成功。如何顾及台湾民众的尊严和情感，需要很高的智慧来解决。原‘总

统府资政’、‘监察委员’陶百川说过，‘台独’这条路走不通，轻则伤，重则死，此观点我很赞同。”

临别时，老人的最后一句话掷地有声：“中国向来分分合合，历史趋势谁也无法阻挡。不少‘台独’死硬分子很无知……唯有和平发展才符合两岸的共同期许。”

“多面老兵”遗孀：他一生的“底牌”是共军



该怎样写出这样一个人物的命运？

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却很没意思的小人物。说是“变色龙”或“时代炮灰”？都不准确，也是对逝者的不敬。

他的“故事”无意被我捡拾。用某种标尺去衡量，他是一个“问题角色”。而我，不是擅长虚构的作家，只是一名记者——大陆记者。这类题材、这样的人物，肯定不便见报。曾将这个人的故事口述给两位老前辈听，他们立刻好心相劝，你还是放弃吧，不要做无用功了。我的内心很纠结：放弃抑或遗忘？或者干脆权当成一个谈资？

听完我的口头讲述，有朋友甚至说，这分明像小说，哪有这么多传奇事巧合在一个人身上？这反倒让我看中其中的价值。

就权当做一回“无用功”吧。

——题记

乌来山之夜的露天野餐

那天，是台湾的第九十九个“双十节”，他们放假，我们没感觉，是个局外人，一时觉得无所事事。傍晚，恰有台北的朋友相邀：一起探访远郊的少数民族如何？当然好了!我们一直在都市里忙碌，正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就随一帮大陆驻台记者同行，结伴来到位于台北县郊

区的乌来乡，这里是台湾山地泰雅人的一个聚居地。

由一位熟悉的台北朋友开车，离开灯火迷离的闹市，经台北县的新店，继续南下，大约一小时后，才进入树木阴翳的山区。又经过一段盘山公路，到达时，　已是夜晚八点，早已饥肠辘辘。“别着急，美味正等着你们。”台北朋友说。

几经周折，终于在半山腰处的一间木屋前停住。几位朋友早就在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这是一间简易平房，设施非常简陋，一看就是一个临时居所。有好几件乐器，胡乱歪斜在房子内外，同各种炊具混杂在一起。他们三位是台湾少数民族歌手，眼下，他们正在这里“闭关”——在僻静的环境中寻找音乐创作的灵感。

山风习习，夜色沉沉，宝岛山区的夜晚十分宁静。

铁架上早已烤好了一只油光灿灿的土鸡，引得嘴馋的人口水直流。圆桌上还有当地特有的一种发酵后生吃的小鱼——据称是山地人的最爱，常用以招待尊贵的客人。我尝了一口，这种加了冰块的无刺鱼肉酸酸的，味道很古怪。我们吃得眉毛鼻子皱成一团，可不好意思吐出来，他们却吃得有滋有味。山猪肉我吃过多回，可用山猪肉做汤也是首次品尝。据介绍，这里的“山地人”指的是台湾的泰雅人。其中迄今尚有少数人可合法地从事下山涧抓鱼和进深山狩猎的古老营生。

几位当地朋友热情似火，不时举杯，一杯杯自酿的米酒下肚，很快，大家都酒酣耳热起来。

从事音乐创作的三位台湾朋友，每人抱起一件乐器，或吉他或手鼓，随着节奏哼唱起来。这是他们原创的音乐，像上桌的特色菜肴一样，保持了原汁原味。歌声，很快将所有人的情绪点燃。酒香情浓，今晚，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中国人，全部陶醉其中。

其中，一位相貌俊朗、表情肃穆的歌手用普通话吟唱起自创的“写给父亲的歌”，这首歌名叫《历史的伤害》。伴随低沉而忧伤的和弦，蹦出这样的词句——

他十三岁的那年离开了家

没有选择 没有方向

看遍地战火 家乡已被摧残

母亲含泪说 能跑多远就到多远的地方

他穿上了军装 扛起了枪

身高不及枪长 没有选择 奔向战场

……

那年的古宁头之夜（金门战役） 血染汪洋

他受了伤 醒来发现躺在异乡

夜晚的海风凄凉 像是母亲离别时的哀伤

告诉自己要勇敢 能活着就有希望

来到台湾成了家付出血汗抚养儿女长大

终于盼到家乡的呼唤

他再度漂洋过海 找到了家

几十年前的“烈士” 突然回乡

村里人都呆了

兄弟还活着 父母已安葬

悲伤的泪水再也不能阻挡

我的父亲

四十多年来承受这样一段

历史的伤害

这分明是在讲述一个老兵的故事。在歌手悲戚的演绎中，“伤害”、“烈士”、“父亲”这几个词，让人印象深刻。

歌手的名字叫于冠华，曾经在台湾乐坛扬名，因各种原因，现在基

本属于“过气”的歌者，大陆更少人知。不过，他的好友周杰伦早已是两岸家喻户晓的人物。近些年，于冠华常随周杰伦的团队往返于两岸之间，主要做一些台前幕后工作。风光的自然是当红艺人，他只是一片衬托红花的绿叶，成日在一片灯影下忙碌。

其中还有一位少数民族歌手，名叫尤劳。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弟弟就是黄建福（不浪），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不浪随齐秦到北京开演唱会，不幸摔下舞台身故。这帮人聚在一起，乐曲难免低沉而忧伤。不过，今夜的露天野炊还是颇富浪漫色彩。

今夜，当着多位大陆媒体记者的面，于冠华自称是第一次演唱这首自己创作的歌曲，献给已在天国的父亲。歌罢，我好奇地询问还沉醉在音乐声中的于冠华：“莫非你父亲也是一名来自大陆的老兵？”还真被猜中了！“我是半个泰雅人，父亲老家在山东，母亲是本地泰雅人。家父本是解放军，古宁头战役时被俘，成了国民党军人……”于冠华说，他遵照父亲的临终遗愿，一年前曾专程去了一趟山东，找到了父亲的原籍地，并带回了几件珍贵资料，其中包括父亲当年从解放军部队寄回的家书，还有一份是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证书——这是他曾经是解放军的最好证明。

夜已深，乌来山一片沉静，我们不得不辞别当地朋友返回台北。临别之际，我要了于冠华的联系方式，希望有机会同他深谈，并看看他保存的“珍贵材料”。

两个馒头“俘获”了少女的心

当晚，回到台北寓所，耳边依然回荡着于冠华的那首自弹自唱的歌曲，而由此引发的关于他父亲身世的猜想，更是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那份保存了60多年的家书是什么样子？那份“烈士证明”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这位国民党老兵谜一样的身世，深深引起了我探奇的心理。

本想等周末再去，现在，我决定立即就去找于冠华聊聊。

次日下午，处理好其他事务后，我拨通了于冠华的手机。那头是他平静而柔和的声音：“你过来吧，今天我母亲也正好在家。”

循着昨晚的道路，先是搭乘捷运（地铁）到终点站新店，再转乘公交车，最后步行，一路打听，最终在通往山里的公路边找到了于冠华的

家——紧邻公路边是一处小院子，走进院内是一组平房，房子的后面不远就是河水奔腾的峡谷了。

顺着这条公路，越往山里走山势越险。这一带的高山峡谷正是泰雅人的一个重要聚居地。

于冠华的母亲名叫张明珠，今年65岁的张妈妈向我讲述了当年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以及认识于冠华父亲的经过。老人十分乐天，她说："我们的恋爱故事非常好玩，恐怕要讲很长时间噢，你有兴趣听吗？"我说，作为来自大陆的记者，对台湾老兵在来台后经历的一切都感兴趣。

"当年，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很苦啊，"张妈妈说，"每天，天不亮，父母亲就上山干农活去了，太阳落山了，才回到家里歇息。中午大人不回家，小孩子没有人照顾，又没有什么食物，找不到东西吃，我们很饿啊。"

同大陆贫困山区的许多家庭一样，大人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于从土里刨食，孩子就只能任其自由放羊，无拘无束，乃至自生自灭。

1959年，张明珠13岁，遭遇了一次改变她一生的邂逅。在一个炎热夏天的晌午，她和同村的另一位小姑娘一起在河里游泳消暑。山里孩子仿佛天生会游泳， 在水里就像泥鳅一样灵活。游啊游，不知不觉中两人漂游到了一处堤岸边。

乌来乡位于台北的南面，这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扼守台北的南大门。在两岸军事对峙时期，这里常有驻军活动。当年，台湾军人的地位较高，在山地民众心目中，女儿嫁给军人是不错的选择。军人有固定的薪俸，眷属可以随军， 每月还有眷粮供应。所以，少数民族穷人家的女儿成为眷属后，至少可以一举改变土里刨食的个人命运。张明珠老人回忆几十年前的那一幕，依然眸子发亮。她清楚记得，起身上岸后第一次遇见"阿兵哥"的情形。当时，一位个子高高的阿兵哥恰好走出军营，看到两位小姑娘从河岸边走过来，他本想喝止，可很快改变了主意。

一边是饿着肚子、两眼发绿的两位"土著"少女，一边是身材高大、一身戎装的军人。在正午的阳光下，这种身份严重"不对称"的格局，很快演变成一场人间活剧。

两位羞涩的小姑娘彼此怂恿："你去要，你去要——"

年仅13岁的山里女娃，胸部刚刚有些变化，也正是晓得害羞的年龄。高人一头、面容姣好的张明珠终被同伴推到了前面："阿兵哥，可以帮忙吗？我们现在很饿噢……"在强烈的饥饿面前，少女的羞涩和胆怯早已让位给需要食物果腹的原始渴望。见对方没有恶感，她声音更大了一些："我们太饿了，能给点吃的吗？"

其实，这位阿兵哥早已看出了她们的心思。他柔和的眼神显示，他对眼前这位山村小姑娘不仅很有好感，还隐隐含有另一层意思。只是小姑娘还不到那个年龄，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位阿兵哥眼神里的其他含义。

阿兵哥转身回到了兵营。不久，两个大白馒头就神奇地出现在少女张明珠的眼前。在此之前，村里的农家孩子吃上白馒头只是个美妙的传说。

这就是一位台湾山地小姑娘和国民党大兵相识相恋的开始，有点戏剧性，也有点苦涩浪漫。但从张明珠老人的口中道出，变成了一段令人心酸的真实爱情传奇。

那一年，于冠华的父亲已年近三十，是经历过生死场的名副其实的"大兵"。从年龄上说，她完全可以喊他阿叔。也只有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才会发展成男女关系。这一年，张明珠13岁，而这位阿兵哥已29岁，双方年龄相差整整16岁。

在台湾采访老兵，使我基本了解当时的情形。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号称有60万大军，加上眷属及流亡者共有200多万人，一下挤到这个弹丸海岛，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适龄青壮年娶媳妇选择的余地很小。条件优越的长官自然可以挑选年轻漂亮的流亡学生妹，可普通兵士呢，娶媳妇成家是个难以企及的美梦。刚开始时，很多人依然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有朝一日"光复大陆"上，对老蒋大肆宣传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美妙前景抱有幻想。在这种盲目等待中，虚耗光阴、浪费了青春好年华、到老仍孑然一身的大有人在。只有识时务、看清时局的军人才会动心思娶妻生子。能娶个当地人做老婆成家生子，这对年龄较大的老兵来说，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时代风云际会，个人命运渺小如蝼蚁；红尘一叶，任由随风飘飞。

“他除了送给我们两个大白馒头外，还给我们两人十几块钱。”这给张明珠以极大的心灵震撼。时至今天，她还搞不懂：“当年，为何他要对两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这么慷慨大方？”

不久后，张明珠所在的村里，有人经常会看到一位身着军服的阿兵哥的身影。随后，张家长女同阿兵哥相好的传闻开始扩散开来。当时，张明珠家里除有四姐妹外，另有四个弟弟，张明珠排行老大。两人先是偷偷交往，随后慢慢转为公开化。

两人的这段交往，张明珠老人没有详细讲述。不过，可以想象，作为一名现役军人，同驻地的老百姓家女孩交往，想必不敢过于张扬。

军人经常四处行军，常常来无踪去无影。但只要有机会，这位阿兵哥就会到山里来看望张明珠。

“他经常半夜急行军，也不知道目的地在何方，有时，他会以‘找水喝’为由到我家来，也会送点吃的来，我爸妈自然心生好感。”这样一来二往，彼此就慢慢熟悉了，一家人都认可了这种关系。

张明珠16岁那年，也就是邂逅阿兵哥3年后，她正式嫁给了这位因两个馒头而认识的人——一个来自大陆山东东阿县，名叫于西聚的军人。

因为军人有固定的军饷，这个泰雅人家庭从此也有了一个依靠。

“嫁给他后，要随同部队到处跑，饱受颠簸之苦。后来有了孩子，就随部队住在不同的眷村里，一会儿在东一会儿在西，生活很不安定。”由于丈夫只是一名普通士官，谈不上大富大贵，嫁给这样的阿兵哥，只是有了一张长期饭票而已。好在夫妻感情日渐深厚，夫唱妇随，共同度过了那段随时备战、提心吊胆的飘摇岁月。

不过，65岁的张明珠总是不明白：“当初，他给我们两个馒头是出于怜悯，可为何还要给钱呢？我们并没有向他要钱啊。”

“烈士”返乡，轰动远近

“那些时候，虽然生活清苦，可是感觉不到苦，因为家家户户都一样，没有攀比。”没什么文化的张明珠说，丈夫在陆军运输部队开军车，是一名士官长，他的修车技术很高超。

说起丈夫同大陆的“渊源”，张明珠颇感遗憾。她说，丈夫曾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如不是当年参加“古宁头战役”（指金门战役），他或许是一名解放军英雄，可以荣归故里；他若真的在“古宁头战役”中阵亡，那他就是名副其实的解放军烈士。

可是，命运恰恰同他开了个玩笑，他参加了那场著名的登陆战，没做成解放军英雄，也没做成革命烈士——他苟且偷生活了下来。

张明珠说，丈夫很少提到这段历史。同许多国民党老兵一样，当兵，只是穷人家孩子为了活命而暂时谋求的饭碗罢了，究竟该为谁卖命，他们很少想这个问题。有粮有饷，才是硬道理。

后来成了张明珠丈夫的于西聚，1949年在“古宁头战役”中被俘，并经“洗脑”后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员。可是，在随后的“八二三炮战”（即“金门炮战”）中却被解放军的炮火击中，差点丧命。不过，他因此立了战功，升任士官长。后来，随部队换防到台湾本岛，这才有机会认识泰雅少女张明珠，并结为夫妻。

在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张明珠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陪同丈夫到山东老家探亲。

公元1987年11月2日，蒋经国先生顺应历史潮流，宣布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于西聚立刻拉上妻子，随着“解禁”后的第一拨人潮，踏上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旅途。

在返回大陆探亲之前，基于种种原因，于西聚从未同老家人通过信。他出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本有弟兄四人。为了活命，各个外出谋生。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正是山东半岛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这一年，13岁的于西聚离家并参军。

他离家当兵时，两个哥哥已经外出谋生，家里只有父母和一个弟弟。于冠华在《历史的伤害》中所唱到的那段，“他十三岁的那年离开了家/没有选择没有方向/看遍地战火/家乡已被摧残/母亲含泪说/能跑多远就到多远的地方”，所指的就是当年父亲参军时的情形，只是没有指明，父亲参加的什么部队，是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其他军事组织？

于西聚在离开家乡的44年（在台湾38年）中，同家乡唯一的联系发

生在1949年7月19日，也就是“古宁头战役”开战3个多月前。他向山东老家寄过两份家书。当时，他是解放军华野（三野）十纵特务团三营的一名战士。其后，再无音讯。家人通过民政部门查询，获知于西聚名列金门战役参战者名单。按当时的说法，金门之战解放军进攻失利，全部阵亡。两岸隔绝数十年，信息闭塞，谁也无处查证。

于西聚根本不知道，在山东故乡，他已是“永垂不朽”了几十年的革命烈士。

那天，老夫妻从香港转往广州，再飞往青岛。他只记得自己的家乡是“山东省东阿县二区友爱乡王庄十一保五甲四号”，依稀记得村口的模样和老家的方位。可是，解放后行政区划已经做了很大调整，保甲制度早已废除，很多地名都改变了。后来，他们才弄清，其实，家乡距济南很近，离青岛反倒较远。下机后，老夫妻花了800元人民币包了一台小面包车，开始寻找记忆中的老家。

那是一对好心夫妇开的车，为了保存体力，两人不断换手驾驶。因为老人完全凭记忆寻找回家的路，所以，只能边走边问，走走停停，一路颠簸，从早跑到晚。“从青岛到老家，一路寻找了十几个小时，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啊!”虽时隔20多年，张明珠老人迄今记忆犹新。

老人回忆说，当时，丈夫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能找到老家，即便死也要死在自家门口！”经一路问人，绕来绕去，时错时对， 终于一点点接近了老家的村口。

“多亏了这对好心的司机夫妇啊，他们帮助一路打探，不厌其烦。车行到半夜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待遇见了人家，就停下来敲门问路。”眼见两位台湾来客十分困倦，一路又没有吃饭，善良的司机夫妇将车停稳，让客人休息，他们自己跑进村里，向村民买食物回来一起充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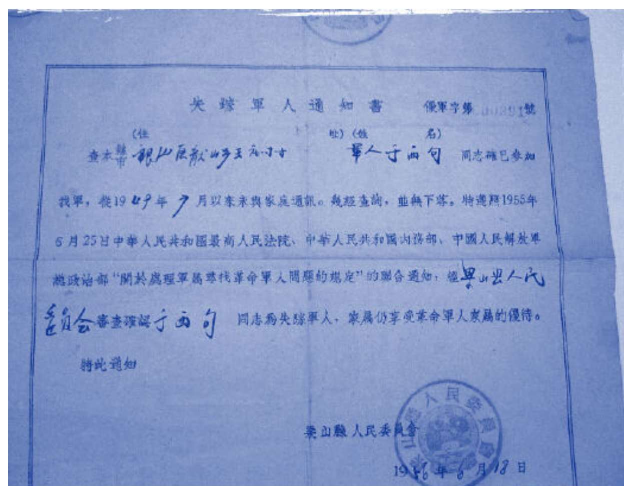
当时，大陆才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经济落后，道路破烂不堪，老两口一路颠簸，身心疲惫。张明珠老人说，是“回家”两个字支撑着老公的整个精神世界， 他没有趴下，一直坚持到底。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次日凌晨4点多钟时，于西聚果真找到了似曾相识的老家门口。

他一下又一下地拍打家门，开门的是他久违的弟弟。面对几十年不见的兄长，弟弟一下傻了，他打心底里不相信这是真的。三哥早已被部队确认战死在了战场上，家人逢年过节都要祭祀一番，自己都当了三十多年的革命烈士家属，怎么“死去”的人竟又活着回来了！？

哥俩互相打量许久，忍不住抱头痛哭……

“于家老三还活着，带着台湾媳妇回来了！”消息不胫而走，一时轰动远近，周围十里八乡的大批村民都来看稀罕。虽然旅途劳顿，颠簸得浑身像散了架，可找到了梦里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睡到了祖屋的炕上，于西聚饱含泪水对老伴说：“能有今天，我这一生都值得了！”



失蹤軍人通知書 優軍字第[illegible]號

(住址)(姓名)

查本縣(市)[illegible] 軍人于西句 同志確已參加我軍，從1949年7月以來未與家庭通訊。幾經查詢，並無下落。特遵照1955年6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處理軍屬尋找革命軍人問題的規定”的聯合通知，經[illegible]人民委員會審查確認于西句同志爲失蹤軍人，家屬仍享受革命軍人家屬的優待。

特此通知

[illegible]縣人民委員會

19[illegible]年6月18日

于冠华收藏的父亲于西聚“失踪军人通知书”。

虽然弟弟已经成家立业，可长兄和父母都已经过世了。这让于西聚心头难免增添了几丝悲凉。天亮后，于西聚哭倒在父母的坟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一一呈现在眼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位国民党老兵，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当时，山东农村还很苦，房子是土坯墙做的，四面透风。烧饭要用柴禾，一生火就冒出滚滚浓烟。”张明珠老人回忆说，尽管条件艰苦，但老公精神很好，成天有说不完的话，同在台湾时相比简直判若两人。面对这样的条件，同样是苦出身的妻子也毫无怨言，回家的日子里他们住得很安适。

得知“革命烈士”回来了，县里有关部门领导特意赶到王庄看望，并将两人接到县城，安排高档宾馆住下，并设酒宴款待。当地官员都心怀敬意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这让于西聚感到非常欣慰，认为共产党没有忘记曾为革命作过贡献的人。也让张明珠这位台湾媳妇，感到从未有过的荣耀。

第一次返乡，于西聚和妻子在村里住了一个月。其间，于西聚出钱，让弟弟在祖屋旁帮助盖了一间平房。“当时，他很想就此住下，并在这里安享晚年的。”张明珠明白丈夫的心思。可是，毕竟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一家老小都在那边，台湾也是他的故乡，所以，他们还是要返回台湾。

此后，夫妻俩又回来过两次，直到于西聚身体出现问题，无法自如走动才作罢。再后来，于西聚在台湾因病去世，虽然实现了回老家探亲的梦想，可他最终没有实现落叶归根的心愿。

乌来乡泰雅人第一次吃上了“山东饺子”

对于父亲退伍后的家庭生活，儿子于冠华的记忆尤为清晰。

在于冠华的记忆中，父亲大半生总是东奔西跑。“母亲嫁给父亲后，起初二十年随军，后十年共同谋生，其余时间就是养老赋闲，生活有苦有乐。”于冠华说，当初母亲嫁给父亲，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军人有薪俸，每个月还有眷粮分发，解决了生计问题。结婚后，作为一名家庭妇女，母亲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拖着三个孩子随当兵的丈夫转来转去。

父母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时，于冠华才18岁，因为还没有服完兵役，按照台湾的规定，此期不可以随父母返回大陆。只有等到服完了兵役，离开部队后够了一定年限，才能到大陆探亲。

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好转，民间往来与日俱增。在一次随好友周杰伦到大陆演出之余，于冠华结识了一名来自山东济南的政府官员，在这位官员的帮助下，他才了解到父亲原籍亲属的近况，并重新建立了联系。

他说，小时候，整个台湾生活都很艰苦，可是，那时感觉不到苦，因为家家户户都差不多，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没有电饭锅。“只记得小时候一会儿住在桃园，一会儿又搬到景美，父亲在哪，一家人就跟到

哪。”于冠华记得父亲退役后的情形。他说，退役后，父亲虽然可以领取一定的薪俸，但是，因为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还有老人要赡养，因此，谋生的压力依然很大。随着台海局势稳定，台湾开始注重发展经济，社会生活慢慢恢复正常。

父亲于西聚退役后，举家来到了妻子出生地乌来乡居住。“当时，全乌来乡仅有两台运货卡车，其中一台就是我们家的。”于冠华说。同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差不多，能当“个体户”跑运输的，都是脑筋比较活络的人，于冠华的父亲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退役军人，又懂修车技术，所以，一家人的经济状况还不错，至少在乌来乡排在前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来乡的运输车辆越来越多，竞争也愈来愈强，于西聚自感力不从心，他已无法从事繁重的运输工作。他同家人合计后，索性卖掉了汽车，转而在乌来镇上租了间门面，专心卖起了自己拿手的山东水饺。从此，乌来乡的泰雅人第一次可以品尝地道的山东饺子。

于西聚身上既有军人特有的刚毅品质也有山东人吃苦耐劳的天性，饺子馆规模不大，生意却颇不错。每天，他早早起床，骑上摩托车到菜市场买来包饺子的蔬菜和猪肉，回到家里，一家老少齐帮忙，有的擀饺子皮，有的切菜剁肉，忙得不可开交。老于家的山东水饺店总共开了五六年，滋养于家老少直至羽翼渐丰才转手给了别人。

时间过得很快，悄然间又过去了十多年。随着三个孩子渐渐长大成年，上大学的已经毕业，并依次走上了工作岗位，于西聚也进入暮年，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得赋闲在家。这是一个台湾老兵及其家庭所走过的漫漫长路，也是百万颠沛流离到台湾的普通国民党老兵的人生轨迹。

于冠华的姐姐嫁给一位美籍华人，现在洛杉矶定居，哥哥在台中市工作。只有从小喜欢音乐的幺儿于冠华，留在乌来老家陪伴母亲安度晚年。

乌来地区环境清幽，山清水秀。同大陆经济发达地区一样，这里虽是山区，可并不闭塞。不仅交通便利，路灯明亮，各项基础设施也都同城市差不多。来自大城市的民众喜欢自驾到山里来休闲度假，良好的自然环境，独特的人文资源，使位于北台湾的乌来风景区成为“台湾原乡部落之旅”不可或缺的一站。

现在，除了同几位隐居在山里的泰雅好友切磋歌唱艺术之外，于冠华还在上山的公路边开设了一间烤鱼店。这家名为“于烤鱼”的乡土食店，为往来的游客和艺术爱好者提供聚会的场所。在烤鱼店内，常有从台北文艺圈来的三五好友饮酒演唱。制作烤鱼的主辅料全部就地取材，鱼是从山涧抓来的活鱼，酒是自酿的米酒，连音乐也是原创的山地风味。于冠华，这位国民党老兵后代的“原乡生活”充满了闲散自在的艺术情调。

那天晚上，我同于冠华等几位共享露天野餐的地方，距烤鱼店还有一段距离，那里是几位泰雅艺人经常聚会并填词作曲的野营地。很快，他们的“闭关” 成果就要搬到烤鱼店来演示。如果哪一天，你看到在大陆拥有无数粉丝的周杰伦就坐在烤鱼店内不起眼的角落，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乌来山区没有大台北的喧嚣和浮躁，的确是一个可汲取艺术养分、激发创作灵感的佳处。

六十年前家书揭开惊人秘密

近年，两岸关系大为缓和，同许多台湾同胞一样，于冠华有更多的机会往来于两岸。尤其是每逢周杰伦赴大陆开演唱会时，于冠华是每场必随。

他说，虽然父母去过山东老家数趟，自己从部队退役后也可以随行，但父母亲年事已高，后来父亲病重，再也无法远行，山东老家又变得遥远起来。作为父母的幺儿，父亲临终前特别嘱咐于冠华，一定要去山东老家看看，并希望他代表自己去修葺爷爷奶奶的坟茔，以了却自己的最后心愿。

在于冠华家的客厅里，我终于见到了几件关于他父亲的珍贵资料。这是他前年赴山东老家祭祖之后，叔父辈唯一健在的婶婶亲手交到他手里的——来自大陆的关于父亲的唯一的“遗物”。

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家书，一份居民身份证明书，一份由山东省梁山县（解放后行政区划已做了调整）人民委员会颁发的失踪军人通知书，最有意思的还是那份印有毛泽东主席手书签名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于冠华说，老家的叔叔已经过世，父亲辈亲戚仅剩下一个婶婶，几位同辈的亲戚都分散在大陆各地打工。见到侄儿从台湾远道而来祭祖扫

墓，婶婶非常高兴，她将家里珍藏了几十年的烈属光荣证等悉数交给了于冠华，让他带到台湾作为永久的纪念。临别之际，婶婶拉着于冠华的手老泪纵横，她反复叮嘱，又像是喃喃自语：“这些东西，放在老家已经没有意义，你拿到台湾好好保存，也让后人知道老一辈所受的苦……”



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字第 號

查于[illegible]同志在革命鬥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蹟永垂不朽，其家屬當受社會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人犧牲病故褒䘏暫行條例」發給䘏金外，特發給此證以資紀念。

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 月 二十四日

永垂不朽

于冠华从大陆带回的颁发于1958年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我仔细地阅读这几份资料，发现别的材料字迹清晰，阅读没有问题，唯独两页手写的家书纸张单薄难以卒读。虽然竖排的繁体字整体尚算清晰，但其中夹杂了很多错别字，个别繁体字潦草，很难辨认。由于于西聚的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当年是否找人代书也不得而知。这些资料于冠华带回台湾后，就收藏起来，周围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他也没有仔细阅读过，“大概看了一下，有一句没一句的，弄不太懂”。

今天，当着于冠华和他母亲的面，我逐字逐句边推敲边读给他们听。两份家书，分写在两张竖线分行的便签上。便笺上有繁体字的“陆军”两字，不知何故，便笺落脚处有“日本标准规格”字样，应是当时部队使用的标准信笺，是否从日军手中夺得，也未可知。这两份家书落款时间均为“七月十九日”（1949年），第一封家书是以“祖母大人”为抬头，落款却是“儿子于西聚叩”。内容大意是说自己现在解放军华野十纵特务团三营，部队的战友们亲如兄弟，希望家里人不要挂念。并表示，“现在正处于一个反攻阶段，因家乡还是敌占区，所以不能返乡探望长辈”。信中提到，他曾经在黄河边（行军）时，遇到了“街南边的小九”，让他捎过口信给家里人，不知道捎到没有。信中还询问，东北的大哥是否写过信回来。

总之，是一份报平安的家书，说自己在部队“一点困难都没有”，认为“和平很快就要到来”，希望家人不要惦记他。这是写于1949年7月19日的家书，此时，离新中国成立已经不到三个月。

另一页家书是写给村干部的，信中透露自己当时“思想不好”，“那时年龄小不懂事，参加了蒋军”，希望家乡父老原谅。表示，对自己现在的部队（解放军）很有信心，希望村干部照顾自己的家人。

这封信无意中透露一个惊人的信息：于西聚13岁离家外出当兵，中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从字面判断，他开始时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是否曾被解放军俘获，无从考证）才加入了解放军。这番曲折，作为儿子的于冠华和作为妻子的张明珠全都不知道——于西聚活着的时候，从未向家人提及这段经历。

还原历史，情况极有可能是：于西聚离开家乡后参加了国民党部队，后来“倒戈”成了解放军中的一员，1949年10月24日随部队参加金门战役，不幸被俘，遂又成了国民党军人。

看着张明珠老人瞪大的眼睛，以及于冠华满脸困惑不解的神情，我不忍再继续发问。

于冠华从大陆带回台湾的资料中，还有父亲的“身份证明书”。这份由山东省东阿县警察所长签名盖章，并印有于西聚左右食指指纹印的身份证上的姓名是“于锡聚”（应是入伍后改成了于西句和于西聚）。上书：“于锡聚，男，住址是二区友爱乡王庄十一保五甲四号，职业：农民。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四月十八日颁发。”经推测，这应是于西聚13岁时办的证件，也有可能是家人后来帮助补办的。

在那份“烈士纪念证”上有如下文字：“查于西句同志在革命战斗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之尊崇。除因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落款签名是“毛泽东”，颁发时间是“1958年8月24日”。关防大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背面有一行手书：“因无直系发证不追恤。1958.8.24。”推测应是当年的地方民政干部所留。

梁山县人民委员会下发的失踪军人通知书，写明：“查本县梁山区龙山乡王庄村军人于西句同志确已参加我军，从1949年7月以来，未与家庭通讯，几经查询并无下落……经梁山县人民委员会审查确认于西句同

志为失踪军人，家属仍享受革命军人家属的优待。”时间是“1956年6月18日”。

通过这几份资料的相互印证，可以看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1949年7月19日，从解放军部队寄回家书，使用的姓名是“于锡聚”，这同1943年颁发的身份证明书上的姓名一致，因此，最初的姓名应该就是“于锡聚”；失踪证明书和烈士证明书所使用的都是“于西句”，这表明参加解放军后，使用的姓名是“于西句”，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事后家人补办证明时，工作人员笔误所致；而在台湾，所使用的一直是“于西聚”三个字。一个人竟出现三个不同的同音名字，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错乱和复杂。台湾老兵中，改名司空见惯，可这种阴差阳错的“改名”，颇为奇怪，留下了一个个后人难以破解的谜。

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形，更无法回溯这位国民党老兵的心路历程，只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错落纷繁和茫然无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的一生实在短暂，短暂得可以忽略不计……仿佛是战争炮火中的一株被反复蹂躏的小草，能顽强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

面对错愕的母子俩，手里掂量着那两份60年前的家书，很难描述自己的心情：感受到生命的伟大，还是人生的虚无？ 抑或战争的残酷？说不清楚，或许都有吧。当时我就非常懊悔，真不该当着于冠华和他老母亲的面揭开那已被历史尘封的秘密。

……

山里的天黑得早，不知不觉中，已是黄昏时分。我要告辞返回台北了。张明珠老人忽然有些感伤起来，她说，现在大陆也发达起来了，两岸关系越来越好， 可是，老兵这代人慢慢都老了，很快都要告别这个世界。

临别之际，老人握着我的双手说：“我现在是一个65岁的老太婆，住在乌来山里，我的亲朋好友也都在附近。有时也会到台中大儿子家去住些日子，还会到美国去看女儿。孩子们都大了，只要他们工作顺利，我就心满意足了！”

老人特别强调说，在家里，丈夫时常叨念当解放军的日子，认为共产党的队伍官兵平等，干得有希望。他生前非常关心大陆的发展，开放探亲前，日夜盼望着有一天能回到大陆老家。

于冠华家的客厅内供奉着父亲的肖像。“他一生的底牌就是共产党。”张明珠这样揭示丈夫的心底秘密。儿子于冠华则补充说：“父亲是国民党的面子，却是共产党的里子。他始终对共产党抱有愧疚和感恩之心。”

于冠华说，父亲始终认为自己是山东人，老家在大陆，希望有一天能落叶归根。“他是忠于解放军的，在台湾还没有解严时，他总是说‘那边’的好，常说将来有机会带你到‘那边’去看看就知道了。他总惦记解放军部队，时常怀念当解放军的日子……”张明珠老人压低嗓子，仿佛生怕被别人听到似的。

后　记

得知清样已妥，诸事齐备，这才确信此书真的要与读者见面了。

这本《台湾老兵口述历史》与另一本《台湾漫记》差不多是同时脱稿，“漫记”出版已慢半拍，本书竟再延宕一年，因此有些庆幸，也有些淡然。

翻阅清样，内心有许多遗憾。因为初稿赶得匆忙，不仅语言过于直白，布局也不精巧，有些细节还应再推敲……连我自己也觉得太过老实，近于刻板，这可能同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有关。不过，抛弃任何虚构、粉饰的成分，只希望成为一名忠实的记录者，这也正是自己的初衷。倘若当初知道这类所谓“重大题材”的书出版是这么九曲回肠，那还不如干脆就慢耕细作好了。

如果不是有高人指点，如果不是遇到许多热心之人，这本书恐怕连影子也没有：采访对象无处寻觅，信息无从收集，即便写成也难以面世。

本书的年轻编辑余慧敏从硕士毕业步入工作岗位，到成家及孕育小生命，直至孩子出生、休了产假复返岗位，这本书一直都在她的挂念之中，她的QQ签名，很长时间是对“老兵”一书得以顺利过审的祈愿。

广西师大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汤文辉社长是最初的拍板人，他的专业精神和判断力令人折服。本书的编辑余慧敏，还有最初策划选题的一位北京出版人，正是在他们的无私指引下，才让我逐渐摸到了采写这本书的门径。这几位优秀的出版人，我迄今未曾谋面，可谓君子之交。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还得益于深圳报业集团驻北京办事处罗勤女士的鼎力相助；在校对样稿时，本单位几位年轻人出力帮忙，他们是邓红丽、沈彤、魏涵等。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杜平老师抬爱！他在百忙之中，二话不说就应允为“老兵”一书作序，并自谦地称我为“兄”，这让我十分惭愧，其实，论年龄及资历他是当然的师长。杜老师长期旅居海外，学识渊博、视野开阔，纵论全球热点深刻独到，常能拨云见日。因不敢私动

其一字，故依原样刊登了。

最后要说的是，谢谢我的家人。

作 者

2013年7月21日